

4500

难忘的岁月

(第二集)

武元甲口述

友梅记录

越南外文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河内

前 言

继一九七一年出版《难忘的岁月》第一集之后，现在本社继续出版第二集。作者在本集记述了越法两国政府签订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协定后的九个多月里，越南民主共和国所发生的主要事件。

在这段时间里，越南人民在胡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挫败了蒋介石匪帮和法国殖民者的种种阴谋，维护了年轻的政权，投入了长期、艰苦的抗法战争。

越南外文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七月

第二 部 分

“努力越过寒冷的冬天，
我們就可进入春天。”

——胡主席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五日
手稿：《當前的緊急工作》

初步协定签字仪式结束后，胡伯伯回到北部府。

不少国内外记者听到签订初步协定的消息，前来了解情况。他们一见伯伯回来，便拥上前去围在他身旁。胡主席告诉记者们说，我国同法国签订了初步协定。他老人家从从容容地扼要介绍了协定的主要条款后，强调指出，这只是初步达成的协议，越南政府同法国政府的正式谈判不久将在河内、西贡或者巴黎举行。他还告诉记者们说，美国、英国和中国代表参加了签字仪式。

从此，革命进入了新阶段。下一步的斗争肯定不减尖锐复杂。一系列崭新的工作必须同时迅速展开。

中央常委会讨论了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解释协定的问题，认为应该使全党、全民认识到我们的路线正确，认识到革命的胜利，也看到形势的极端复杂，从而提高警惕，对法军的背约变卦要有所防备。这天下午，胡伯伯和常委会决定派人到各地去执行停火协议：黄国越同志将在交通条件许可的时候，率领一个代表团到南部去；黄铭鉴同志在第二天早上乘飞机去岷港；我则在当晚去海防。我去海防，一方面是黎格勒要求会见我国政府代表，另一方面，照胡伯伯的指示，我要参加海防市为解释协定而举行的群众集会，因为海防是法军获许在北方首

先登陆的地方。

这天，河内执行疏散令，比往日清静得多。入晚，寂静的街道上忽然响起广播声。突击宣传队员通知群众注意阅读明天《救国报》上刊登的重要消息。过半夜，敲门声把《救国报》编辑部人员惊醒了。原来是巡夜的自卫队员迫不及待地询问究竟是什么重要消息。

总的来说，对于我国同法国谈判一事，我国人民还不了解。那几天，各省纷纷举行集会。书信和电报不断地寄到首都，表示热烈欢迎以胡主席为首的抗战联合政府的成立。各地战斗气势磅礴。人人表示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七日晨，天微亮，人们就站在各路口等着买报。《救国报》以头号标题刊登了我国政府同法国政府签订初步协定的消息：法国政府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双方停战。一万越南军队将同一万五千法军接替撤回国的十八万蒋军的防务。

报纸还刊登了国会常务委员会为抗战联合政府成立而发表的号召书，号召人民进一步做好准备，进一步加强团结，保持沉着，避免一切磨擦，彻底执行政府的命令。在新形势下，这个号召书并未失去原来的意义。

法国殖民者在南部的侵略行径，早就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人人渴望着消灭敌人的战斗机会。人民对一万五千名法军将开到北方的消息感到有些突然。尽管武鸿卿也在协定上签了字，越南国民党却进行歪曲宣传，但没有使群众发生很大的波动。人们见到主要代表我国人民

签署协定的是胡主席，所以首先的信念是“他老人家必定都考虑好了。”

上午，圣德尼以法国政府代表的名义到北部府拜会胡主席，这是一次反映越南和法国之间的新关系的正式拜会。

下午四时，河内举行全市群众大集会。

我从海防回来，到大戏院门前的集会地点时，看见通往广场的各条街道挤满了人。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和自卫队员费了很大的劲，才能开出一条路，让政府的车队通过。与往常不同，集会群众的脸上都流露着期待的神色。其实，没有多少人能充分了解当时国家复杂的危急局势。我国人民虽然对自己的领导人绝对信赖，但难免有所顾虑：为什么法国只承认我国是一个“自由国家”？印度支那联邦究竟是什么东西？蒋军历来的所作所为都表现出要永远赖在我国的样子，现在他们真的愿意撤走吗？这些顾虑是正当的，不难理解的。

人海肃静。昨天早上海防发生法蒋冲突的消息已经传到河内。不少人知道，正是这个时候，法国舰队已在禁门河上抛锚。还有消息说，卢汉已乘飞机离开重庆来越南。……人们望着大戏院的阳台，等待集会主席团出来。忽然，广场左侧骚动起来。一个破坏分子扔手榴弹，当场被捕。因为慌张他竟忘了打开保险栓。这个家伙招供，他们共分四批，由反动派派出破坏集会。其余的三批见同伙刚行动便被捕，吓得仓惶逃窜了。

胡主席和中央常委会主张，向人民解释我们为什么

要签订“三·六”初步协定。在集会上，政府代表说明了我国在当时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的有利条件和困难。由于我国人民的英勇战斗，殖民主义者不得不放弃把越南看作一个自治国家的企图；法国政府不得不承认我国是一个自由国家。“自由”跟“自治”大不相同。自由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有自己的政府、国会，有自己的财政和军队。可以说，我们取得了内政方面的基本权利。只要取得了自由权，我们即可进而争取独立，完全的独立。法国要把占领南部当作既成事实。我国政府揭露了这个阴谋，并予以强烈谴责。最后，法国只好同意将就三圻的统一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并保证承认其结果。我们坚信人民，坚信正在拿武器英勇抗击侵略者的人民。斗争还要继续下去。但是，南部必将回到祖国的怀抱。法军开到北方接替蒋军是同盟国所达成的协议。我们不愿意在祖国的土地上有任何外国军队。一万多法军开来，近二十万蒋军就要撤走，而且将来法军也要撤出我国。我们同法国调停，可以为还要长期进行的斗争创造新的有利条件。我们将千方百计地巩固和发展我国的政治地位和军事、经济力量，进而争取国家的完全独立和统一。

听过解释，集会群众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表示赞同。

接着，武鸿卿发言。他慢吞吞地走近扩音器。在人民面前，他不得不号召民众拥护政府的外交活动。他语无伦次，内容平淡，听众报以照例的疏疏落落的掌声。

蓦地，整个广场响起热烈的欢呼声。宽前额、黑胡

须、身材纤细的胡主席出现在大戏院的阳台上。这是宣誓集会程序时没有透露的。鼓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他老人家得多次用手示意群众安静下来。

胡伯伯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我国已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宣告独立。可是，至今，还没有那个强国承认我国的独立。我们同法国的调停将打开国际承认我国的道路，使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巩固。这是政治方面的一个大胜利。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自由国家。根据协定，法军将陆续全部撤出越南，同法国调停，证明了我们在政治上的精明。同胞们应该沉着、团结、守纪律。我们始终把中国人看作是兄弟。我们有许多朋友，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得到全民拥护的政府。尽管这样，我们还要提高警惕，常备不懈。

胡伯伯停了停，又说：“我，胡志明，终生和同胞们在一起，为祖国的独立而战斗。我宁死，决不卖国。”

群众全神贯注地倾听胡伯伯的每一句话。不少人热泪盈眶。这是胡主席向民族发出誓言啊！这场与民族的命运密切关联的极其复杂的斗争还在进行着。领导人不能公开说出一切情况和主张。在这样的环境下，主要问题是坚定信心。

我国人民表示了对胡主席的绝对信赖。广场不断地响起口号声：“坚决为争取完全独立和统一而斗争”，“坚决执行政府和胡主席的一切命令”，“胡主席万岁”……

二

六日晚，我到海防。

这座港城还充斥着焦臭的火药味。蒋军在港口的弹药库间或还发出爆炸声。早上，冲突开始时，群众自动搬出床铺、柜子、桌椅，堵住各路口。在市郊，自卫队砍下树木作路障。我们驱车经过冷清清的街道。许多人家门户紧闭。穿着薯蓣色军服的自卫队员在街头站岗。海防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我们来到市越盟办事处。当时，市委书记是黎光道同志。市委的同志们告诉我们，下午，戏院斜对面的越南国民党办事处挂起旗子，并用喇叭闹嚷嚷地宣扬他们的主子蒋军的“战绩”。

海防也同河内一样，从去年九月开始，为了避免和蒋军发生冲突，卫国军暂时撤到市郊。市内只留下警备队和自卫队。自卫队员大多数是工人和贫民，按街区组织起来，人数多的有一个连，少的有一个排。武器由他们自己想办法，向日军、蒋军购买或夺取。有的自卫队，如第七区自卫队的装备相当好。工人救国团、青年救国团等组织也成立武装自卫队。全市还成立了一个二百人的常备战斗自卫连。此外，不少群众虽然没有参加自卫队，但也主动买手枪、手榴弹准备对付敌人。

海防前几天就接到了中央常委会关于形势严重的通知。许多老人和小孩已经疏散。市委计划把全部居民迁

移到市外，以便一有命令即可实行焦土抗战。处处严阵以待。当蒋法发生冲突时，人们都非常沉着。港口的自卫队还趁蒋军弹药库起火时弄到了一些武器。

七日上午，法方来不及筹备黎格勒将军同我国政府代表的接触，建议改在下午。我因忙着参加海防的群众集会，而且胡伯伯曾指示会后要立即返回河内，所以跟法方约定第二天接触。和我一块儿去海防的潘美同志留下做筹备工作。

海防群众集会在笠河畔的汽车站举行。这里，搭起了高高的礼台。市区虽然冷冷清清，但参加集会的人很多，他们是留下来保卫城市的。海防居民多是劳动人民。集会群众衣着朴素，但是，队伍严整，斗志旺盛。我向群众说明胡主席和政府为什么同意跟法国调停，解释协定的内容，并要求群众紧密团结，提高警惕，严格执行政府和胡主席的一切命令、政策。

“胡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传到法国军舰停泊的禁门河。同我一起去海防的武鸿卿也参加集会。集会请他讲话，他借口时间不够而推辞了。

这天下午，潘美同志会见黎格勒。这位将军傲慢地说：“我们既已出发，就要到达目的地，不管你们答应与否！”他还说，这里的蒋帮已经同意法军登陆，要求越南方面也这样做。潘美同志拒绝回答黎格勒的一切要求。

八日，我又去海防。

在蒋帮的同意下，一批法军登陆了，在河畔撑起帐

篷。坦克车和装甲车也已登陆。法军的装备，从装甲车、重炮到背包服装，几乎全是美国制造的。日后，如果抗战爆发，我们的作战对象将是美械装备的法国远征军。

上岸迎接我国政府代表的，是中等年纪，个子高大，态度温雅的瓦吕将军。

一艘小艇送我去见黎格勒。这个法国远征军总司令是近年来法国罕有的名将之一。法国报纸颂扬他曾率领一个装甲师登陆诺曼底，后来又在德国作战。他受戴高乐的委任，带兵重新占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旧殖民地。

黎格勒站在泊于禁门河的“塞内加尔”号舰的甲板上等候。这个四星将军的言谈举止十足是个职业军人的风度。他个子高瘦，穿着一套野战军服。瘦削的脸上闪着一双深邃的眼睛，长着一撮斑白的胡髭。一张笑脸看来可能很快换成怒容。

同我们握过手和应酬几句后，黎格勒以不很文雅的语气说：“我爱法国，我希望法国的名誉在任何地方都得到尊重。”

我感到难堪，但尽量克制自己，说道：“我是一个共产党人，为我们祖国的独立而战斗。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任何时候都应该尊重别人的爱国心。”

对话的气氛渐渐缓和。我谈了我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自求解放、挣脱奴隶枷锁的英勇卓绝的战斗之后，说道：“你曾经参加过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斗，我们之间应当有互相了解的地方。”……

黎格勒把我引进客厅，向我介绍了在场军官，然后开始交换意见。黎格勒答应将努力维护法越之间的友好关系。他喜欢强调他个人的作用。双方讨论了实施初步协定军事条款的问题，认为在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议之前，必须确定来同越南军队一起接替蒋军防务的法军的驻扎地点和人数。双方还同意，举行联席会议，协商有关接防部队的活动和实施停火事宜。

三

“革命的航船正在穿过重重礁石……”。三月三日关于“形势和主张”指示中对形势的估计，实际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三·六”协定的签署，标志着革命的又一个转折点。协定签订后，党中央常委会举行了会议，重新估计情况，提出新主张。

是什么原因使法国放弃戴高乐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的宣言，签署这个协定呢？

首先是由于我国人民的团结战斗力量。这是头等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我国人民的数年抗日战斗、伟大的八月总起义和近半年来南部的英勇抗战，使敌人看到了这个新力量。面对着奋起夺取政权、拿起武器决心为保卫独立、自由而战斗的整个民族，就连黎格勒之流的殖民主义将领也不得不对新的军事冒险多加考虑。加以，法帝国主义本身也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资产阶级衰弱了。在国内，它要对付民主力量日益强大的斗争运动。在印度支那，法蒋之间的矛盾总的来看有缓和的

趋势，但是，法国仍然有所顾虑。这种形势，迫使法国眼下要同我们寻求新的解决办法。

“三·六”协定只是我们的初步胜利。我国和法国的谈判还在继续。全党、全民当前的任务是什么呢？

法国还不愿意承认印度支那各国的独立。印度支那各国的民族解放革命还没有完成。现阶段越南革命的目标是完全解放祖国、统一国家、巩固民主共和制度。要完全解放祖国就得反对殖民主义。现在，法国政府已签订初步协定，情况有所变化。在策略方面，我们必须确定当前的具体敌人，以便把矛头指向他们。

前三个月，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抗战和建国”的指示中，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析形势后认定：现阶段，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法国殖民主义侵略者。在新形势下，常委会指出目前的具体敌人是法国反动派。他们正在想方设法反对法国的民主运动。他们主张同美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勾结，包围苏联。他们依然企图在印度支那复辟殖民统治。目前，他们正在破坏越南的统一，阻挠我国人民争取完全独立的斗争。

自从法国决定武装侵略南部后，我们便提出了成立反对法国殖民主义侵略者的民族统一战线。在新形势下，民族统一战线必须把矛头指向法国反动派。

我们提出了一些新口号：“和新法国平等联合”，“越法两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法国反动派。”

在军事方面，我们要努力维持和培养实力，防备意外。同时，要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新战线的斗争。

基于上述的战术转变，常委会估计了可能发生的情况，提出了一些工作。

必须进行深入而广泛的解释，使群众清楚地认识到签订初步协定是正确的主张，是我们的胜利。同时，必须反对认为签订协定便万事大吉、放松战备的思想。

我们要切实地防备法国殖民者背约。他们可能不肯执行已经达成的条款，或者歪曲协定的内容。也可能，等他们的军队登陆进驻一些基地后，便翻脸寻衅，发动进攻，推翻我人民政权。保卫革命成果，是个非常重要的根本问题。常委会强调，必须继续进行长期抗战的准备工作。在法军驻扎的地区，我们应该保持沉着的态度，并成立联络委员会，以便解决与双方有关的问题。我们必须迅速地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教育他们时刻提高警惕；同时，促进对法国士兵的工作，使他们了解我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这时候，对待蒋帮要十分巧妙。“三·六”协定使他们面临新的局势，使他们清楚地看到再不能原原本本地维持他们在印度支那的利益了。我们必须反对他们企图拖长驻扎期限、变印度支那为国际托管地的阴谋。

国内反动派正在施展新的阴谋手段，极力歪曲协定的签订。他们蓄意制造事端，给法国殖民者提供向我们进逼或者撕毁协定的借口。蒋帮走狗越南国民党企图发动反革命政变。我们应该趁着他们因感到将被蒋帮抛弃而惶惶不安的时候，想法对他们进行分化，引导误入歧途的人回到人民这边来。亲法越奸可能抬头，同法国勾

结，破坏我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我们必须想方设法，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使他们不能危害革命事业。

常委会也指出了法国殖民者在南部问题上的野心。他们将会曲解“三·六”协定只适用于北部及中部大部分地区，加紧导演要求南部“自治”的丑剧，竭力炮制南部傀儡政府，以便继续分割我国，造成既成事实。

对于协定规定的在南部举行公民投票一事，法国将会拖延，以镇压抗战运动，增强伪政权和伪军的力量。在侵略者的刺刀下举行的公民投票，我国人民是不可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愿望的。

法国殖民者将利用在南部实际执行停战协定前的青黄不接时期，对我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进逼，使我国人民灰心丧气，给反革命活动提供机会。

我们的主张是，坚决要求法国严格地履行停战协定；在我国和法国签订正式条约之前，法国要承认法军暂时占领区越盟组织的活动权。我们将在法军暂时占领的城市，开展要求祖国统一的蓬蓬勃勃的政治斗争运动。

初步协定的签订带来了缓和时期。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来巩固和发展各方面的力量，作为长期斗争的基础。

上述各项是中央常委会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缓和是为了前进”的指示所指出的。指示最后写道：

“同志们，

祖国正面临困难。但是，革命的航船正在穿过重重

礁石前进。我们同法国**讲和**，是为了争取时间、保全力量，**坚定立场**，务求迅速地向完全的**独立前进**。”

四

二月中旬，达尚礼回国。法国当局已经发生了和他的愿望相反的变化。把他封为印度支那高级专员的主子戴高乐已经辞职。社会党人菲利普·戈安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原由戴高乐的亲信掌管的殖民地部，现已改为“法国海外领地部”，也由社会党人马利维·莫戴掌握。社会党人占多数的菲利普·戈安政府接受了黎格勒所提出的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调停的计划。达尚礼则进行频繁的活动，想法勾结法国新当局的右翼分子。他到处诽谤说：“越盟是一个排法党，是不可靠的。胡志明先生和越盟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叛乱分子。”三月初，这个家伙重来西贡。

“三·六”协定一公布，达尚礼便在西贡发表广播演说。他颂扬法军在日本搞政变时期所表现的精神。他说日本是使“土著居民产生丑恶欲望”的祸首，他暗指的是印度支那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这个高级专员还对帮助法国重占南部的英国军队表示感谢。他不得不提及协定明文规定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有自己的政府、国会、财政和军队。”但他又说：“我愿意指出，高棉也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和财政，而且不久也将有自己的

议院。”他为法国人在南部的所作所为，如设立谘询委员会一事歌功颂德。最后，他“祝印度支那各界人口兴旺，经济繁荣。”

这篇殖民主义臭气熏天的演说，立即遭到我方报刊的强烈抨击。

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在巴黎，法国海外领地部部长莫戴向内阁报告越法初步协定，获得内阁批准。但不几天，三月十四日，又是这个莫戴先生却宣称，南圻将有自由的宪法，“享有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一样的特设制度。”由此可见，对于正在法国政府中掌权的所谓社会党人，是不可能寄予多大希望的。

对于法国政府已经批准的协定，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的反应彼此很不相同。

三月十三日，黎格勒号召法国军队和法国人对越南人要表示亲善态度。圣德尼在河内出版的《协商报》上发表文章，说：“对那已经落后的往昔抱着无用的留恋，并不能建设美好的圆满的将来。”然而，同时期，在南部，法国飞机却散发传单，要求越南军队缴械。三月九日，法军在金瓯、迪石等地集结，偷袭我军许多营地。我武装力量坚决进行自卫战。南部的枪声从未停息。在北方，获许登陆的法军竟然未经我方许可即擅自转移。

三月中旬，越南革命同盟会和越南国民党的头头同我方达成协议，发出关于统一行政和统一军队的通令。各党派将真诚合作，不互相攻击、逮捕，不欺侮群众，

在法律范围内自由宣传，绝对执行政府的命令。

就在各报登载通令的第二天，即三月十六日，在河内，国民党却派出一帮喽罗，沿街叫喊歪曲初步协定的口号。他们走到行豆街头公园时，警察令其解散。双方发生殴斗，使三名警察负伤。越南国民党在市内进行的绑架活动也没有停止。

事态的发展不外常委会“缓和是为了前进”指示中的预见。一个极其复杂而不减激烈的新斗争阶段开始了。

初步协定签订后两天，胡主席在河内市政厅接见各区自卫队长和自卫连长。主席作了一小时半的讲话，指出：“签订这个停战协定，不等于没有战争了。我们对法军采取温和态度，并不表示懦弱、被动。我们要加强力量，提高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时刻做好准备，以便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抗战精神、周密的准备是每时每刻都需要的。……”

三月十一日，胡主席在给南部同胞和战士的信中写道：“在这个停战时期，特别是双方军队停留在现有位置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搞好战备、巩固力量、遵守纪律。将来，和平实现之后，你们的奋斗精神是保障祖国完全独立的宝贵因素。”

三月十三日，胡主席在写给同胞、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信中，控诉了法国违反协定的行径，并号召同胞们沉着待命。他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尤其是法国人民主持正义，要求法国政府执行协定。同日，胡主席

发出照会，提醒法方举行正式谈判，因为双方曾经商定谈判应立即举行。

各地又纷纷举行集会。在河内，十万人在越南学舍集会，要求法国停止违反协定的行径，立即在巴黎举行正式谈判。群众高呼这样的口号：“拥护胡主席”，“随时准备执行政府的命令”，“南部是越南的土地”。

尽管反动派进行破坏活动，我们依旧坚持团结各党派的政策。三月十七日，越盟、越南革命同盟会、越南国民党在大戏院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范文同同志代表越盟重申团结在抗战联合政府周围的必要性，还表示了越盟的团结愿望。联欢会进行中，胡主席来了。欢呼声震动会堂。全体代表起立。军乐队奏《胡志明万岁》乐曲。

联合政府中的越南国民党反动分子，主张在蒋帮和美国方面找依托。三月十二日，阮祥三到外交部任职时，宣称：“中国和美国负有维护远东和平的任务。”他时常谈到同美国联系，争取美蒋的各方面援助的必要性。他建议立即组织一个友好代表团，去访问重庆，密切中越的友好关系。这肯定是他的主子出的主意。有责任向政府提出外交工作方面的意见的外交委员会主席永瑞（即越南逊位皇帝保大），赞同阮祥三的建议，并表示愿意去重庆。在河内的蒋帮分子也授意我们应该让永瑞去。后来我们获悉当时马歇尔正在重庆。可能美帝国主义已经看到有朝一日要用上永瑞这张牌。我国政府认为派一个代表团去重庆，也有缓和我方和蒋帮矛盾的作

用，于是同意了。这是对永瑞的一次极严重考验。去年八月，他曾说过一句好话：“宁做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不当一个奴隶国家的皇帝。”再过些天，他又将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跟人民走，或者是回到祸国殃民的老路？法军进驻河内之前，永瑞乘美国飞机，离开首都到中国去。阮朝最后一个皇帝跟人民走的短短路程走完了。全国抗战爆发不久，胡伯伯曾派人到香港找永瑞，请他回国参加抗战，但他拒绝。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永瑞租一架加达利那飞机，到下龙湾会见接替达尚礼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的波拉埃特，为恢复其奴隶傀儡生涯而同旧老板讨价还价。

五

初步协定在河内签字一周后，蒋军总参谋部才同意法军开进印度支那北方接替蒋军防务。这项协议于三月十三日在重庆公布。蒋军的撤退日期从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开始至三月三十一日结束。从法律方面说，二十万蒋军再没有什么理由继续赖在印度支那北方了。

这天，在河内，重新出现携带武器的自卫队员。才昨天呢，在各街头的沙包掩体里站岗的，只有头戴青天白日帽徽钢盔的蒋帮五十三军士兵，今天，增加了头戴红地金星方形帽徽船形帽的我自卫队员，手握钢枪，腰插手榴弹，英姿勃勃。这是一种变化的标志。城市呈现一派新风貌、新气象。

三月十八日，一千二百名法军获许进驻河内，准备

接替蒋军。越法双方分别发出公告，要求越南人民和法国人保持沉着态度，避免发生令人遗憾的事情。

法军经过的路沿线居民和武装力量做好准备，预防意外。

根据我方的规定，每队法国军车都要插上越南国旗，並有我联络官同行。车上的枪要套上枪衣。到河内时，要编组行驶。

二百辆法国军车，其中包括多辆装甲车，一早从海防出发，直到中午，头一辆才走到龙编桥头。这是因为，尽管有我联络官同行，车队依然不时要在民兵岗哨的拦路杆前停下接受检查。

法军经过的街道，家家户户紧闭。街上，除了在十字路口执勤的交通警察和站岗放哨的自卫队员外，绝无行人。映入法军眼睛的是，用越文和法文写的横幅：

“越南是越南人的”，“南部是越南的土地”……。一些法国侨民聚集在场试街两旁，也未能改变整个城市的冷落气氛，好象屋主人对不受欢迎的客人不打照面一样。

这天下午五时，黎格勒率领圣德尼、比绒、沙兰、瓦吕等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北部府。黎勒格敏捷地登上台阶，向胡主席敬礼，满面笑容地说：“主席先生，越南人和法国人现在已经成为朋友了。”

胡主席请黎格勒同坐在客厅的长椅上。这个法国远征军总司令举杯，提议为胡主席的健康干杯。他表示希望越法两国政府的正式谈判尽快举行，以便越法两民族共谋和平、同享幸福。

过几天，为表示亲善合作的精神，黎格勒建议举行越法军队混合阅兵典礼。

全副装备的一营卫国军奉命从市郊开进市内。他们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时间的队列训练，但是步伐整齐、威风凛凛。战士们穿着草绿色军服，脚踏皮鞋，肩扛上了刺刀的枪。指挥员佩着长剑，率领队伍行进。队伍边行进边唱歌。发自革命烈火熊熊燃烧的心的雄壮歌声激励人心。法国人第一次看到我们的一支正规部队，表露出敬畏的神情。

阅兵式结束后，我部队在主要街道上行走一周，才回驻地。很久了，河内居民才又看到全副装备的卫国军。行人停步，屋里人走出家门，站满了人行道。部队过处，欢呼声此落彼起。

六

三月里，蒋军还不愿撤走，大批日军还没有回国，却又增加了几千法军。这些法军，有从法国、德国和北非各国招募入伍后新来的，也有原来驻在越南、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曾被日军俘虏、现在得到释放和重新装备的。河内街道上，外国军队比革命成功初期还要多。

然而，局势和蒋军初来时已经不同了。

从前，我军要驻在郊区。要想运送几十支枪经过市区，得放在牛车上，用草席盖住。现在，整个建制的部队，武器齐全，却可以在首都各条街道昂然行进。在各机关站岗的卫国军战士，从前有时得退到围墙栏杆后面，

现在却堂堂皇皇地拿着武器站在机关门前，而不被蒋军刁难。除了蒋军的岗哨外，现在增添了许多我军岗哨和法越混合岗哨。携带武器的自卫队战士处处出现，随时准备执行任务，保家卫国，保卫人民。

蒋军虽然没有公开承认我国，但是，越法初步协定的签订，使他们不得不把我国看作一个主权国家，不能象往时那样干预我国的治安了。加以，他们也知道自已快要卷起铺盖滚蛋。法军则明白越南再不是他们的殖民地，不能任所欲为了。

由于法军的存在，形势虽较为紧张，但是气氛反而好些。敌军虽然比以前多，但他们谁都不敢否认我国的主权。

通过同我方接触、讨论有关接防问题的人员，黎格勒答应恪守诺言，并希望我方也这样做。有一回，黎格勒见到我，表示希望知道越南人民对法国人的态度。我反问道：

“我们都是军人，你愿意听到直说的话吗？”

“愿意嘛。”黎格勒答道。

“你们咀上说和平，行动却象是侵略者。这是越南民众对你们的议论。”

三月二十三日，黎格勒离开河内。

印度支那北方法军的指挥权移交给瓦吕。

法军进驻河内后，我方和法军之间没有发生过大磨擦。蒋军还在这里，法军不能不有所顾虑。我们认为应该利用法蒋矛盾，以便一方面想法尽快撵走蒋军，另方

面要法方严格地实施已经达成的协议。

黎格勒离开河内不几天，三月二十七日上午，法军一个分队突然闯进越南财政局，降下越南国旗，不准工作人员进入机关办公。这个机关座落在从旧城西门通往原总督府路上的一个重要十字路口。后来我们知道是西贡方面命令瓦吕占领这座房子，供高级专员来河内时居住。

这是首次挑衅。

联络委员会的我联络官向对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举行现场调查。我会见瓦吕，抗议这种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要求法军立即撤走，让越军站岗。

三月二十九日，越南北方各地举行罢工罢市，抵制法国人。华侨也响应。集市无人，商店饭馆关门。在河内，法国人办的商店、饮食店较多的长钱街、赵光复街等，罢工的越籍人员聚集在街头谈论。抵制法国人的标语贴满了门板。法国军需部采购食品的车辆空空而回。告假上街玩乐、吃喝的法国士兵在人行道上茫然张望。他们感觉到我国人民原来的冷淡态度此时变得更强硬了。

我们的坚决抗议，使法方不得不重新考虑。结果，他们只好把财政局交还我方。越南国旗又升起来了。人员照常办公。只有警卫问题，法方顽固地要求双方各派十三人组成混合警卫队站岗。

首都越南居民和华侨抵制法国人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河内行政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照常营业时止。

我军和法军代表为执行初步协定的军事条款而举行协商。法方代表是沙兰和瓦吕。我和武鸿卿以军事委员会正副主席的名义代表越南。经过多次长时间的讨论，四月三日终于达成了临时协议。

根据协议，担任接防任务的法军必须是法国籍士兵，非法籍士兵只能用于看守日军俘虏。这是我方提出的条件，目的是把法国外籍兵排除在接防军之外。

执行接防任务的越南部队是越南军队的一部分。越南接防军有自己的司令部，直接受命于越南军队参谋部，并由越南军队参谋部管理。

法军将和越军一起，在河内、南定、顺化、岷港等地以及边界某些地点共同执行接防任务。在太平、宁平、清化、洞海、广治等地，则由法军名义上接防，然后移交给我军。

越、法接防军的转移计划，由双方接防军司令部共同协商、统一决定。这项计划，最迟于执行前四十八小时呈交越南政府。用于接防军给养工作的军车，每辆所载携械人员不得超过四名；一个车队的携械人员总数不得超过六十名。

为监察上述协议的执行，在河内设立了越法中央联络和监察委员会。必要时，各地也将设立类似组织。

双方同意派出一个停战委员会前往中部南区。

在多次会议上，关于在南部实施停战办法的讨论十分激烈。我方代表强烈抗议法军在南部的非法进攻，并要求派一个停战委员会去南部，实施初步协定第三条。沙

兰借口停战问题是两国政府的权力，回避我方的正当要求。这个理由遭到我方的驳斥。由于法方的消极态度，讨论没有结果。

在法军进驻的许多地方，发生了磨擦。

在海防，四月十一日，法军悍然侵占许多机关的房屋。海防人民立即举行罢工、罢市，表示反对。越法联络委员会的我方代表强烈抗议。法军只好撤出非法占领的地方。过几天，正当海防人民举行集会的时候，听说法军没有通知我方就擅自派遣五百军队到河内。与此同时，法军又捣毁在下里桥附近的民主党办事处。群众集会于是变成示威游行。数以万计的群众冒雨游行，发出愤怒的抗议。第二天，全市又举行总罢工罢市。街道冷落。商店闭门，客车停驶，渡船停渡。法军害怕了，出动装甲车守住各街头。最后，法方不得不道歉。四月底，在海防，法军同我自卫队发生冲突。法军出动坦克、装甲车进攻陈兴道街、火车站街和胡志明路，遭到自卫队的猛烈还击。海防市越法联络和监察局花了不少时间，才能恢复秩序。

四月中旬，黄国越同志率领一个代表团，同一些法国军官一起，乘飞机前往芽庄，实施停战。在这里，法方要旧官吏豪绅出来给他们办事，不听从者受到迫害。他们阴谋在中部南区暂时占领区复辟“保护”制度。我代表团曾不止一次地向他们抗议。由于法方坚持顽固态度，经过七天讨论无效，我代表团离开芽庄。

七

三月下旬，达尚礼表示希望同胡主席会晤，讨论两国的关系问题。他建议会晤地点选在下龙湾的一艘法国巡洋舰上。

上星期，《救国报》曾发表评论，尖锐地批判达尚礼的殖民主义论调。这个高级专员的立场已经暴露得相当明显了。那么，他真的有什么事需要同我方协商解决吗？接触地点为什么不是河内、西贡，而是海上的一艘战舰呢？……达尚礼来到印度支那之后，尤其是他三月六日以来的全部作为，使胡伯伯和领导同志们不得不多加考虑。不过法国内阁毕竟已经批准了初步协定，而且这项协定的签署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回响，不少外国报刊指出，这是解决当前殖民地与宗主国冲突的好办法。我们认为，给这次会晤作后盾的，是我国南北两方数千万人民。根据分析，胡主席认为，应该同法国高级专员会晤，以便要求立即举行正式谈判，而且谈判地点要选在巴黎——印度支那的法国反动派难以封锁消息的地方。由此，胡主席接受了对方的邀请。

三月二十四日早上，胡主席戴着一顶宽沿遮阳帽、拄着日常使用的竹杖，上汽车启程了。陪同的有黄铭鉴同志和阮祥三。圣德尼准备了一架法国加达利那型水上飞机，在嘉林机场迎接胡主席。

大约上午十时，飞机到达下龙湾，轻轻降落水面。上将高级专员同黎格勒站在“埃明·伯恩斯坦”号巡洋

舰上迎候。

欢迎仪式非常隆重。

礼炮齐鸣。宾主握手。达尚礼介绍了参加欢迎仪式的宾客，胡主席也介绍了随行官员。巡洋舰驶出远海。在舰上举行了酒会。达尚礼上将举杯，说：“这次会晤，是为增进法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亲善情谊而举行的第一次会晤。我谨祝主席健康，祝越南民主共和国强盛。”

他故意强调这是第一次会见，示意他才是法国驻印度支那的代表，而不是曾经在河内会见胡主席的黎格勒。

胡主席致答词，非常坦率地说：“有这次会见，是因为有了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的初步协定。我们越南政府严格地履行了协定。至于法国方面，我们希望阁下也抱有诚意，以便体现越南和法国之间的亲善。”

随后，达尚礼请胡主席检阅舰队。巡洋舰在炮筒高高翘起的排成长队的战舰前面驶过之后抛了锚。胡主席放下帽带、拄着竹杖，同达尚礼站在甲板上检阅舰队。一艘艘战舰鱼贯地驶过他们面前。法国水兵高喊“呼拉”，表示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关于这次会见，有人认为是达尚礼受到黎格勒催逼，又因为法国政府指示他要在正式谈判举行之前，在越南举行筹备性谈判。有人则认为，这是达尚礼拖延时间的阴谋。正是他向法国政府提示要在大叻举行筹备会议。他担心当时法国政局动荡，将会导致对越盟的过分

让步。他依旧希望过了一段时间，戴高乐可以重新上台。加以，目前他还没有炮制出“南圻自治国”的傀儡班子。达尚礼还想趁着这次会见，以欢迎胡主席为名，拿出他的舰队耀武扬威。

检阅式结束后，胡主席和法国高级专员开始交换意见。

胡主席要求立即在法国首都举行谈判。达尚礼既不想早谈判又不想在巴黎举行。他说，法国政府还不了解情况，所以要在当地举行筹备会。他建议筹备会的地点选在大叻，因为大叻将来可能是印度支那联邦的首都。胡主席看透了这个高级专员延缓正式谈判的企图。主席说，这样的筹备会不很必要。达尚礼一味固执地说，法国政府一天还不了解情况，正式谈判就一天不可能举行。

关于正式谈判的地点和开始日期的讨论，也花了相当时间。胡主席要求在巴黎开，黎格勒和圣德尼支持这个意见，理由是在那里开会，可以避免极端分子（意指越南国民党）的捣蛋。达尚礼只得同意。越南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正式谈判的日期，订于五月下旬。胡主席也同意在大叻举行筹备会议，条件是：出席筹备会的法方代表必须是法国政府从本国派来的。双方还商定：四月中旬，在法国代表团来越南参加筹备会的同时，越南将派出国会代表团，对法国国会和人民进行友好访问。

据沙兰事后追述，下龙湾的会谈使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同高级专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破裂。

那天下午，沙兰正在后甲板上观赏天景水色，忽然

被人找去见上将高级专员。他走进达尚礼的办公室，只见达尚礼恼怒得脸色发青，全身抖索。达尚礼对沙兰说，“黎格勒将军刚才对我有不雅的行为，请你使他认识真理。前几个星期，他曾尽情地跟胡志明先生畅谈。显然，现在该轮到我说。我不愿意追求印度支那的‘慕尼黑’会议，不能让了一步又一步。如果我同意在巴黎举行谈判，那么，胡先生就会进一步要求更多的东西。”沙兰立刻去找黎格勒谈话。黎格勒便在当天下午到西贡去了。

在飞回河内途中，胡主席对沙兰说：“如果上将先生想拿战舰出来吓唬我，那他是大错特错了。那些战舰是不可能在我们的河流上逆水而行的。”

八

三月十一日，胡伯伯在给南部同胞的信中，谈到法国政府已经承认我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他写道：“这是全国同胞，特别是南部和中部南区的同胞，以及全体战士六个月来英勇战斗的结果。”主席还指出，谈判“将创造一些政治条件，我们必须懂得利用它以便达到越南完全独立的目的。”

在一九五一年举行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胡主席在政治报告中，提到了“三·六”协定的签订，并指出南部同胞和党员认识到这样做是对的。

确实如此，这项协定给南部和中部南区同胞带来了信心。这些正在同侵略者战斗的人，清楚地看到，法国政府不得不承认越南是一个自由国家乃是我们的一个重

大胜利。使他们更加振奋的是，全部蒋军要撤走。不少人说：“单凭一个签字，胡老就把蒋介石的将近二十万军队从我国撵走了。”协定为同胞们还要长期进行下去的斗争提供了新的时机。

敌人则惊慌失措。旧统治官及其走狗对协定的每字每句都深怀不满。他们提出不少疑问：为什么把“河内当局”叫做越南政府？为什么法国政府正式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自由国家？为什么法国政府保证将承认关于三圻统一问题的公民投票的结果？……而在他们看来，南部是法国的殖民地。

在三月十二日的咨询委员会会议上，法国驻南圻委员谢丁解释道：“三月六日协定只是河内当局同法国驻北部委员之间的地方性协定。如果称为越南政府，只是表示客气，並不意味着承认它是北中南三圻的唯一政府。不久的将来，南圻也有自己的政府、议院，有自己的军队、财政，享有象联邦其它成员国同样的权利。”

谢丁的这番话，道出了达尚礼的态度和企图。三月八日，瓦吕以黎格勒的名义，向达尚礼介绍“三·六”协定时，达尚礼不客气地说：“我感到惊奇，真的，将军先生。我惊奇的是，法国拥有一支远征军作为开路先锋，可是，指挥官光想讲和，不想打……。”

西贡反动派反对协定的条文和精神，是由法国驻印度支那最高代表主张和怂恿的。按理，达尚礼应该根据协定的规定，停止冲突、举行公民投票，但他却敦促尽快成立“南圻自治政府”，实行把南部从越南分割开来

的主张。

协定签订后，有些地方，如宁顺、平顺，法军假意同我军联系，以协商实行停战事宜，却出其不意地进行偷袭。我军某部曾因麻痹大意而遭到严重损失。

对于我武装力量，法国远征军司令部提出非常蛮横无理的要求：要我南进部队撤回北方，南部部队向他们缴械，解散返乡。

敌人在南方的违约面目已经暴露无遗。我国同胞和战士铭记胡主席的教导，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对侵略者的背叛行为毫不迟疑地予以反击。

法军第九殖民地步兵师和装甲兵团北调后，在南方只剩下第三殖民地步兵师了。军队既少又分散。新扶植起来的伪政权则很脆弱。

我国人民，从平原到山区同时奋起，势如决堤之水，冲垮了大批维持会，重建革命政权。人民群众用现有的武器，配合军队杀敌。敌人的一系列据点被拔除、包围或逼撤。许多重要水陆交通线被破坏、切断。军队同地方干部结合，成立武装宣传队。我武装力量迅速深入敌后。每次军队发动进攻，人民群众便擂鼓敲梆，成群结队地涌到维持会办事处，要伪政权官员认罪，归还所抢夺的财产。在不长的时间内，南部和中部南区广大地区摆脱了敌人的控制，整个南方呈现新的战斗气象。

游击战争普遍发展。集会、示威游行纷纷爆发。南部军民以简陋武器，普遍用智谋制胜。

在丐舫县，敌人在一条渠道畔安了个哨所，叫做京

生哨所。敌兵时常检查来往船只。有一次，我小股部队白天乔装商人，划船经过哨所。敌兵强令停船检查。船上的人请他们下船检查，出其不意地用大刀和匕首杀死敌兵，然后冲进哨所，消灭余部。

沙沥省高岭县集镇近旁有一个哨所，驻有一排伪军。每逢墟期，伪兵往往到集镇去捞点东西。一天早上，趁着大部分士兵去集镇的机会，我部队攻进哨所，守兵急忙缴械投降。赶集的群众听见枪声惊慌逃跑。等枪声停息，他们回来，却见丢下的货物、钞票原封未动，又见部队带着战利品和俘虏走过，非常钦佩。

不少地方，妇女也参加杀敌，夺武器。有的就用扁担在集镇上杀敌；有的用鱼篓扣在敌兵头上，夺取武器。

伪军队和政权面临着新的局面。革命力量日益壮大。法国政府签订“三·六”协定，等于承认殖民地制度的告终。不久的将来，举行公民投票后，走狗们祸国殃民的生涯将会落得个什么下场？眼前，他们最大的恐惧是，法军的刺刀已经无能为力，保护不住他们。最好还是投归人民。因此，不少伪政权人员，找到我方干部，交出印把子、档案，请罪。伪军士兵零星或成批携械向我方投降，有的要求作内应，配合我军拔除据点。

在西贡和其它城市，政治斗争运动蓬勃高涨。人民群众举行集会、示威游行、罢工，抗议法国破坏协定的行径。报纸公开揭露由法国殖民者导演的“要求自治”丑剧，谴责民族败类勾结敌人，阴谋分割祖国。

武装斗争甚至在西贡展开。四月八日，我一个特工组炸毁一座大弹药库，歼灭一排法军守兵，破坏四千吨弹药。爆炸声震撼了城市。法国远征军总司令部，包括黎格勒的办公室遭到严重破坏。

这天，出席大叻筹备会的法国代表团到达西贡。下午，黎格勒设宴招待。宴会上，代表团团长麦克·安德烈对早上发生的弹药库爆炸事件表示不满。他对黎格勒说道：

“我想，这个爆炸事件的负责人，将要因为失职而受处分。”

黎格勒没好气地说道：“在这里，唯一负责的人是我！”

莫非是这位四星将军已经认识到：他在一个月前所说的“南部已经绥靖完毕”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一切要从头做起了？

九

三月十三日在重庆签订的中法协定，规定法蒋军队之间的换防从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开始至三月三十一日结束。

黎格勒到河内后，于三月十八日下午到原总督府会见卢汉。据其随行人员复述，那天，黎格勒这位总司令对法中友谊颂扬备至，卢汉却冷冷地回了一句：“我们执行蒋总裁的命令。”

在河内，灰色军服的蒋帮五十三军士兵继续加固路

口的沙包工事。头戴白色钢盔的法国军警间或驾驶摩托车开过场试街，表示其存在；卢汉则派出穿黄色军服、挎着盒子枪的警备部队，在街道上巡逻。蒋军拿被人争食的仇视的目光看待法军。

三月三十一日，蒋军撤出日期届满。蒋法军队爆发了首次冲突。起因很简单。有几个法兵坐人力车不给钱，车夫扭住他们要钱。双方你推我拉。附近的蒋军岗哨突然向法国兵开枪，法国兵予以还击。于是，枪声便响开了。

蒋法双方调停未妥，第二天，即四月一日，又发生冲突。蒋法军队的两辆汽车不意相撞。不容分说，蒋军立即开枪。驻河内法军头目尽量忍辱，想法敷衍过去。

对于这些冲突事件，我国人民和武装力量表现很沉着，有纪律性。我方的态度是：不管他们冲突还是调停，一概不加干预。

蒋法军队的关系紧张起来。冲突真有一触即发之势。蒋军单等一有机会便开火。

蒋帮的走狗除了进行反对初步协定的宣传外，还搞绑架，暗杀零星法兵，以夺枪抢钱。而其主要目的是：制造混乱，挑起我们同法方的冲突。不过，由于越法联络和监察委员会的活动，反动派所制造的挑衅事件都得到了解决。

四月二十一日，爆发了蒋法的最大冲突。象前次一样，起因也很简单：蒋法的两辆汽车在长钱街十字路口的花店前相撞。蒋军车头被撞扁，车上的一些蒋军受伤。

蒋军开枪，法军还击。接着，在还剑湖边的水榭、行皮街、旗台街、梅黑帝街也响起枪声。火并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步枪声、机枪声响成一片，有时还夹杂着大炮声。直至下午五时许，冲突才算停止。双方死伤数十人。

蒋军蓄意制造借口，赖下不走。他们既然从我们同法方的磨擦中找不到借口，便制造同法军的小冲突。

可是，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对蒋帮不利的重大变化。三月底，中国红军在东三省大举进攻，向黑龙江省省会进军，蒋军总参谋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不管多么舍不得放弃印度支那，也不能让二十万军队死赖下去了！

四月中旬，法军总参谋长约安带着法国政府交给的说服蒋帮执行“三·一三”协议的责任，到达重庆。适值蒋帮“还都”南京，约安只得尾随而去，等候多日，才同白崇禧和王世杰会谈。结果，中国国民党当局同意尽早把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北方。四月底，卢汉回南京，受命把军队撤往中国东北。

尽管如此，至五月中旬，卢汉军队才撤离清化，再一个月后，即六月中旬，蒋军才开始撤离河内。

显然，蒋军是多么恋惜南方这块土地啊！在这里，他们可以安安稳稳地过着充裕的日子，免至在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中受到惩罚。当他们不得不撤走的时候，便极尽搜刮劫掠之能事，带走一切搜刮到的东西。有的甚至拆掉住屋的楼梯，拿到市场去卖。

蒋军的撤离拖拖拉拉到九月十八日才完成，比法蒋协议规定的期限迟了近六个月。去年秋季的这一天，蒋

军气势汹汹地开进我国，並怂恿走狗在他们经过的省会夺取政权。他们满以为时运已到。重庆当局念念不忘美国故总统罗斯福的诺言：世界大战结束后，让给他们这个富饶肥沃的半岛。而今，他们对于新天堂的幻想破灭了。秋风象扫落叶一般把蒋军从我国干干净净地扫出去了。

革命把以残暴阴毒出名的十八万反共军队扫出了我国，就是排除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敌人，卸下了一个物质和精神的重担。

十

“我国政府的目的是使全国同胞人人有吃、有穿、有书读。”这是胡主席在当年五月初给识字班教员们的信里一再指出的。革命的崇高的最终目标是，争取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给人民带来温饱富裕的物质生活以及美好的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既得到独立自由，又得到温饱幸福。在胡主席看来，革命理想不是什么抽象不可捉摸的东西，而是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的具体东西。

“三·六”协定的签订，给北方带来了一段缓和的时间。在为要求法方履行已经签订的协定而斗争的同时，祖国的各方面建设依然刻不容缓地进行。

“增加生产”、“消灭文盲”依旧是胡伯伯所提出的重大口号。

胡主席在上年年底所发出的增加生产以消灭饥荒的

号召，正在发挥巨大作用。为了促进生产，帮助贫苦农民，政府颁布了“二五”减租法令。

胡伯伯非常关心消灭文盲的工作。文盲是殖民制度的一个严重遗产。响应胡伯伯的号召，近十万扫盲教员和数以百万计的群众投入了扫盲战斗。

对于扩大一个独立国家的公民的知识，胡伯伯关怀备至。平民学务司把一本《国语字启蒙教学法》寄给胡伯伯。伯伯看后亲手在书头批道：“扫盲教员们要好好地读一读这本书，然后勤勤恳恳地教给失学同胞，使文盲迅速消除。这样，就是完成了自己对祖国的一项神圣任务。”四月十三日晚上，胡伯伯探望河内行鼓街的一个识字班。书桌是用门板临时搭成的。教师是个年青人，戴着近视眼镜。他正在黑板上写着样板字。学员们正在专心地写着字。他们的年龄和衣着很不相同。有穿着长袍的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穿着短裤的头发黝黑的小孩。胡伯伯拄着竹杖，望着这情景，激动不已。他勉励大家之后说：“教的和学的都是扫盲战线上的战士。”在上述的信中，胡伯伯还写道：“我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你们的积极努力将产生辉煌的结果：我国同胞人人能读会写。这个荣誉不是树碑立像所能比拟的。”

在当时的紧张形势下，为了反对内外敌人，捍卫革命成果，我们党主张大力建设人民武装力量，巩固国防，继续武装革命群众，积极建设人民军队。

自卫队人数很快增长，在各处布下密密层层 的罗网，特别是在法军驻扎的城市和省会。自卫队在人民反

对法军挑衅、违反协定的行径的斗争中起了骨干作用。法军开始害怕“方形帽徽的越盟”。在河内，胡志明自卫队干部学校于四月间开办了第二届训练。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使我军有了迅速发展的条件。党中央常委会三月九日的指示指出：“要特别注意培训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以领导新运动。”

一九四六年三月，党开办了北山军政学校。五月，国防部开办陈国峻武备学校。六月，南方抗战委员会开办广义陆军中学。军队中各团也自办培养班排级干部的军政学校。

政治教育的内容有：形势与任务，越盟的政策，共产主义简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概略，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北山军政学校的主要课程由中央同志亲自讲授。

军事方面，各学校进行游击战术和队列训练，以及从单人到连队的战斗动作训练。游击战术训练采用抗日时期在根据地编写的“打游击的方法”。至于正规战，因为我们还没有经验，所以要东一点西一点地学习外国的战术。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胡伯伯到山西省参加陈国峻武备学校开学仪式。他经过市区时，受到自卫队和青年的夹道欢迎。

在学校的大院里，学员们一色的咔叽军服，列队倾听胡伯伯讲话。胡伯伯嘱咐学员们要真诚团结、努力学习、严格遵守纪律之后，说道：“忠于国，孝于民是我

国第一支国家军队的战士的神圣义务和重大责任，也是一种荣誉。”

“忠于国，孝于民”——胡伯伯的这个教导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性的了。还在军队的幼年时期，胡伯伯就给它明确地指出了历史上种种旧式军队同革命的新式军队之间的界限。这个历史性教导，曾经引导我军战士勇往直前，完成任何光荣任务，战无不胜。

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起，形势非常紧张。党的活动暂时转入地下。胡伯伯向中央常委会建议，在巩固和扩大越盟阵线的时候，必须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吸收没有参加越盟的各阶层和个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是一个重大的思想，它贯串于胡主席的整个革命活动过程。

胡伯伯建议这个新组织取名“越南国民联合会”，其宗旨是：使越南独立、统一、民主、富强。所有的越南人，不分民族、宗教、社会成份，都可入会。为独立、民主而斗争的各党派都是该会的成员。为了方便群众记忆，伯伯认为这个会可以简称“越联”，就象过去把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那样。

五月二十七日，越南国民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胡主席被选为名誉主席，黄叔抗老先生为执委会主席，孙德胜伯伯为副主席。参加越联的政治团体有：越盟、民主党、越南革命同盟会、越南国民党。各宗教团体和工会也入了会。此外，还有从前未参加任何团体的许多爱国人士。在胡主席的倡议下扩大起来的民族统一战线，

从此，在我国人民争取独立、民主的事业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十一

胡主席和达尚礼在下龙湾会谈后的几天，四月初，路透社报道说：“达尚礼受命率领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谈判的代表团。……其成员有财政经济部、国防部和殖民地部的代表。”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就是法国反动派的一个阴谋。达尚礼是最丑恶的老殖民主义的忠实门徒。我们同他对话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法国把殖民地部代表塞进谈判代表团里，表明它依旧把越南看作是法国的殖民地。

我国报纸立刻揭露法国反动派破坏协定的手段。我们要求正式谈判必须按照平等的原则在巴黎举行，法国必须打消让殖民地部代表参加代表团的企图；有权代表法国政府同已经获得解放的越南对话的，必须是法国外交部的人。……路透社的消息既没有得到肯定也没有更正。

胡伯伯和中央同志们研究了派遣代表团去法国和大叻的问题，决定范文同同志率领国会代表团，对法国国会和人民进行友好访问。我被指定为出席大叻筹备会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副团长。团长由联合政府外交部长阮祥三担任。

四月十六日，两代表团同时启程。去大叻的代表团在早上六时从北部府动身。胡伯伯一早就来送行。他一

再嘱咐我们：“南部问题和停战问题要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临别时，胡伯伯同我们一一握手。

天下着毛毛细雨。街道沉静。人民群众事前不知道两代表团的启程时间，来不及欢送。在这之前几天，各地举行了大集会，表示支持各代表团的的活动。

一些记者向代表团访问谈判的前途。这实在不好回答。一切答案都还在前面。只要法方真诚地履行已经达成的协议，尊重自由的越南的基本权利，我们是愿意采取政治解决的。可是，谈判的成败，不但取决于我方，而且取决于对方。在印度支那和法国，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正在进行尖锐的斗争。最初的迹象表明前途并不怎么乐观。有消息说，法国谈判代表团由麦克·安德烈率领。这表明法国政府接受我方的要求，从法国派来代表。但是，麦克·安德烈是银行界的人，人民共和党人。这个党原是法国基督教党，其头头都是同美国和梵蒂冈有关系的垄断资本的代表。这样一个对话者，会议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我们方面，谈判代表团的成员也不单纯。阮祥三上个月曾拒绝在协定上签字，最后只得由武鸿卿代签。另外，代表团名单已经公布，可是动身时，一些南部代表还没来。

七时正，飞机起飞。从空中透过层层云彩俯瞰，我们时而看见碧蓝的海洋白浪相逐，时而看见峰峦迭障的长山一片翠绿，有时看见阳光灿烂的弯弯曲曲的河流。这是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哪！

这天，我们乘坐的达科塔型飞机在老挝的巴色着陆

加油，起飞时机器发生故障，只好留下，等待从西贡来的预备机。我们上街蹒跚，参观一所古寺，然后来到湄公河畔。这是老挝和泰国的分界河，河面宽阔，河水夹着泥沙呈红色，两岸土地平坦。旅居巴色市的越南侨民听说越南政府代表团路过，纷纷前来探望。这种不期而遇的会晤实在令人感动。

第二天，飞机继续飞往大叻。一下飞机，我们就感觉到气候大大不同。在巴色，炎热炙人，这里却凉爽带寒，象深秋时节。大叻是专供法国人和越南“上流”阶层避暑、旅游的城市。大小别墅、旅店、赏景小路随处可见。市周围松坡延绵。确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我们代表团住在琅邦旅馆。这个旅馆树木环抱，面临平湖，隔湖是山。湖景优美，法国人却给它取名“叹息湖”。

四月十八日，上午九时，法方来人通知我方说：十时十五分，达尚礼在官邸接见越法双方的代表团团长，然后接见两代表团全体成员，以便介绍法国代表团和新指定的团长麦克·安德烈。这事先并未同我方商量。他想用法国高级专员的名义，在印度支那联邦的一座官邸里接见两代表团，这是一种傲慢的做法。法方来人还说，两代表团会晤后，达尚礼立即主持首次全体会议开幕式。这也是法方的主意。当然，我们不能赞成。

我们派出代表团秘书，去通知法方说：越南代表团团长提议会见达尚礼，就法方所提出的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十时，法国代表团来到了达尚礼官邸。各报记者也来了不少。他们一直等到十一时。我代表团坚决反对达尚礼的这种傲慢的会见，空气变得紧张起来。

法方下不了台，改为设宴招待我方，借以解嘲。于是，两代表团和高级专员先生的首次会晤便在餐桌旁进行。达尚礼以高级专员的名义主持会议开幕式的企图告吹了。

我这是第一次同达尚礼见面。这位半途破戒的修道士布满皱纹的额下，长着一双精灵犀利的小眼睛，双唇很薄。只要跟他谈上一会儿，就可看出他是个老练、狡猾、自负、胸怀狭窄的家伙。这样一个人物，只能是殖民政策的卫士，保守主义者。

达尚礼夸耀说他对我们颇为了解。他问及我的家庭状况、地下活动，以及日本实行高压政策时期的情况，表示希望多有谈话的机会。他还邀我星期日一起爬山。双方也都谈到了越法邦交的展望。我说：“困难肯定还很大，但不是不可克服的。只要法方也作出努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达尚礼说有人把他叫做“沉默、刻苦的人”。大概他要夸耀自己是个道道地地的修道士吧！事实上，与其说他是修道士，倒不如说他是阴险的政客。

通过这次会晤，双方同意第二天举行全体会议。开幕式由越南代表团主持。这是法方的第一个让步。然而，绝不意味着困难已经减少，双方已经接近。

四月十九日上午，越法谈判筹备会在叶圣中学校举

行首次全体会议。法国代表团成员中有不少原统治官，如麦斯梅、普斯杰、比绒等等。有的在我国八月革命初期就来到印度支那。麦斯梅一九四五年九月由飞机空投到越南北方，被我民兵捕获后逃脱。

四月二十日，政治小组开会。我们要求把为谈判创造有利的政治空气和南部停战问题首先列入议程。法方开始转弯抹角，推说这些问题超出两代表团的权力而回避讨论。我方援引“三·六”协定的法律依据和一般道理，把对方逼到墙脚。经过长时间争论，法方有一定的让步，同意把“为谈判创造有利的政治空气”列入议程。我们要求南部停战问题也得列入。

休息时，法国代表团交换意见。会议继续，法国代表团的政治顾问比绒又说是他们无权解决南部停战问题。我们反问道：

“请问，法国代表团有没有权讨论‘三·六’协定的问题？”

“有嘛。”比绒勉强地答道。

“那么协定不是明文规定：‘缔约双方应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立刻停止敌对行动’吗？”

对方狼狈不堪。直至上午休会时，他们还没有找到回答。问题只好搁下。

法国人的反动态度已经显而易见了。对这次谈判不可能寄予很大的希望。不过，我们同法国的谈判还在继续。

黄昏时分，我在甘漓溪畔散步。路上落满松叶。溪

畔，野桃金娘花盛开。凉风习习，松涛阵阵，令我留连忘返。这城市环境幽静，空气清新，风景优美，真不失为我国的名胜。傍黑，我转回旅馆。我坐在办公桌旁，刚写下一点东西，忽听紧急的敲门声。我还没有站起来，门就开了。一位同志探进头来，急忙地说：

“请你到楼上，范玉石[⊙]同志来了。”

范玉石同志正在南部战斗。已经公布的代表团名单有他在内。我们一直认为他是不可能来参加谈判的。他来得正好，谈判刚刚开始。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来到这里的？这件事，法国人还不知道。

转眼间，除阮祥三之外，代表团全体成员来到了范玉石同志的住处。范同志黑瘦而结实。我紧紧地跟他拥抱。我们又高兴又激动。他向我们叙述了从西贡来大叻的冒险的行程，南部局势以及军队和群众的英勇战斗事迹。说话还带着南部的战斗气息。我们一直谈到深夜。

第二天，范同志在花园旅馆前被法国人逮捕。我代表团强烈抗议。我国政府也谴责法国的这一非法行为。许多地方群众举行集会，要求法国人释放范玉石同志。可是，谈判结束后，范同志才获释。

十二

会议开得很紧张。除了全体会议、小组会之外，还有许多会外交谈。麦克·安德烈、麦斯梅、波尔根，有时达尚礼也参加这些非正式谈话。但是，在所有的问题上，

[⊙]越南民主共和国已故卫生部长。——译者注

谈判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我代表团在各次讨论中都保持了一致性。只有阮祥三回避大部分会议，也不经常参加团里的讨论。

停战问题的讨论持续多日。会议气氛沉重。法方知道我决不放过这个问题。面对着我们的义正词严，对方显得手忙脚乱。印度支那经济问题专家波尔根不得不说道：“这个问题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他们（按指我代表团）很有道理。”另外，还有几个法国人也有同样的想法。

经过几次会议，大叻居民开始议论法方的无理论据。甚至法国代表团也有人对我们直说：“你们有可怕的辩证者。”

法方没有什么理由拒绝我方的要求，但也不肯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显然，他们是不愿意在南部停止敌对行动的。

我代表团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谈判应该继续或是中止？

四月二十三日，两团举行全体会议。我方又一次提出南部停战问题。对方作了一定的让步，建议由两代表团成员以外的人员成立有限混合委员会，以便实施南部停战，并解决其它紧急问题。这个委员会初时驻大叻，以后移驻河内。

我方看出这是缓兵之计。不过，法方的这一让步使会议得以继续。

四月底，法军总参谋长约安将军从南京回巴黎，途经

大叻，来访会议。在大约二十分钟的会见中，我一针见血地对他说：

“法国方面必须按照协定的精神，在南部停止敌对行动。否则，越南人民将战斗到底。我是以一个抗战者的资格向你说这句话的。”

尖锐的争辩，不但发生在政治小组会，而且发生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小组会。

经济方面，我们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权益，保障越南经济发展的条件，同时，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经济权益也有一定的让步。这个小组会所讨论的问题是：关税、金融、法国人在我国的现有企业和经营。

主要分歧围绕着金融问题和法国人在越南的经营问题。

文化方面，双方达成了一些协议。存在分歧的只剩下两个问题：法方要求在印度支那设立一些隶属联邦的文化机构；用法语作为次于越语的第二种正式语言。

军事方面，经多次讨论，一无所获。军事问题从属于政治问题，后者未能解决，前者就不可能达成协议。

政治问题是个尖锐的根本问题，在谈判过程中所占时间最多。

我方的原则立场是：越南必须是个自由国家，印支联邦只能是经济性的，不得损害越南的基本权利。

对于印支联邦成员国同法国的关系，我团宣布结束总督制，主张成立实际上纯经济性的联邦；法国驻联邦的代表，只有外交官员的资格；联邦在不损害各成员国

主权的原則下协调其关税、金融政策和建设计划。

法方主张法国高级专员既是法兰西共同体的代表，又是印支联邦主席。他们要求司法、外贸、财政、汇兑、运输、卫生等部门，文化、科学、经济研究机构，以及统计院、邮政无线电局、移民署等均隶属联邦。这就暴露了法国企图复辟总督制的阴谋。

法方建议越南承认关于法兰西共同体人民权利的宣言。我们表示欢迎宣言的民主原则，但不予承认。法国人民也没有承认。其实，法国人自己也没弄清他们所主张的“法兰西共同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外交方面，我方的立场是：越南将向法国派出大使，法国高级专员是驻越南外交代表。自由的越南有权向法兰西共同体各成员国和外国委派大使。法方主张，在越南的法国代表，是由法国高级专员委派的法国官员。越南只能通过法兰西共同体委派驻各国外交代表。

关于南部问题，“三·六”协定规定将通过公民投票予以解决。我方主张：越南领土包括三圻，所以投票的目的不是确定南部的归属问题；而是征询南部人民的意见，要不要在统一的越南国家的范围内，维持“圻”的界限。法方则主张，投票也同时征询南部的归属问题。

根据我们的观点，公民投票理所当然地只在南部举行。可是法方却要求中部和北部也举行投票，征询每圻的归属问题。

为使投票合法和公正，我方主张保障投票者的自由，建议在南部实行三十人委员会临时执政制。这个委员会

选出执行委员会，其职能是在短期内彻底实现停战，全部释放政治犯，彻底停止迫害，让人民群众的各种政治组织得到自由活动。法方含糊其词，只说是保障南部公民投票的自由，而不同意越南人参加南部当前的执政。

双方的立场显然距离很大。代表新法国参加谈判的人远远落后于这个半岛上的根本变化。他们依旧深深地保留着法帝国主义传统的殖民主义思想。法国团长麦克·安德烈的反动本质日益暴露。在一次宴会上，他曾说过：“对于越南，法国人已经很大方了，让步太多了，不可能老是让步，不可能走慕尼黑的老路。”

也是这个五月初，在法国，新宪法草案在民意测验中遭到了否定。这是法国争取民主运动的又一巨大困难。右翼又赢了一局。殖民地的法国反动派将会抬头。我们的斗争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五月十日，又举行全体会议。我方再就南部公民投票问题阐述自己的主张。法方依旧保持顽固态度。我们向他们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些法国人阴谋把南部从越南分割开来。这是不能答应的，也注定要破产的。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我团全体退会。

晚上，团里开过碰头会后，我深夜未眠。窗外漆黑一片，湖山难辨。秀丽的松坡，琅邦高原的荒山野岭完全笼罩在夜影里。我国人民和游击战士正在那遥远的深山密林里进行的战斗将继续下去。

关于会议情况，我们经常向胡伯伯和中央报告。我国报纸和电台及时地反映了我代表团在会议上的斗争。胡

伯伯和中央非常严密地关注着会议的演变。在今天上午的会议，我曾向法方指出“在争取祖国自由的战斗中历尽千辛万苦的越南战士，只能接受公正和体面的和平……”。我以一个经受了数千年劳动和斗争锤炼的民族的名义，肯定地告诉你们：南部一天还被从越南分割开来，越南人民就一天不停地拿出自己的全部毅力进行斗争，使南部回到祖国的怀抱。如果我们的呼声得不到应有的回答，协定得不到尊重，那么，对将来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是不负责任的。……历史将会证明我们的话是正确的。”要说的话，我们都对法国人说了。可是，他们一味死抱着殖民主义立场不放。通过这次谈判，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反动派顽固抗拒的程度，也更深刻地体会到：在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的正义斗争中，外交必定要以人民的力量为后盾。每个越南人都要具有坚强的毅力，坚持不懈地充实自己的力量。民族要强大，祖国要强大，这是外交工作的前提。我不禁想起胡伯伯的一句话：“实力好比铜锣，外交好比锣声，锣大声才响。”

这天上午的会议成了大叻谈判的最后一次会议。虽然如此，这只是地方性的筹备谈判。我国同法国之间的联络线还没有完全中断。

十三

五月十三日，我们从大叻回到河内。国会访法代表团还没回来。这个代表团离河内一周后，西贡各通讯社报道说：“南圻代表团”已经启程，前往法国，以便向

法国政府汇报並要求给予南圻“自治”。这帮家伙由阮文春带头。这是高级专员的又一新花招。

五月十八日，首都的《救国报》以《胡志明老先生和越南民族》为题，发表文章说：“五十六年前（一八九〇年）的明天——五月十九日，诞生了一个人：胡志明。是他，用灵巧和坚强的双手缔造、培育了许多越南革命组织；是他，天才地熏陶了越南革命战士的革命精神。……”

文章提到了胡主席对革命的贡献，歌颂他是越南革命的灵魂，是越南革命的化身，还论述了“五·一九”的重大意义。越南民族第一次得知胡主席——使我国人民获得翻身、换了人间的大功臣的生日。

我们知道胡主席的脾性，所以准备只举行很简单的纪念会。

同一天，达尚礼到达河内。这是法国高级专员第一次来到我国首都。他来访的目的也象他所抱的种种阴谋一样，是不可告人的。在下龙湾会谈中，他曾同胡主席商定：我国政府参加正式谈判的代表团最迟于五月三十一日启程赴法。五月三十一日快要到了。法国政局还是一片混乱。各党派正在热衷于竞选运动。法国政府总理的职位未知落入谁手。在这种情况下，达尚礼不愿意让越南政府代表团到法国谈判。加之，谢丁所串演的“南圻自治”丑剧，角色又没有准备好。法国政府还没有正式批准达尚礼的这一政治安排。基于这种种理由，达尚礼企图向胡主席建议推迟我政府代表团赴法日期。他也

奸狡地想趁此行，向我方放出“南圻自治国”即将成立的风声。

这天下午六时，达尚礼和瓦吕、克列宾到北部府拜会胡主席。

黄叔抗和阮文素两位老先生及我们几个陪同胡伯伯招待客人。胡伯伯举杯祝贺达尚礼，说道：

“新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高兴地欢迎法国的代表。继下龙湾会谈、大叻筹备会及越南国会代表团在巴黎对法国国会的友好访问之后，今天，阁下访问河内，肯定将使越法邦交有新的发 展。”

达尚礼致答词，态度文雅地说道：

“明天是主席的寿辰，我谨祝主席长寿。我相信，从现在起，法国和越南的亲善关系将日益增强、日益发展。”

五月十九日早晨，中央常委会和政府中的各位同志向胡伯伯祝寿。我们能在胡伯伯的生日里齐全地围绕在他身旁，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在这个日子里，他往往外出。正如素友同志在一九七〇年春初缅怀胡伯伯的诗所写的：

興許您像往常外出了
聲聲贊歌用來頌江山……

确实如此。胡伯伯不喜欢谈及自己的事情，也不喜欢听到人们对他的歌颂。他尽可能谢绝给予他个人的种种荣誉。

北部府门前响起了阵阵铜鼓声。孩子们来了。胡伯

伯亲自出迎。十多名男女儿童代表市区和郊区全体儿童向胡伯伯祝寿。这些儿童代表中间，有卖报童，也有在行粉街孤儿院生活的孤儿。他们争着把儿童队的队徽别在胡伯伯的胸前，还把象征着扫盲运动的“i”、“i”字样及印有儿童救国会章程和会歌的小册子送给胡伯伯。

胡伯伯赠给儿童们的礼物是一颗柳杉。他指着盆子里叶色翠绿的小树，说道：“我送给你们这棵树。将来它能长出一百个叶伞。你们把树照料得好，让它长大，就是表示对伯伯的热爱了！”

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唱了一支歌，表示感谢，然后抬着盆景走了。他们刚离去，就来了五十多个男女青年。男的穿卡叽服，女的穿黑色“三婆”服。他们是代表战斗的南方来向胡伯伯祝寿的。

听过青年们的祝贺，伯伯说道：“我感谢南部兄弟姐妹们来向我祝寿。其实，是报纸把我的生日搞大了，五十六岁也象青年一样，还不值得祝寿。在北方的安乐环境下，同你们在一起，我因为南方还没有太平而感到很惭愧。”

两颗热泪流在胡伯伯的脸颊上。南部同志们无不热泪盈眶。

不一会儿，根据政府的法令上个月才成立的新生活运动中央委员会代表前来祝寿。趁此机会，代表们请伯伯给运动提个口号。伯伯说：

“你们需要口号吗？‘勤俭廉正，大公无私’，就

这个口号吧！”

一位代表对伯伯说，这口号已经听惯了，请给提个新的，使之符合新生活运动。伯伯笑着说道：

“我们每天要吃饭、喝水、呼吸空气才能生存。从前我们的祖先是这样，现在我们是这样，将来我们的子孙也是这样。因此，吃饭、喝水、呼吸空气求生存，永远不会变旧的。‘勤俭廉正，大公无私’对于新生活也是这样。”

同天，法新社会记者就半途中止的大叻会议访问胡伯伯。伯伯说道：

“两国代表已经坦率地、有时甚至无情地阐明了各自的立场。这是个好办法。由此，双方比过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些问题已经达成协议，有些问题还有分歧。不过，这只是一次筹备会议。巴黎会议的任务，是批准大叻会议所达成的协议，并调和意见冲突。这些意见冲突不至于不能解决。越法两个民族应该达成协议，以实现亲善合作。我们将给谈判打下牢固的基础。”

对于法国反动派的破坏活动，胡伯伯想方设法加以制止，以便如果不能避免战争，起码也能延长缓和的时间。

在河内的几天里，达尚礼竭力说服胡主席推迟越南代表团赴法日期。他极力证明，这样做是为谈判的成果和越南的利益着想的。谈话间，达尚礼巧妙地提到了当前的一个“困难”，那就是他“不可能继续阻挠南圻民众要求自治的愿望”。这是预先为他即将背叛“三·六”协定的行径作的辩护。

然而，花言巧语掩盖不了达尚礼的赤裸裸的阴谋手段和丑恶行径。我们很清楚，正式谈判推迟一天，达尚礼和在印度支那的反动派就多一天时间，来推行“既成事实”政策。胡伯伯坚决要求达尚礼恪守下龙湾协议规定的越南代表团赴法日期：最迟不超过一九四六年五月底。

说服无效，五月二十二日，达尚礼失望地返回西贡。

河内各报报道：越南代表团将于五月三十一日启程赴法，参加正式谈判。

达尚礼的时间不多了。西贡的法国反动派作出了种种努力，为的是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谈判代表团踏上法国土地之前，把“南圻自治”丑剧搬上舞台。

十四

帝国主义为了在人类面前掩盖它的丑恶面目，便到处招摇撞骗。当法国殖民地面积比法国本土大到将近二十倍的时候，法国著名政客、战争部长克里蒙梭仍极力向世界证明法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旁加来总统则自我吹嘘法国是懂得殖民方法的头号殖民强国。对殖民地人民敲骨吸髓，以酒精和鸦片毒害他们，把他们箝制在黑暗愚昧之中，按殖民主义者的说法，却是给落后民族开化和带来文明的非常人道的事业。

殖民主义者和殖民地的统治官吏推行的是“鸵鸟政策”[⊖]，贪得无厌地进行搜刮，制造累累罪恶，却欺骗

⊖ 胡伯伯用語，仿照法國諺語“駝鳥之胃”。這裏是指法帝國主義貪得無厭。

自己的同胞，有时甚至欺骗本国的执政者。胡伯伯在国外的時候，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对于法国的代表人物在遥远的地方的作为，不要说法国人民毫无所知，就是法国政府的许多官员也是迷迷糊糊。伯伯曾指出：“两国的无产阶级互不了解，所以产生了一些成见”，“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放过利用这一互相间的猜忌……，来阻挠宣传工作和离间本来应该团结起来的力量”。胡伯伯认为，帝国主义是“一条有两个吸盘的蚂蝗”，一个吸盘吸住殖民地，一个吸盘吸住本国的无产阶级。要想消灭帝国主义，我们就要把它的两个吸盘都割掉。

为了撕破帝国主义的欺骗面目，革命家阮爱国很早就当过新闻记者、演说家，有时还成了剧作家。在报刊方面，胡伯伯曾进行过多样的独特的活动。他用法文写的锐利的文章，剥掉了殖民主义那厚厚的脂粉层。可是，统治者以其所有的一切现代化宣传工具和狡猾的手段，仍然不断地进行种种欺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帝国主义抛出这样的论调：法国人重至印度支那，为的是把那里的民众从日本法西斯的奴隶枷锁下解放出来。殖民者还诬蔑越盟是给日本法西斯当走狗的叛乱组织。据访法回来的我国国会代表团说，不仅许多法国人不了解我们，就是许多旅法越侨对国内的情况也是一知半解。

在革命活动中，伯伯经常指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主，同时，也要非常注意争取朋友的同情和帮助。他坚定

地相信本国人民，也非常相信各国的劳动人民。就在革命成功后，他也经常指出要使各国人民了解越南革命，支持我国的正义斗争。他接见了几乎所有来河内访问的外国记者。得到伯伯接见的记者都很敬佩他老人家，通过胡伯伯，他们更了解我们了。

胡伯伯指出，签订初步协定，是我们必须尽力利用来扩大国际宣传的一个机会。三月九日党中央常委的指示还指出：“立即与法国共产党密切联系，以便实现我们与法国同志的共同行动。”在法国沦陷的年代里，法国共产党人曾经站在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争取祖国解放的斗争运动的最前列。法国共产党在群众中有了很大的威望。尽管碰到反动力量的猛烈反扑，法国争取民主与进步的斗争正在取得胜利。胡伯伯清楚地看到，法国人民的斗争与我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基于以上理由，常委会认为必须要求法国在巴黎举行正式谈判。在巴黎的谈判肯定会得到法国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并能减少那些同殖民制度有着利害关系的殖民者和统治官吏的捣蛋。即使谈判达不到预期的结果，也能使更多的人了解越南革命。这将有利于我们今后的长期斗争。

当然，选巴黎作为谈判地点，我们也有种种困难。许多领导同志要在同一个时期外出。谈判肯定会拖延，而国内形势又可能发生突变。伯伯与中央同志们研究了他应不应该在这个时期去法国的问题。过去，伯伯曾被法国反动派判处死刑。假如调停碰到困难，法国翻脸，

那不是没有问题的。经过衡量，伯伯决定和代表团一起去。

我国代表团由范文同同志任团长，成员有：黄铭鉴、潘英、谢光宝、阮文熿、郑文炳等，阮祥三也列入代表团名单，但最后他推病不去。几天后，国民党说阮祥三的这种做法，是对我们与法国之间的谈判表示不赞同的态度。

胡伯伯虽然一起去，但不在代表团内。他是以前法国政府贵宾的资格去的。

伯伯和代表团的启程日期已到。

五月三十日，大雨倾盆，首都五万同胞队伍整齐，在越南学舍参加欢送会。人们拿着这样的标语牌：“越南完全自主”、“南部是越南的土地”、“越南领土完整”、“拥护胡主席”、“拥护代表团”、“向法国人民致敬”……

这是同胞们第一次欢送胡伯伯远出。

七时三十分，胡伯伯和代表团来到会场。那天，参加集会的还有沙兰，他是由法国高级专员指定陪同伯伯去法国的。伯伯在集会上讲话，说：

“执行政府的命令和国民的意志，我和代表团一起到巴黎进行正式谈判……我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祖国的利益和国民的幸福而奋斗。我无论是隐蔽在深山密林，入狱坐牢，赴汤蹈火，都是为这个目的。到国民团结夺得政权的时候，委托我承担共同的工作，我日夜操心，忍辱负重，也是为这个目的。不管什么时候，不管

在什么地方，我也只有一个目的：益国利民。这次，我向同胞们保证：我和代表同志们将努力做到不辜负国民的信任……”

胡伯伯提出了配合外交斗争必须做到的四点：

一是紧密团结，防止分裂。

二是克勤克俭，防止饥荒。

三是努力维持治安，绝对服从政府的命令。

四是对外国侨民要友好、温和。

当天下午和晚上，各省代表的车队从各方开进河内，准备明早欢送伯伯和代表团。车上挂有胡主席像，贴满了标语。

三十一日，伯伯很早就起床。他给南部同胞写了一封信：

“……南部同胞是越南的人民。水可枯、石可烂，这个真理永不会变！

“我劝告同胞们广泛地紧密团结。五个手指有长有短，但长短都是一个手掌的。几百万人中，有的人这样，有的人那样，但这样或那样都是我们祖先的后裔。所以我们要宽宏大量，我们要承认既是雏鸿子孙，谁都多少有爱国心。对于误入歧途的同胞，我们要用亲爱之情来感化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有了大团结，前途肯定是光明的。”

代表团的同志们服装整齐地来到北部府。胡伯伯从内室走出来。他依然穿着日常穿的那套黄布制服，不同的只是脚上穿着黑皮鞋。

清晨，同胞们举着红旗和胡伯伯像，浩浩荡荡地涌向嘉林。旗子映红了龙编桥。天气还是不好，天空布满云彩，好象人民今早欢送伯伯远出的心情一样。

嘉林机场上人山人海。胡主席绕场一周，向代表和同胞们致意。同胞们挥动旗子、鼓掌、欢呼，争着挤到前边，以便看清即将远出的胡伯伯。

上飞机之前，伯伯抓住黄叔抗老先生的手说：“我为了执行国民交给的任务要远出一些时候，家里种种困难事情全靠你和弟兄们来解决。希望你以不变应万变。”

黄老很是激动，抓住伯伯的手久久不放。伯伯委任黄老在伯伯出国期间代国家主席。

突然间，伯伯把代表团的同志叫来。范文同同志和同志们围着胡伯伯。肃静一分钟后，伯伯说：

“我们大家身负重任出国，在国民同胞面前，我们要保证，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团结一致，圆满地完成祖国交给的任务。”

同志们一齐举手，高声喊道：“宣誓！”

祖国欢送伯伯出国，把全部信念寄托在伯伯身上。

两架军用飞机载着代表团，先后离开机场，渐渐消失在云彩重重的天空。

那时期经常发生飞机事故，所以那天我们都有个顾虑，可是谁也没说出口。维新[⊖]被法国人送回国时，路

⊖ 維新：阮朝皇帝，在位從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六年。一九一六年，維新十八歲，因舉行抗法起義，被法國殖民者廢黜並流放到印度洋的雷尼汪島。

上就是因飞机失事而死亡的。

胡伯伯似乎知道同胞和我们的忧虑，所以每到一处，他都打电报回来。第一封电报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二日到印度时打的，电文写道：“我们在仰光过一夜后已经平安到达加尔各答。明天我们又继续行程。请政府向同胞们和到嘉林送行的法国友人表示感谢。我寄给儿童们多多的吻……”

十五

四月间，法国总参谋长约安去重庆途中，停留在加尔各答。达尚礼暗中派人送信给约安，要求他召回黎格勒，理由是这位总司令不遵上令。约安便决定把黎格勒调去担任驻北非法军总监。就这样，这位海军上将踢开了他在印度支那的主要对手，以便任意行动。

西贡的法国反动派虽然已经想尽办法阻挠我国代表团的行程，但是，载着伯伯和代表团的两架飞机毕竟已经飞向法国的首都了。时间对于达尚礼是很紧迫的。他只能继续推行“既成事实”政策。达尚礼不等法国政府答复，就把谢丁仓促准备的“南圻自治”丑剧搬上了舞台。

六月一日，伯伯启程后仅仅一天，以阮文听医生为头头的所谓“南圻共和国临时政府”就在西贡出笼了。为了混淆黑白，法国代表和“南圻共和国”代表也搞了一个协定。在这个协定中，高级专员几乎照抄了“三·六”初步协定的第一条：“法国政府承认南圻共和国是

一个自由的国家，有它的政府、国会、军队和财政，并为印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南圻共和国临时政府”有不可掩盖其充当走狗面目的地方，那就在于它有一位被公开宣布为负责“共和国”内外安全的法国顾问谢丁。

常委会认为，显然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反动派正在明目张胆地加紧破坏活动，阻挠即将举行的谈判，尤其是在法国政局动荡的时候。即将到来的斗争肯定是非常复杂的。我们更应该高度警惕。

我们知道达尚礼不会停留于此。

六月二十一日上午，我正在北部府办公，有人通知说瓦吕要求接见。

瓦吕走进办公室，举手行了个军礼后，说：

“我是一个军人，有任务执行上级的命令。我是为交给越南政府一分照会而来的。”

我曾多次在军事会议上见过瓦吕并和他一起工作。瓦吕是一个阴险的人，表面乔装温和、开朗、文雅。在欢送伯伯的宴会上，他把刚从法国来的女儿带去介绍。那天他认为自己已经老了，并愉快地说道：“我们让年轻人坐在一起吧！”

这次，瓦吕的态度有点异常，我感到可能又是一个挑衅事件。我说：“你把照会给我吧！”

瓦吕把函件递给我后站着等待。我打开来看。这是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主席的一分照会，言词简短：

“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海军上将达尚礼已经下令

法军占领蛮夷高原地区[⊖]，就象他在河内时曾对胡志明主席说过的那样。”

瓦吕专注地观察我看信时的态度。这是阴险的破戒修道士的又一侵略行径。我向瓦吕说：

“如果你是为执行上级交给的任务而来的话，那么你的工作已经完毕。”

瓦吕走了。

这天晚上，我们得到消息说，早上四时，法军突然攻打卡岭附近的都蓬。他们的飞机低飞轰炸扫射，十时，步兵进攻大岭，遭到我军猛烈还击，只好撤退。

次日，六月二十二日，法军攻打弘山的一些地方，遭到回击，又撤退了。

六月二十三日，法军偷袭位于波莱古通往柬埔寨路上的波莱梅登我军据点。

战事在西原地区蔓延开来了。

达尚礼蚕食西原地区，以便准备炮制“西圻共和国”的阴谋暴露无遗。我西原各武装力量奉命坚决抗击法军的一切强盗行径。黄叔抗代主席向法国发出照会，痛斥法国的狡诈论调，并坚决反对其非法行动。照会写道：

“胡主席从来没有得到法国人通知说法军将要占领西原地区，而且主席决不会以任何方式同意这种占领。”

六月二十五日，在河内，发生了法军侵占旧总督府事件。

⊖ 即西原地区。

蒋军撤走之前，我们与法方曾就这个区域的接管问题举行过多次协商。瓦吕同意等待巴黎正式谈判的决定。可是，卢汉一离开旧总督府，法国就立即派兵占领。我方向瓦吕提出抗议。瓦吕推说那只是一部分人来做保管工作。

法国占领旧总督府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

“不能让法国反动派和殖民者得寸进尺，必须制止它们的魔掌！”六月二十七日，各党派、团体号召河内、海防和其他法军驻地的同胞总罢工、罢市。我国政府同意让人民对法军的非法行为表示反对态度。只有各机关和水、电供应部门照常工作。

在法军驻扎的所有地方，同一天举行了罢工罢市。我国政府和人民的这种坚决态度使法方有所顾虑。瓦吕被迫宣布法军到旧总督府只是为了接受蒋军的移交，以后，总督府将由双方部队守卫，直至巴黎正式谈判作出决定时止。

十六

那年七月，趁法国革命纪念日（七月十四日），法军司令部要求我们让他们在河内各条大街上举行阅兵式。

我方还没答复，七月十一日，常委会就得到公安厅的报告：越南国民党反动派在准备搞非常严重的挑衅事件。他们打算派出爪牙埋伏在法军列队通过的路上，向法军开枪和投掷手榴弹，给法方提供制造事端的借口，

然后散发传单，叫喊推翻政权，同时跳出来与法国人勾结。他们正在印刷传单、准备武器。

我们知道国民党表面上疯狂地攻击我们与法国之间的调停，暗地里却想方设法和法国勾结。他们早就与法国联系。至于法国，一方面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也抱着险恶用心。法国反动派中，不是没有企图利用越奸分子进行冒险的家伙。

公安厅受命严密地监视反革命分子的一切活动。

当时的越南国民党组织是两个反动集团互相勾结的产物。其一以武鸿卿为首，很早就到国外，得到蒋介石的豢养，与国内没有什么联系。另一派属于一九三九年成立的大越亲日集团，其中包括阮祥三、周伯凤等等。大约在一九四五年年初，大越派知道日本将要失败，便到云南找武鸿卿，并在越南国民党的旗号下合并起来，以便于跟蒋介石国民党勾搭。大越派的头头跟随蒋介石的走狗，只是为了暂时找个安身之地，以免其亲日罪被揭发，暗地里则各怀鬼胎，轻视越南国民党。卢汉撤军时，亲蒋派跟着主子的屁股跑到国外。大越派的大部分留下，存心等待时机，另投主子。上述的新阴谋就是由这些家伙策划的。

常委会知道反动派的阴谋后，决定：一面以安全为理由，拒绝法军举行阅兵的要求；另一面指示公安厅迅速行动，先发制人；粉碎反革命阴谋。

七月十二日清晨，一支公安突击队突然搜查明开路一百三十二号的国民党办事处，当场查获反动派的物

证：一部印刷机和一堆墨迹未干的传单。

七时，北部公安局同时搜查了在河内的许多越南国民党办事处。在禅光湖的三处，反动派用轻机枪顽抗。战斗自卫队配合公安队，在周围的房屋部署火力，迫使他们投降。

在温如候街⊖七号，我们查获一个伪造纸币的地方，和一个有许多刑讯器械，如发电机、钳子、铁锤等的房间，墙上血迹斑斑。还在后园挖出了七具尸体，有的尸体被砍成数截。两个被绑架勒索即将遭受毒手的人得救。

据公安同志们复述，在搜查这座房屋时，有一个穿西装短裤、佩着日本剑的家伙进来。他装腔作势，高声自称为越南国民党领袖，是国会代表，任何人不得侵犯。一个被绑架的人当堂指着那“国会代表”的脸说，昨天正是这家伙用剑架在他的脖子上，强迫写信回家要赎金。

同胞们听说挖到许多尸体，来看的很多。有的人认出了失踪的家人的尸体。反动派杀人的原因实在不堪设想。除我方干部被他们抓去杀害以外，还有路过的妇女被拉进去强奸、夺钱后杀害；有的车夫给他们拉车逛街，半夜到此被他们杀死，为的是免付车钱。

次日清晨六时，我公安人员继续搜查设在观圣街的越南国民党办事处。这个区域紧靠法军驻地。反动派相信

⊖ 现在的阮家詔街。

将会得到法军的庇护。我方人员来搜查时，他们利用厚墙，用冲锋枪和轻机枪顽抗。战斗持续两小时，法军装甲车开来威胁我方人员。混合监察委员会的我方代表立即干涉，法军只得把装甲车开走。我方人员冲进屋里，截获反动派来不及烧毁的大批材料。

在杜友渭街（即现在的北门街）的越南国民党中央机关，我们也找到了许多男女尸体和一些法国兵的尸体。反动派杀害这些法国兵的目的是，在法国人与我们政权之间制造事端。在查获的材料中，有一分暗杀和绑架的计划。国民党打算大搞暗杀法国官兵、绑架法国妇女和儿童。这件事情交由一批特务在七月十日到十七日内完成。

黄代主席和我们一起到温如候街越南国民党办事处察看。

过几天，几个越南国民党分子到北部府，要求会见代主席，声明他们党的革命路线。黄老听了干部的报告，就问：

“他们在哪儿？”

黄老站起来，拄着手杖出去。一看见这班家伙在楼梯口，他就用手杖指着，大骂道：

“强盗！无赖！亏得你们这些人也说什么国家，什么民族！”

黄老一转身，拄着手杖回到办公室。

温如候事件后，过去政治上最幼稚的，多少还相信越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的人，也都觉醒了。

七月十六日，在记者招待会上，黄老以政府代主席的名义宣布：

“团结是建设民主共和制度所必需的，但不能借口‘团结’来做非法的事。我劝各党派、全体国民团结。但是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我要把不法分子提交法律处理。真正的越南国民党党员，得到在法律范围内自由活动的保障。法律是共同的法律……绑架、勒索、暗杀分子要受到法律制裁。胡老和阮（海臣）老签署的十条国令中曾提到这些场合，今天我只是依法执行。这不是党派的问题。前几天进行的搜查事件是维护治安所必需的……”

十七

从胡伯伯赴法之日起，在常委会的各次会议和汇报中，仁同志[⊖]等经常交谈在法国的谈判情况和国内日益紧张的形势。当时与伯伯和代表团的联系都要通过法国人。伯伯打来的电报收到得很迟。有的电报五日发，十五日我们才收到。对这件事，我们曾多次向法方提出抗议。因此，我们往往要通过法国和西方国家电台和报纸，以及各次会议的非常简短的公报来了解情况。通过伯伯留下的资料和一些随行人员的复述，下面我们介绍伯伯丰富多彩的活动的一部分以及这次谈判的主要演变。希望以后有机会，有关同志再向我们作充分介绍。

⊖ 长征同志的别名。当时，他任印度支那共产党总书记。

伯伯重新踏上三十五年前曾经走过的路。从那时至今，革命洪流奔腾不息。“拉督斯·特列维尔”号客轮上的一个亡国的越南青年，已经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位国家主席。

五月三十一日，由于天气不好，胡主席和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停在缅甸。那天，伯伯在仰光附近的贝古机场休息。

六月一日，飞机到达加尔各答。英国驻印度总督的代表和法国领事到机场欢迎伯伯，并把伯伯送到该省最大的东方大饭店。伯伯在加尔各答住了两天。印度各地越侨纷纷前来拜访，有的人要走上成百公里路，许多妇女离开伯伯时流下了热泪。

六月四日，胡主席到阿格拉。他和代表团一起参观了该城的名胜古迹。

六月五日，伯伯到卡拉奇。斯尔梅蒂总督得到伦敦英国政府的通知说胡志明主席将路过这里，并指示他迎接。

六月六日，伯伯到达伊拉克的哈巴尼亚。这里的天气热得草木不能生长，人们要用锌制草木，漆上碧绿色，以减少对眼睛的刺激。

六月七日，在往开罗的路上，飞机在耶路撒冷上空盘旋一周，让胡主席观看巴勒斯坦的古都。代表团在开罗休息三天。埃及人民正在进行斗争，要求英国军队撤走。城市优美、宽阔、繁荣，但空气却有些紧张。在这里，伯伯接到从巴黎打来的一封电报：请胡主席暂到比

阿里茨休息，等法国政府成立后，再接到巴黎。

六月十一日，飞机从开罗飞到阿尔及利亚的布利达。

六月十二日，飞机降落比阿里茨，这是一个避暑区，风景优美，位于法国西海岸，靠近西班牙。只有地方政厅代表到机场迎接，因为当时法国政府已经辞职，只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胡主席住在格勒敦饭店。代表团则继续前往巴黎。

次日，法国许多地方的越侨到比阿里茨拜访胡主席。有的人带着妻儿一起去。在英国、美国、新喀里多尼亚等地的侨胞也纷纷打来电报，祝贺胡主席。不少侨胞捐钱，请代表团带回国内。

许多法国政治团体到比阿里茨会见胡伯伯，如法国共产党、法国总工会和刚成立几天的法越协会等。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中，有些同志过去曾和胡伯伯一起活动，现在重逢了。伯伯向代表团介绍了我党几年来在复杂形势中的政策和目前的主张。

法国报刊开始报道越南的消息和评论越法谈判。

在比阿里茨的日子里，胡主席非常注意了解当时法国的社会情况。

大战后将近两年，法国人民的生活还非常困难。每天的口粮为三公两面包。每人每星期一公两肉类，一个月半公两黄油。……饭店服务人员向伯伯说，从战争到现在他们只买到一套衣服和一双鞋子。法国劳动人民正在进行激烈斗争，要求增加工资百分之二十五。

伯伯到比阿里茨十天后，法国政府才成立好。总理的职位由人民共和党首领皮杜尔担任，莫戴仍任法国海外领地部部长兼管法兰西共同体事务。

六月二十二日，法国政府请伯伯到巴黎。

胡主席乘坐的飞机有越南国旗和法国旗。金星红旗首次在法国的天空出现。

到巴黎上空，飞机绕了一周。从飞机上俯视，伯伯认出了艾菲尔铁塔，金色圆顶的拿破仑陵墓，蒙马山顶上的圣心教堂和多条大街汇集的凯旋门。伯伯默默地离开这个熟悉的城市是在一九二三年夏天。现在，它依然如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宣布自己的首都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到勒博杰机场欢迎主席的人很多。一面巨大的金星红旗飘扬在机场最高的旗杆上。许多金星红旗同三色旗相间。

飞机刚一降落，代表法国政府的法国海外领地部部长和礼宾司司长，以及海、陆、空军将领便上前迎接主席，然后陪送主席进场站。通过法国政府派海外领地部部长迎接胡主席一事，我们多少看到了新执政者对越南问题的态度。但是，一切仪式还是隆重的。红地毯从场站一直铺到停车处。一见到胡主席，法国各党派、各群众团体和越侨代表便涌过去。一位法国妇女代表向主席献花，並和他拥抱亲吻。

欢迎仪式开始。乐队奏越南国歌和法国国歌。许多越侨，在法国第一次听到我国国歌，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胡主席和法国政府代表参加升旗礼后，检阅了仪仗队。巴黎各阶层人民数千人，向胡主席撒花、挥手、欢呼。胡主席走到越侨工人、学生、知识界等团体的代表面前时，停下很久，跟许多人谈话，似乎忘了跟在后面的法国官员。成百个照相机、拍片机朝向穿着朴素的黄色布衣来到法国首都的国家元首。

法国通讯社的一位记者递过受话筒，请胡主席向法国人民讲几句话。主席说：“感谢法国政府和人民隆重地欢迎我。希望今后越南民族和法国民族平等、诚实、亲密地合作。”

汽车和摩托车队送胡主席到法国总统府附近的雷安·蒙梭大饭店。沿途，法国首都人民挥动旗子、手帕，向胡主席欢呼致意。

十八

胡主席到巴黎十一天后，法国政府才举行正式欢迎会。这种缓慢是谈判不顺利的征兆。

至此，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法国的总形势。

长期以来，法国政权一直掌握在一小撮银行、工业、商业垄断资本、主要是金融寡头的手里。

过去，列宁曾经认定：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法帝国主义可以说是一个放高利贷的帝国主义。

法国的一贯政策，着重不断地增加资本输出，以牟取利润，用最严密的关税壁垒，保护法国和各殖民地市场，阻止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货物进来竞争。法国对殖

民地的掠夺方法是搜刮资源运回本国，以低微工资和繁重捐税剥削本地人。他们主张把各殖民地经济维持在落后状态。

法国大资本家以诡计多端、老奸巨猾闻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法国当权派的政治态度是支持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他们从法西斯主义中找到了镇压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法国劳动人民的道路。他们赞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干涉西班牙，帮助佛朗哥法西斯镇压共和运动。他们与英国资产阶级一道，打算利用法西斯来消灭苏联。法国当权派坐视德国侵占奥地利、捷克、波兰，阴谋把法西斯的矛头引向东方。可是，法西斯在向东继续前进之前，却向后转，几个星期内就吞下了法国。

在德国占领期间，法国大资本家们耍两面派的手法。一面，他们和德国法西斯紧密勾结，帮助希特勒继续进行侵略欧洲战争；另一面，又与英、美勾搭，等待同盟国胜利的时机。组织、领导法国人民坚决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是法国共产党。不单是维希伪政权帮助法西斯镇压游击运动，就连戴高乐也想法限制法国的抵抗运动。

大战后，法国虽属胜利的同盟国之列，实际上却是一个战败国，因为沦陷而精力枯竭。法国资产阶级虚弱，政治影响下降。工业生产比战前大大萎缩，设备陈旧，所以已经落后。还有法国军队，正如一位法国政治评论家所说的，它已经成为“美国军队怀里的胎儿”。法国在欧洲的市场缩小，因为一些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轨道。

法国大资本家失去了在捷克、波兰等的许多工厂、矿山、银行。而共产党则在反德国法西斯的多年战斗中进一步得到锻炼，在人民中享有很大威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的民主力量，已经成为大资本家的主要忧虑。这也是英、美帝国主义在欧洲新形势下的忧虑。

戴高乐口口声声自称是超党派人士，资产阶级报纸也时常这样宣传，实质上，他却是资产阶级财阀利益的代理人。依靠驻扎在法国土地上的成十万美英军队的刺刀，戴高乐解除了法国沦陷时期组织起来抗击德国法西斯的革命武装力量。这位先生的一切努力都旨在消灭民主体制，建立独裁制度。法国共产党正在大力领导劳动人民进行斗争，以便保卫经济利益和民主自由。他们与正在想法抬头的失势的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

一九四五年十月，戴高乐被迫举行制宪国会普选。这个国会的任务是起草第四共和国的宪法。成立了以戴高乐为首的看守内阁，其主要成员分属法国三个最大的政治组织：人民共和党、共产党和社会党。

一九四六年年初，戴高乐突然辞职，企图制造政治混乱，以重新上台建立独裁制度。于是又成立以社会党人菲利克·戈安为首的看守内阁。这个内阁批准了法国与越南签订的初步协定。法国共产党主张趁此机会，与社会党联合，成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和社会党人的政府，把亲戴高乐右派排除出去。这是有现实可能性的，因为这两党在法国政府中占有多数席位。但社会党的领导人

不接受这个意见。

一九四六年三月，戈安政府派社会党领导人之一里翁·勃朗姆到华盛顿去借钱。经过十一个星期的谈判，美国同意给法国借六亿五千万美元，条件是法国要取消传统的关税壁垒，让美国货倾销法国。广泛舆论认为，美国还要求法国保证在短时期内把共产党议员排除在政府之外。垄断资本为了反对法国人民，挽救他们虚弱的统治地位，选择了投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而成为帝国主义魁首的美帝国主义的道路上。

一九四六年五月，法国就第一部宪法草案举行公民投票。这是一部比较进步的民主宪法。在公民投票之前，曾经宣布退出政治舞台的戴高乐，却高声攻击这部宪法。由于反动势力的积极活动和戴高乐的压力，这部宪法不能通过。戈安政府倒台。法国人民又要进行另一次制宪国会选举。

在六月初的选举中，法国共产党地位稳定。社会党由于动摇不定，失去了许多票。但值得注意的是，受戴高乐影响的人民共和党，也取得更多的席位。因此，看守内阁总理的职位落入了曾与戴高乐共事多年的原外交部长、人民共和党首领皮杜尔的手里。这个政府尽管有一些共产党员参加，但是越来越深地投靠美国而偏右了。法国新执政者千方百计地破坏“三·六”协定，不执行金融资本认为可能导致整个法帝国主义垮台的非常危险的法越协议。

虽然如此，欢迎胡主席的仪式仍然是隆重地举行的。

七月二日十一时，法国礼宾部部长和高级官员到雷安·蒙梭饭店接胡主席去参加法国政府的宴会。

马迪绒宫悬挂着金星红旗和三色旗。军乐队奏越南国歌和法国国歌。胡主席检阅仪仗队后步入大厅。皮杜尔总理出迎，并向各位部长介绍。

在宴会上，法国政府总理致欢迎词：

“敬爱的主席：

我代表法国人民，非常高兴地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遗憾的是，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延缓了我们打算在您刚踏上法国领土时，就立即举行的欢迎式。您的到来，使法国人民感到心满意足。您的到来，证实了我们两个民族之间历来的亲善情谊，这种亲善情谊虽然有时罩上阴影，但它必将在更加真诚和亲密的基础上得到恢复……”

皮杜尔赞颂胡主席语言文雅、热情，非常符合于巴黎和法国所给予友邦的接待，他赞扬法兰西共同体是“一个特别的富于人道主义的创举。”他提到越南和法国代表团即将举行会谈的会址枫丹白露宫的“富有诗意和壮丽的景致”。皮杜尔还说到孔教和西方哲学的汇合，说到自由人之间的关系的新概念以及人类的进化和理想等等。

对于法国政府总理辞藻华丽、抽象空洞的演说，胡主席致答词道：

“法国人民和政府的殷勤接待使我非常感激……巴黎是一个不朽的城市，曾经找到了一七八九年革命的不朽理想，巴黎在民主阵营与法西斯集团的流血斗争中仍然忠诚于自己的理想……旨在给法国与新越南的交往打

下基础的枫丹白露会议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是，诚实和互相信任将消除一切障碍。东方和西方哲学都赞扬这样一个道德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相信，在这种条件下，即将召开的会议将取得美好结果。……”

七月三日，胡主席向凯旋门的无名战士陵墓献花圈，还参观了凡尔赛宫。一九一九年夏，同盟国在这里举行和会，胡主席曾向和会递交要求给予越南独立的请愿书。

四日，胡主席拜谒瓦黎茵山上的烈士陵园。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期间，曾在这里杀害了许多法国游击战士。站在瓦黎茵山上，胡主席非常激动。通过胡主席在留言簿上的题词，可以理解他当时的心情：“面对着为独立自由而被德国人杀害的法国烈士，我深感悲恸。任何国家的独立自由，都是由烈士的鲜血和全国的团结建立起来的。因此，真正热爱本国的独立、自由的人，应该尊重其他民族的独立、自由。”

十九

越南和法国两代表团的正式谈判七月六日在距巴黎六十公里的枫丹白露宫开幕。

达尚礼在胡主席到达法国首都一星期之前慌忙回国。

戈安政府倒台，皮杜尔上台，达尚礼感到有了实现戴高乐对殖民地的政治路线的顺利条件。他四处奔走，要求会见政府的新领导人，争取他们同情他在印度支那的作为。达尚礼要求法国当局让他主持枫丹白露会议开

幕式。他是想显示自己不单在印度支那有权，而且在法国首都也有权吧。我代表团坚决反对达尚礼在大叻会议曾玩弄过而不能得逞的这一花招。法国当局害怕我代表团可能因此而拒绝谈判，加以胡主席又作为法国政府的贵宾正在访问巴黎，这样做影响不好，所以只好劝告达尚礼最好暂时避开。无可奈何，达尚礼只得悻悻返回西贡。

直到七月五日，举行谈判的前一天，法国政府才指定好参加的成员。率领法国代表团的仍是大叻筹备会议的团长麦克·安德烈，成员大多是参加大叻会议的旧人物：麦斯梅、毕绒、托连、戈依等，还有沙兰将军麾下的伯约特中将。这位中将是戴高乐的亲信。为了减少舆论的指责，法国政府在代表团中增加了法国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这三个主要党派的三名议员。代表社会党的是有进步思想的保罗·里威教授。这位教授参加本团为准备开幕式的讨论会后，退出了代表团。他说他不愿成为那些企图违反“三·六”协定的人的同伙。麦克·安德烈后来承认说，在到枫丹白露之前，法国总理皮杜尔曾指示他：“要在对外领域上争取到一切保障，使越南不能成为苏维埃棋盘上的一颗新棋子。”

十时，我国和法国两代表团步入枫丹白露宫的荣誉庭。

枫丹白露宫挂着越南和法国国旗。

麦克·安德烈致开幕词，祝贺越南外宾，并预祝会

议取得美好结果。法国代表团的战术是用一般言词，不讲任何具体的东西。

在答词中，我国代表团团长范文同同志说：

“……在越南人民奋力抗日的时候，维希政府却把印度支那出卖给敌人。一九四五年八月，越南人民已经奋起夺取了政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从那时起，越南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在胡主席的领导下，越南人民已经开始和平建设祖国……”

接着，我代表团团长指出，正是法国派遣远征军到越南，使得战争重新爆发。后来，法国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签订了“三·六”协定……。

“但是，对于这个协定，法国是否尊重呢？我们深怀不满地向你们指出，对于协定的一些停战条款，在越南的法国当局没有执行……”

团长同志控诉法国继续在我国南方进行战争，出兵侵犯西原地区，在北方采取一系列暴力行动，最露骨的是最近侵占河内旧总督府的行径。团长同志特别强烈地谴责分割越南祖国的阴谋：驻西贡法国当局不久前炮制出一个“南圻自治国”，并宣布承认它的所谓“临时政府”。最后，团长一针见血地指出：

“‘三·六’协定不是为了让法国军队平安地开进越南北方，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所推行的‘既成事实’政策不能给谈判提供有利条件……”

我国代表团团长义正词严的发言，说出了越南的真实情况，在法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反动派叫嚷这是非

外交、不亲善的言词。进步人士看到了我国代表团的姿态：一面显示自己要保卫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的决心，另一面仍然想良好地解决越南与法国之间的关系。

经过几天的讨论，双方才商定了议事程序的几个主要内容：

——越南在法兰西共同体中的地位和越南与外国的关系；

——通过协商和公民投票的方式统一三圻；

——拟草法越条约。

除议程小组外，会议还设立了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等小组，进行讨论。

通过各次讨论，法国代表团暴露了法国对海外领地的政策。虽然名称或者组织形式多少有些改变，这个政策的实质仍然是维持旧殖民制度，对印度支那半岛来说，是要把这里的三国人民置于以一名总督为首的联邦政府的统治下。

对于我们提出的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如：在南部停战，在南部举行公民投票的日期和方式等等，法国代表团总是避而不谈。会议无所进展。有时，法国代表团成员半数缺席。

二十

胡主席不参加枫丹白露的谈判。他以法国政府贵宾的身分留在巴黎。

他不知疲倦地工作。据代表团的同志说，许多时候，

伯伯一天工作十四小时。

胡主席接见了法国几乎所有的大政治团体。当政的三个大党都派代表来拜会伯伯。当时拥有五十万党员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包括重要的领导同志：多列士（当时任法国政府副总理）、杜克洛、加香、皮佑等。许多同志曾在二十、三十年代的图尔大会、莫斯科和各次共产国际会议上认识过伯伯。伯伯还接见了许多国际群众组织，如世界工联、世界民主青联、世界妇联等的代表，向他们介绍了越南工人、青年、妇女的活动。这些群众团体都宣布吸收越南工人、青年和妇女组织为自己的成员。许多得到胡主席接见的各国青年都非常敬爱地称呼他老人家为胡伯伯。

伯伯接见了许多在巴黎的知名人士：政治活动家、财政经济界人士、军人以及大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新闻记者、作家：阿拉贡、爱伦堡、安娜·谢果、恩萨·特里奥列、里萨·布洛克、皮埃尔·马尼恩等。

这时，伯伯认为重要的是，使所有的人了解越南，了解越南的革命运动和越南人民要求独立、统一的正当愿望。这个工作不能在一天一月内完成。新越南的代表虽然身在巴黎，但是，在反动派大肆进行歪曲宣传的情况下，要使每个人正确地了解我国人民的迫切问题和正当愿望是不容易的。

胡主席在巴黎的新闻界中有很大的威信。《战斗报》记者会见伯伯后，写道：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老先生，很简朴地接

待我了，他的举止从来都是这样简朴的。他已经上了年纪，一双眼睛精明而和善，面容和蔼而刚毅。一把黑胡须使他的面容更富于东亚色彩。他穿一套军装，没有任何装饰，使人们联想到十月革命的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还懂得它的奥妙之处。他说话从容清楚、不装腔作势。老人家身边有着聪明的爱国青年。他稳健地肩负着整个民族的命运，是这个民族的特别德性的代表……”

有些人过去经常写文章歪曲我国的革命斗争，同胡主席会见一两次后，写出了较好的文章。

后来，有一位法国记者写道：“他老人家（指胡主席）巧妙的才能、抒情的雄辩和本人的威望，使他说的话威震四方。一些记者赞扬他，另一些指责他，但全世界都谈到他。”

记者们往往这样描绘胡主席的形象：明亮的眼睛、宽阔的前额、稀疏的胡须、粗布制服和朴素的举止，征服了法国人民的感情，在他们的心坎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有的越侨见胡主席到法国之后，穿的只是朴素的布衣服，便打听他的身材尺寸，想给他缝制一套合乎身分的时装。这事叫伯伯知道，加以谢绝了。

法国当局找不到任何借口，来阻挠这位政府贵宾与各政治团体、知名人士和新闻界接触。

枫丹白露会议开幕一个星期后，胡主席在巴黎举行记者招待会。法国政府总理皮杜尔为了封锁越南问题，便借口给谈判找个安静的环境，把会址选在距法国首都六十公里的枫丹白露宫。记者、拍片师、摄影师在这座宫

殿的高墙外得不到任何消息，所以参加招待会的很多。

胡主席阐明了越南谈判的六点立场：

一、越南要独立。独立不等于同法国完全绝交，而是在法兰西共同体之内，这样对两国都有利。在经济、文化方面，越南乐意与法国合作。

二、越南决不接受一个联邦政府。

三、南部是越南的一部分，谁也无权分割，任何力量也不能分割。

四、越南保护法国人的财产。但是，法国人要遵守越南的劳动法；越南保留赎买有关国防的财产的权利。

五、如果需要顾问，越南优先使用法国人。

六、越南有权向各国派大使和领事。

胡主席说：

“我们是非常诚实的。我们希望别人也对我们诚实。我们决不贬低自己。我们也不想贬低法国。我们不想把法国人推出越南。但我们要向他们说：你们要派知道尊重我们的人到我们国家……只有相互信任和平等、诚实的合作，才能达到两国亲善的结果。”

在枫丹白露谈判的消息被封锁的时候，胡主席把问题摆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使新闻界议论非常热烈。大多数报纸认为胡主席的声明是正确和诚实的。一家报纸写道：“这些话，表明胡主席和越南政府决心本着两个民族互相谅解和友爱的精神，来解决越法关系。”法国进步舆论站在我们一边。它们批判一两家反动报纸的挑衅论调。

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枫丹白露谈判仍然没有进展。七月二十三日，巴黎各报突然报道：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达尚礼，准备于八月一日在大叻举行联邦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老挝、柬埔寨、南圻、中圻南区和西原等的代表……从公布的会议成员来看，达尚礼不仅想把南部从越南分割开来，而且还想把越南分成几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当天早上，我国代表团在枫丹白露会议提出强烈抗议。法国人推说将把我方的抗议转给他们的政府而回避这个问题。

高级专员的所作所为和法国政府故意装聋作哑的态度，使得本来就紧张的会议陷于闭塞。

七月二十六日中午，胡主席到枫丹白露访问。越南和法国代表团，以及当地政权和人民代表手执鲜花欢迎伯伯。胡主席参加郡领导人举行的欢迎宴会后，由枫丹白露官负责人陪同参观这座非常豪华、壮丽的古代建筑。参观后，胡主席表示要到树林里去散步，负责人便陪同他去。

散步回来，伯伯向我代表团了解会议情况，并交换意见。

会议已经陷于僵局。法国政府的谈判代表，秉承上司的意旨，公开回避谈判实施协定的问题，他们借口说，不能给法国其它殖民地开创反对宗主国的先例。对于殖民地，他们死抱着过时的反动思想。他们要在印度支那建立的制度是与战前没有多大差别的。

当天下午，伯伯返回巴黎。

对于我国代表团就达尚礼准备在大叻举行所谓“联邦会议”的抗议，法国政府一直置之不理。八月一日，我国代表团宣布休会，直至我方的抗议得到适当解决为止，然后离开枫丹白露宫，并且不再到那里去了。

华丽的祝愿和空洞的许诺时期过去了。

在皮杜尔的主持下从八月十日至十二日关于印度支那问题联席会议，讨论半途而废的谈判。这之前，原印度支那总督、政府国务卿瓦兰被任命为关于印度支那问题联席会议主席。他向新闻界宣布：

“第三共和国在大洋彼岸所创造出的壮丽事业，给法国的天才带来了光彩！难道我们能放弃和破坏这个事业吗？这样做，将给法国人带来不可收拾的灾难。我们是一些完全理解自己所说的话的人，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避免这个灾难。”

几天后，戴高乐也发出叫嚣。在攻击即将举行公民投票的宪法草案的时候，戴高乐极力抨击草案中关于法兰西共同体的规定。他认为“自由自决”原则只能使法国的海外领地陷于混乱和分裂，最后陷入外国的统治。

整个八月初，又是开会讨论，又是交换意见，也未能打破枫丹白露会议的僵局。

二十一

八月份，法国各通讯社发出非官方消息：胡主席即将启程回国。这个消息是与我国代表团宣布停止枫丹白露会议的消息同时发出的。谈判的趋向明显是不好了。

这些天来，法军在河内—谅山沿线连续制造挑衅事件。根据双方的协议，法军可到谅山接替撤走的蒋军，也明确规定了对远离河内的法军的供应办法。可是，搞供应的法军屡屡违反规定，经常不带许可证，却带去装甲车，并向沿途我军岗哨进行挑衅。

八月一日，一辆法国军用运输车从谅山开往河内，敦桥检查站要他们出示证件，法国人说没带。检查站要求停车，等向越法中央联络委员会请示。这班法国人硬是把车开过桥，我方吹哨子勒令停车，法国人便开枪，使五个卫国军战士和两个平民中弹。我方部队还击。车子冲过桥，向嘉林方向逃窜。

我们明知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反动派正在蓄意制造捣乱事件，以便破坏本来就很难进展的枫丹白露谈判。这时，伯伯和我国代表团还在法国土地上，所以对于法军的挑衅行径，我们一面坚决应付，另一面尽量和解。然而，我国人民长期以来仇恨法国强盗，因此，法军一挑衅，人们就立即予以反击，尤其是敌人给我国人民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时候，更是这样。

敦桥事件过后两天，八月三日，二十辆法国军车从河内开往谅山。车队开过敦桥后，车上的士兵沿途胡乱开枪。离北宁市两公里时，他们向我方岗哨开枪，打死一名卫国军战士。车队继续开入市区，边走边开枪。我部队和自卫队还击。冲突从七点半持续到中午。

河内法军司令部不同我方想法解决，反而派出有许多装甲车护送的援兵。沿途，法军在敦桥、安员、慈山

等地打烧了许多民房。十时，这班家伙到达北宁市，使冲突更加扩大。下午，越法中央联络委员会派人调解无效。

八月四日，这次军事行动的法军大尉指挥官，要求北宁省政府让法军进驻原蓝带兵[⊖]营房。我方拒绝这一无理要求。几小时后，四架法国飞机来轰炸市区居民。法军不肯撤出北宁市。

六日，接替圣德尼担任法国驻北越委员的克列宾来北部府找我们，抗议我方在北宁打死许多法军。我们说：这次冲突是由法军一手挑起的。越南方面曾经同意派一个混合小组进行实地调查解决。可是这件事一再拖延，是因为法军不肯撤出北宁市，严重违反协定的条款。

克列宾说：“如果你们让这样的行动继续下去，那就一定要打仗了。”

他这句话带有恐吓性。我答道：

“你们是很清楚这类冲突发生的原因的，负主要责任的正是法国军队。我们曾多次表示善意。你们要和平就有和平，要战争也会有战争。”

由于我们的态度坚决，克列宾缓和下来，转移话题。他表示要帮助我们由南方运一些大米到北方。

北宁冲突事件立刻被达尚礼加以歪曲和夸大，成为使法军遭到重大损失、“越南政府应负责任”的事件，向巴黎报告。

过了几天，越中边界沿线又发生新的冲突。八月十

[⊖]打藍色綁鞋的警備部隊。——譯者注

日，法军无故进攻先安、潭河我方部队。十三日，他们让土匪进驻谅山，並向下龙湾和鸿基沿海地区的居民进行挑衅。同一时间，有消息说法军从山罗南下。这之前不久，达尚礼曾透露要在北方成立一个与西原的“西圻共和国”一样的“依傍共和国”的企图。敌人从沿海到山区、从东到西同时采取行动，表明这个阴谋已经开始。

七月十八日，在越南问题上多少识时务的法国将官黎格勒回国。法国政府指定瓦吕代替。八月中旬，瓦吕离开河内。这时，尽管法军的挑衅事件接连发生，瓦吕始终保持温和态度。到达西贡后，他还致电感谢我们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並祝愿越南与法国之间的亲善友好。

八月十七日，接替瓦吕的莫里哀乘飞机到达河内。法属时期，这名中将曾住在北圻多年，后来返回法国参加抗德战争。他在同盟军解放法国期间多少有些成绩。

我在机场上见到莫里哀，他对越南政府代表的在场表示感激。莫里哀说他离开法国之前，荣幸地会见了胡主席，並带有他老人家给我们的一封信，他是以新法国的精神到越南来的，非常赞成由胡主席领导的越南解放事业。他表示相信枫丹白露谈判将取得美满结果。

在和我们接触中，这名老将军常常表示希望法国与越南的关系日益改善。他常夸耀自己与越南人民有深厚感情，很了解他们的德性。为了证明这一点，在一次和我交谈中，他夸奖过去殖民军中的“越南兵”，特别赞扬他的一个越南厨师，说他技术高超而又老实（1）。几个月后，莫里哀却是向我们接连发出最后通牒的人。

他曾一度被称为“最后通牒将军”。正是莫里哀任驻印度支那北方委员和法军司令员期间，发生了海防冲突事件，后来战争更扩大到全国。

今天，我们有了进一步了解这位将军的资料。最近，法国报刊发表了莫里哀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作的关于海防、河内冲突事件的报告。通过这份报告，我们知道，尽管莫里哀的看法和想法还带有长期住在殖民地的“洋人”的浓厚味道，他毕竟还是个有善意的、要和平的法国人。他在自己的岗位上，曾尽力想法阻止在印度支那的殖民主义好战派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正因为这个理由，莫里哀被召回法国，停职一个时期。只是在法国政府认识了在印度支那推行战争政策的错误的时候，莫里哀才得到提升和接受适当的职务。

八月底，在海防发生了第一次关税事件。如上所述，法国人非常注意法国和附属国的关税壁垒。这个问题，法国代表团在大叻和枫丹白露会议上曾提出过。由于双方意见分歧，没有得到解决。法军驻扎在北方的一个港口，使他们有条件在海关方面对我方施加压力。

在海防，外国商人从来按照惯例向我国商政局纳税。由于法军的干预，一些商人借口中法协定规定海防为自由港，逃避纳税。八月间，我们扣留了一个带有一些没有流通的法国新币的外侨，并没收他的一百箱漏税纸烟。八月十五日，法方进行干涉，要我方释放此人，退还钞票和纸烟。海防法军司令部通知我方当地政府说：“海防是联邦港口，只有法国人才有权检查关税。

对外国人的检查没收事件，法国军队不会坐视。如果上述事件再次发生，法国军队将进行武力干涉。”当然，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无理要求，因为越南政府和法国政府之间对联邦关税问题从未有过任何协议。

不几天，海防税务局的海鸥号船正在港内执行任务，一艘法国战船靠拢过来。法军跳上海鸥号，殴打我税务人员，然后，连船带人一起劫走。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驻海防法军大校德普出动坦克、装甲车和士兵包围商政局和港口公安站。他们抓走一些警卫人员，抢走商政局的货物，然后占据了这两个地方。我方调来部队。双方交战。海防越法联络局前来解决。我方坚决要求法方释放我方人员和撤出非法占领的地方。

海防纷纷举行反法游行示威。法军对驻地附近的群众进行恐怖活动。老人和小孩开始疏散。我们继续进行斗争。近半个月后，德普才肯释放我方人员，撤出商政局和港口公安站。

这只是关税问题上的最初的小冲突。

二十二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刚满一周岁。

民主共和制度的第一代公民亲手装饰房屋、街道，庆贺制度一周年。整个首都沉浸在旗林新花海中。到处是彩旗、胡伯伯像、灯笼、花绳和牌楼。

去年秋季的今天，革命成功。整个世纪奴隶生涯的

漫漫长夜已经过去了。胡伯伯在祖国黎明的灿烂曙光中，回到了首都，独立、自由的新纪元开始了。过去的一年，发生了不知多少历史变故；过去的一年，显示了民主共和制度的生命力和胡伯伯驾驶祖国航船越过多少急流险滩的才能。今天，国家的新主人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责任，认识了自己的能力。前面的革命道路还漫长和充满艰辛，但是，希望和信念之火越来越光辉灿烂。

这首次国庆纪念日，伯伯不在家。伯伯启程前的嘱咐，全国人民已经努力实现。我国与法国的谈判正在遇到很大的困难。国庆节前，胡主席打电回国嘱咐同胞们，尽量不要与法国人发生纠纷，以便给目前各代表团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早上七时，汽笛一声长鸣。整个首都的人面向南方，向着正在战斗的半壁江山。默哀一分钟，悼念为祖国的独立、统一而牺牲的人们。越南民主共和国刚满一周岁，祖国南方的战斗坚持将近一年。初期的困难已经过去，在敌人猛烈进攻面前的暂时退却已经结束。南方经历近一年的战斗，成长起来了。法军因为扩大占领范围，分散力量到北方，所以漏洞越来越多。开始时，他们从西贡伸向其他城市，扩张到农村。现在，他们正被赶出广大农村，缩回城市，以至西贡。敌人供认，他们不能控制哨兵的火力射程之外的任何东西。一些法国指挥官老爷所做的速战速决的迷梦已经幻灭。南方懂得了打敌人的方法，使法国远征军陷于一场持久战争的泥坑里。

今天这个大喜日伊始，全国面向南方，表示感谢南方在过去一年显示了新制度的威力，显示了一个已经觉醒、拿起武器为独立自由而战的民族不可屈服的威力。今天这个大喜日伊始，全国人民宣誓决心为保卫祖国的独立和统一而战斗到底。

汽笛声刚停，各条街道的人流涌向还剑湖，即举行国庆阅兵的地方。志灵花园搭起一个大礼台。去年九月二日，在巴亭花园的观礼台上，胡主席、政府成员和同胞们见面。人民第一次见到胡主席和新领导人。当时还是临时政府，所以没有外宾。今年，观礼台上，代表胡主席的是黄叔抗代主席，以及由全民选出而已经熟悉的各位政府部长。此外，还有英、美、中、法代表。莫里哀和一些法国军官参加了观礼；我方人员把他们领到规定的外宾位置。莫里哀这位过去曾在殖民制度的黄金时代渡过多年的法国驻印度支那北方委员并不表示出难堪的态度。

听了军委会给部队、民兵自卫队的命令后，各武装力量开始列队行进。

从建立共和制度之日起，这是第二次盛大阅兵了。去年九月二日，刚从战区回来的一个解放军支队手持缴自敌人的各式武器，事先排队站在观礼台前。当时不能列队行进，因为战士们虽然久经战斗，但还没有机会学习队列条令。今年，我们第一次举行分列式。越南国家军队一个团，装备齐全，草绿色军装，船形帽上闪烁着金星帽徽，脚穿皮鞋，肩扛枪，在雄壮的军乐声中迈着矫健的步伐在观礼台前走过。走在各分队前列的是佩着

长剑的指挥员。分队长和指导员并肩前进。

仅仅经过边建设边抗敌的一年，我军就可以向新政权和同胞汇报：咱们的军队已飞跃地成长，随时准备投入一场长期的战斗，如果敌人胆敢扩大战争的话。那天我们的部队，带的只是轻武器。除步枪外，每个连只有一至两挺轻机枪和几支冲锋枪。这已经是最大的努力了。今天，当法国红帽子外籍兵的铁蹄天天践踏着河内的街道，第二装甲师的履带天天辗压着河内的马路的时候，一团正规军的出现具有特殊的意义，就象八月革命刚刚成功时一个解放军支队在河内及时出现一样。

这也是我军在进入全国长期抗战前的汇报。这之后，过了九年，我军在奠边府最后战胜法国远征军时，才又在首都举行第二次阅读兵。

下午，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高举着红旗、标语的队伍相继汇集到河内大戏院广场。五色缤纷的彩车把广场变成了个花园。五十万平原、山区的同胞，聚集在这里，听取新政权汇报在同旧制度决裂、建设新生活的一年里已经做到的事情。

政府的工作报告，也是过去一年全民执行胡主席提出的三大任务：**反抗飢荒、反抗文盲、反抗侵略**，以便建设和巩固革命政权的总结。

今天，新政权可以向人民汇报许多具体的东西。

法日强征稻谷的政策，平白地抢走了我国人民的数十万吨谷子，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饥荒。革命成功时，红河水位高达十二米六，这是从未有过的高水位。八月份

的水灾又抢走了北方同胞的四十万吨谷子。日本人强迫种黄麻和蓖麻也大大缩小了种稻面积。

工商业完全停顿。手工业破产。

新政权成立时，印度支那“国库”只有一百二十三元，其中一半是破烂的零币。直接税征收时间已过。过去占全印度支那总收入大部分的关税，今天因为商业停顿，几乎等于零。印度支那币原来一元等于五百个清化铜币[⊖]，今天只等于十个铜币了。十一月，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不肯把钱预支给我国政府，还非法宣布五百元钞票作废。蒋帮关金券又没有控制地流通，真是难上加难。

我国人民面临严重饥荒的威胁，还要供养近二十万蒋军和六万日军。

这是我们建设新制度初期的财政经济情况。这期间，在北方，越奸反动派依靠蒋军的刺刀，策划推翻革命政权；在祖国的南方，法帝国主义开始进行侵略。

响应政府的号召，同胞们修筑加固了数百公里堤坝，制止了水灾。

胡主席关于增加生产、反抗饥荒的号召带来了奇妙的结果。种稻面积扩大半倍，种薯面积增加三倍，玉米收获量增加四倍。种玉米面积增加四倍，收获量增加三倍。七月间，北部的米价，从过去七百元一公担降到两

[⊖]我国被法国侵略之前，在清化以南一些省流通的货币。

日本占领我国后，这种铜币币值最稳定。一九四八年四月，我国政府颁布一六七号SL字法令，禁止这种铜币流通。

百元，革命已经战胜了饥荒——这是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初期的奇迹。

由于税收减轻和公平，由于号召公务员和部队发扬牺牲精神，举行募捐，以及最近越币的发行，我们已能应付各种开支，特别是国防的巨大开支。

在教育方面，反抗文盲的战斗已经取得从未有过的成绩。负责六万个识字班的八万义务男女教员，帮助一百五十万人摆脱了文盲。

抗击内外敌人的斗争非常激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二十万蒋军被撵回国。反动走狗的卑劣阴谋完全破产。在南方，我国军民越战越强，挫败了敌人速战速决的阴谋；革命政权仍然站稳于南部二十一个省中的二十个省。

民主共和制度得到巩固：在充满困难和变动的一年里，新政权成功地举行了祖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选，成立了国会，产生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政府。祖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民主宪法已经起草好，只等国会讨论和通过。中部和北部从乡到省的行政委员会和人民议会都已由正式选举产生。人民享受了民主自由权。中部和北部的报纸，革命前只有二十多家，现已增至一百二十家。一千多万人参加了各救国团体和组织。

今天，每一个人，都以异乎寻常的欢乐穿上最美丽的服装，去参加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一周年的盛大纪念会。

集会后，五十万人举行游行，队伍长达五公里多。插着立国的伟大旗帜——金星红旗的越盟总部的彩车领先。接着是载着去年胡主席首次与国民见面、宣读历史

性宣言的独立台模型的彩车。越南劳动总会的彩车上是一个象征着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广泛运动的大地球模型。一辆车载着一只展翼的金鸟，象征着新制度正在展翅高飞。许多彩车挂着这样的标语：“欢迎越盟，感谢越盟阵线解放了民族，取得了祖国的独立。”大晴天突然降大雨。举着红旗、标语、胡主席像和鲜花的人流，冒着大雨，滚滚奔腾，把无限的欢乐带到红旗如林、花团锦簇、遍挂胡主席像的条条街道。

入晚，家家屋檐下亮起彩灯，数以万计的彩灯映红了整个城市。一队首都青年高举着象征革命火焰的火炬，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绕着还剑湖跑步。同胞们在门前摆起联欢饭，路过的外省人受邀吃饭，共庆佳节。整个首都变成了庞大的联欢场，还是容纳不下全民族在首次国庆节的大喜悦。在各街区举行的文艺表演：奏乐、歌舞、话剧、喇叭戏、改良戏等等直到深夜才尽欢而散。

吃果不忘植树人、喝水不忘打井人，在今天无限的欢乐中，每个人无不想到自己幸福的源泉。这正是胡主席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蔼可亲、简朴而鲜明的形象又在人们眼前浮现的时候。就在这大喜日里，伯伯还在远方为民族、祖国而忧思操劳呢！

二十三

八月底，西方报纸报道胡主席寄给法国一分照会的消息。接着又有消息说莫戴和瓦兰宣布：“枫丹白露会议可能复会。”

可是九月初，由于我方和法国之间还有许多分歧的意见，会议未能继续。这在几天后法国政府给胡主席的复函中已经肯定：“双方对一些基本问题还存在着很深刻的分歧，即使复会，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会议不能继续。”

我们经常担心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当然法国反动派可以看出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趋向，从而对伯伯和我国代表团的回国加以刁难。但我们相信，伯伯一定会找出解决的办法。

过了几天，消息不断传来。十日，法国报纸报道胡主席和代表团准备九月十四日回国。十二、十三日，有消息说越南代表团与法国代表团正在研究签订一分协定纲要。第二天，九月十四日，法国各通讯社都说由十五人组成的我国代表团十三日已前往土伦港，准备乘船回国。同时，也有消息说胡主席十四日离开巴黎，乘法国战舰回越南。这样，我们估计我国代表团在回国之前为了缓和局势而签订的协定纲要是没有其事的。

十五日，据法国通讯社的最后消息，越南与法国于九月十四日星期六夜签订了一项协定，九月十六日星期一早上，胡主席将离开巴黎。虽然协定内容没有公布，我们都感到轻松了些。

不几天，《游击者报》报道九月十四日签订临时协定的经过，大概内容如下：九月十四日夜间，胡主席与莫戴先生的谈判进行得非常紧张。最难解决的是南部问题。胡志明主席每次提出越南和法国共同参加解决南部

问题时，法国政府代表都回答道：“这样做是侵犯法国的主权，不能接受。”莫戴态度非常坚决，他说：“你签字吧，要不就破裂。”为了回答莫戴，胡志明主席提及他已决定星期一早上八时启程回国，然后站起来。夜十一时，他们两人冷淡地分手了。

局势变得很僵，胡主席的随行人员都认为协定是签不成了。

离开莫戴先生官邸，胡主席回到自己的房间思考。半夜十二时半，所有的人员已经入睡，主席与莫戴先生再次会晤，他老人家又坚决地提出南部问题。他用易于感人的声调向莫戴先生解释，并提出一系列问题：

“为什么法国政府拒绝越南政府代表共同解决南部的停火问题？”

于是，两人原则上商定越南政府派一名代表同达尚礼合作。胡主席又问：

“那为什么不能同意这位代表负有共同执行临时协定的任务呢？”

这点也达成了协议。

“但是这位代表有权到南部去吗？”

莫戴先生不作声。但是，他同意越南人可以在南部自由来往和越南军队仍驻南部。最后，同达尚礼合作的越南代表的来往问题没有解决，双方还是签订了临时协定。……

这个消息我们是在一家法国通讯社的新闻稿上看到的，还不知虚实如何。过两天，临时协定公布了，同《游

击者报》刊登的内容没有什么出入。只是签订的经过要等伯伯和随行同志们回来才知道。我们与法国之间的谈判经历了非常紧张的时刻，而且象半年前签订初步协定一样，胡伯伯也是在最后的时刻作出决定的。

在法国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正碰到许多困难。民主力量每取得一个胜利，反动派又加紧反扑。大财阀们从不放松政权机构。戴高乐辞职后，他们仍然掌握着法国政府的关键地位。六月间，皮杜尔上台，他们的统治权更加巩固。对法国殖民地的政策，除开戴高乐三月二十四日在布拉柴维尔所宣布的之外，历届政府没有作过任何修改。特别是，印度支那问题联席会议一直操纵在赞成戴高乐的殖民地政策的分子手中，如皮杜尔、米斯列以及最近的瓦兰。这是达尚礼在戴高乐下台后的依靠。

这种情况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与法国之间过去的大叻谈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到枫丹白露会议更加闭塞的原由。在这样的环境中，胡伯伯签订了“九·一四”临时协定。它的各项条款只是临时性的，不作出原则性的决定。这些决定，双方同意在一九四七年初继续讨论。重要的是，胡主席已争取到在文本中载明：“法国保证在南部实行民主自由，停止任何武力行动。”

二十四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预备从土伦港开往印度支那的杜蒙·德维尔号舰突然接到命令，把所有乘客和货物卸下，接受新任务。

法国政府决定用这艘舰送胡主席回国。与伯伯同船的，除服务人员外，还有几位越侨。

九月十八日早晨，战舰起锚开往地中海。

在法国战舰上飘扬着的金星红旗，是非洲各国人民感到生疏的。战舰经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沿途的许多海港向自由越南的首任国家元首鸣炮致敬。

驻索马里法国总督得到法国政府预先通知，邀请胡主席访问了吉布提。战舰在印度洋的科伦坡港停泊时，伯伯得到这里英国总督的同意，上岸访问锡兰一天。甘地老先生和尼赫鲁先生派代表到锡兰首都拜访伯伯，把印度国会赠的锦旗送给他。上月，印度人民祝贺甘地七十七寿辰，伯伯曾拍去贺电，祝贺他活到七十七岁的一倍。

战舰开得很慢，似乎故意拖长伯伯的行程。有时泊岸竟然一泊就好几天，说是“保养”。有时还进行所谓“定期演习”的射击。面对这样的情况，伯伯一直保持着从容坦然的态度。

舰上的水手们都为这位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异常简朴的作风感到惊奇。伯伯不带行李，只有两套衣服更换，而且换下的衣服自己洗。给胡主席服务的法国水手几乎没有被使唤过。胡主席腾出许多时间，同舰上的官兵交谈，问候每个人的家庭状况。通过与伯伯谈话，他们更加了解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在舰上的整个期间，几乎每天早晨、傍黑和晚上，伯伯都和越侨谈话。有的人后来回忆起，才知道当时自

己参加了由胡主席亲自讲课的特别学习班。

“学员”共有四个，都是久离祖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希望跟胡伯伯和代表团一起回国，为祖国服务的许多旅法越侨中最幸运的人。“讲课”内容就是战舰所到之处的当地情况。到吉布提，伯伯就讲述法国殖民者对非洲的剥削，黑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斗争。到科伦坡，讲述法国殖民者和英国殖民者对殖民地的不同政策，锡兰人民的解放斗争运动。到印度洋，讲述英法帝国主义互相勾结，镇压印度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情况。在一些地方，伯伯说那里的革命运动目前还不很强大，但将来一定会高涨起来。每天，伯伯都讲述国内争取独立斗争的情况。他老人家对八月革命讲得很多。他列举一些穷苦劳动者，参加革命后在斗争中受锻炼，长成出色的干部，做出光辉的事业。

胡伯伯不仅注意提高大家的知识水平，而且对他们的生活和作风也很关心。在舰上无事可做，同志们起床较晚。清晨，伯伯起床了，大家都还躺在在床上。伯伯便来问候昨晚睡得怎么样。从此，天一亮大家就起床，不再睡懒觉了。伯伯经常提醒大家要关心群众工作，但是大家感到很生疏，无从着手。伯伯便带他们一起去接近水手，伯伯和水手交谈，让大家吸取经验照着做。

一天，伯伯问范光礼同志：“你回国会有服务的好机会，但是要吃苦耐劳，受得了吗？”

“伯伯，我受得了。”

“可能要抗战。我们的物质基础还很薄弱，有决

心克服吗？”

“伯伯，我有决心。”

光礼同志后来担任我军军器局局长。

战舰开进海防港之前，学习班结束了。远离祖国多年、脱离国内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並沒有感到太陌生，都想马上着手工作。

杜蒙·德维尔号战舰从土伦港起锚一个月后，开入了越南中部海域。海军上将达尚礼又一次在海上欢迎胡主席。

战舰开进金兰湾。达尚礼和刚从河内来的莫里哀一道在苏弗兰号巡洋舰上欢迎胡主席。许多记者也应邀到此。

当胡主席登上巡洋舰时，在甲板上列队欢迎的法国水手多次高喊“呼啦！”海军上将上前向伯伯敬礼。胡主席检阅海军仪仗队后参加宴会。达尚礼举杯祝胡主席身体健康，还问候主席的旅程。

胡主席对达尚礼说：“对不起上将，我的法语说得不好，但我相信我所说的话是非常诚实的。对即将到来的会谈，我是抱有希望的。法国人民和新闻界对我们已经相当了解。也有一两家报纸攻击我，但对我没有什么害处。”

胡主席同达尚礼就执行“九·一四”临时协定的问题连续交换意见两小时。主席要求达尚礼根据临时协定的条款，马上成立各个混合委员会，以便解决南部的冲突。主席还跟达尚礼讨论了越南政府代表和他共事的问题。

会谈后，胡主席和达尚礼一起接见记者。胡主席希望各报将为停止目前的一切冲突和实现临时协定的条款作出贡献，以便为明年一月的谈判作好准备。

胡主席向记者们讲话之后，达尚礼以甜丝丝的口吻笑着说：“我相信在合作的道路上已经真正地迈出了一步”。

二十五

我国代表团先伯伯两天离开土伦港，十月五日返抵海防。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谈判的经过。过了十天，杜蒙·德维尔号战舰还在印度洋慢吞吞地行驶，使我们感到心焦。胡伯伯乘坐的战舰已开入越南海域，不多久将在海防靠岸的消息，减少了我们的不安，使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十月十九日下午，政府和各团体的代表团就到海防去准备欢迎胡伯伯。和我们一起去的，还有法国驻印度支那北方委员莫里哀的代表。五号公路沿线的城市、县镇、村庄，处处红旗招展。

海防的同志对欢迎伯伯准备得很周到。参加欢迎会的还有我军部队和受我方统一安排的一支法军部队，海防全部武装力量出动维持秩序，防备意外。

二十日下午，当我们去港口的时候，海防、建安和市郊的同胞已经站满了范鸿泰街、胡志明路、陈富街两旁。沿途自卫队员、公安人员布置了纠察线。

下午四时，杜蒙·德维尔号开入御口，高高的舰桅上金星红旗在三色旗旁迎风招展。战舰响起长长的汽笛声。

这一声能够扣动数十万人心弦的汽笛是港城破天荒第一次。

内务部副部长和海防市行政委员会主席、驻海防法军司令德普大校下舰向伯伯致敬并报告欢迎会程序。胡伯伯穿着那套褪了色的卡叽制服的熟悉形象出现在甲板上。是伯伯啦！立时响起欢呼声和“胡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海防市大戏院的汽笛声响彻云霄，向整个城市通报胡伯伯已离舰踏上港城土地的欢乐时刻。经过长时间的海上生活，伯伯的脸色红润，身体健康。伯伯满脸笑容地向政府代表团和各省代表团点头致意。

欢迎会开始，乐队奏起越南国歌和法国国歌。伯伯向国旗敬礼后检阅了仪仗队。穿着简朴的绿色军装，头戴军帽，枪上刺刀的战士们同手持长剑的军官们一起，荣幸地代表祖国向伯伯致敬。随后，伯伯走到法军队伍前，在越南军官的口令下，穿着白色礼服的法军仪仗队放平三色旗致敬。

欢迎式完毕，胡伯伯走到御口向各代表团致谢，接受海防人民赠送的鲜花和亲吻两个跑来向他敬礼的少先队员。

伯伯乘坐的汽车经过的路上欢声雷动。不少人见到胡伯伯，禁不住流下热泪。

胡伯伯回到市行政委员会。吃过晚饭，伯伯扼要地给我们讲述了行程。他老人家的态度从容，就象平常饭后同我们谈话一样。伯伯问候同志们的健康和国内情

况。因为伯伯刚回来，当天晚上我们不安排什么活动，不接待客人，好让他休息。伯伯正和我们在楼上，行政委员会的一个干部进来说，有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恳切要求会见伯伯。伯伯就说请他来，天气不冷，老人却穿着一套眼生的呢子西装，看来象是军人的礼服。一见到老人，伯伯连忙起身出迎，扶他坐下。原来这位老人三十五年前曾和伯伯一起在轮船上工作过。今天听说伯伯回来，路过海防，他便穿上当年在船上穿过的制服，叫小孙子带来见伯伯。老人刚开口叫“胡主席……”，伯伯便截住说：“象过去那样叫我阿三好啦。”伯伯和老人谈了许久，老人激动得几乎说不上什么话。

次晨五时，伯伯在市区转了一圈之后，回到住所，接见从河内来的各党派和各团体的代表，以及海防各机关、团体的代表，建安、鸿基、广安、太平、南定、北宁等省的代表。一位老人送给伯伯一面锦旗，上面绣有“一言兴邦”四字。另一位老人赠送一根用一条蟒蛇的一百节骨做的拐杖。

十时，送胡伯伯回河内的专车离站。

铁路沿线，到处都有同胞站着欢迎。每到一个车站，就是一次盛大的欢迎会，人山人海，“胡主席万岁！”、“革命成功万岁！”、“南北统一！”等标语如林。处处都有牌楼。专车开到海阳市暂停，同胞就在车站举行盛大欢迎会。从海防到河内一百公里的路程，专车却开了五小时。伯伯一直站在车窗前向人们挥手致意。

河内又一个非常美丽的秋天。阳光灿烂。红旗映红

了青苔复盖的屋顶和葱茏翠绿的树木。下午三时许，专车开过龙编桥时，汽笛长鸣。父老们在桥上摆香案。香炉的沉香冉冉上升。几位白发苍苍、身穿蓝色礼袍的老人双手合十，毕恭毕敬地向胡伯伯行礼。

十五时三十分，火车到达河内站。今天整个河内放假去欢迎伯伯。站台上，黄老站在政府、国会代表团和各团体代表团的最前列。同胞们站满了车站门口和通往北部府的路两旁。人海里最显眼的是，穿着绿色军装的战士、拿着铜喇叭的军乐队和穿着“新生活服装”白衣蓝裙的姑娘。

刚从金兰湾来的莫里哀也到火车站欢迎伯伯。法军司令部派来一个仪仗队和军乐队参加欢迎仪式。

胡伯伯参加了在火车站举行的欢迎会后，乘车回北部府。车队通过路上的一座座牌楼。河内代表全国人民欢呼、挥动旗子、撒鲜花，向伯伯表示欢迎。

全国沉浸在欢乐之中。伯伯喜形于色。他老人家平安、健康地回来了。有伯伯掌舵，祖国的航船将能越过一切狂风恶浪！阳光显得更加灿烂，红旗更加鲜艳，树木更加翠绿，天空更加高阔。

伯伯在北部府接见了仁同志和所有中央常委同志。近来因为斗争变化非常复杂，有的领导同志还不能公开活动。近四个月来，今天我们又团聚在伯伯周围。他老人家亲切地同每个人交谈。

一时间，同胞们涌到了北部府门前。伯伯在窗前向同胞们挥手致意。人越来越多。少先队敲着铜鼓，列队

通过，高呼：“胡伯伯回来了！胡伯伯回来了！”这是孩子们的欢呼或者是在伯伯归来的大喜日里祖国的欢呼？

十月二十三日，胡主席发表告同胞书：

“……我应法国政府的盛情邀请，到法国访问，目的是解决越南的独立和中南北统一的问题。因为目前法国局势的关系，这两个问题还不能解决，还要等待。但是或迟或早，我敢断定：越南必然独立，中南北必然统一……”

胡伯伯向南部和中部南区的同胞们说：

“中南北部都是越南的国土。”

“我们有共同的祖先、宗族，是骨肉兄弟。国家有中南北，就象一家有三兄弟一样。”

“没有谁能分离一家之子，也没有谁能分割我们越南国土……”

“只要祖国一天没有统一，同胞们一天还要受苦，我就一天吃不好睡不安。我郑重地向同胞们说：依靠同胞们的决心，全体人民的决心，亲爱的南部一定回到祖国的怀抱。”

二十六

从“三·六”协定签订之日起，七个多月过去了。在我们国土上，侵略的枪声从未停息。以达尚礼为首的在印度支那的“戴高乐派”，利用本国的政局混乱，依仗同殖民地有利害关系的财阀的势力，继续推行侵略阴谋和“既成事实”政策。达尚礼严重违反“三·六”协

定的许多条款，可是他从未受到法国政府的指责，即使戴高乐退出政治舞台后也是如此。这个狡猾的破戒修士肯定不难看出，他在印度支那的种种作为毫不违背法国新执政者的主意。他在以皮杜尔为首的印度支那问题联席会议找到了可靠的依托。

在我国北方，蒋军撤走后，达尚礼开始实行“蚕食”政策，逐步侵占我国领土。他大力巩固和扩大立足点，同时在各地加紧搜罗旧反动走狗，阴谋建立各个自治区，对革命力量形成包围态势，创造时机推翻我国政权。在南方，达尚礼继续扩大侵略战争。他公开否认协定中关于南部的条款，明目张胆地宣称：南部在法律上依然是法国的殖民地。他命令法国驻印度支那南方远征军司令尼奥，千方百计地破坏革命政权，镇压群众，迅速重建一九三九年前式的殖民统治机构。

过去期间，我们一面进行斗争，要求对方尊重协定，以制止他们的蚕食阴谋，一面坚决反击他们的一切侵略行动。既争取缓和，又誓决战斗。我们注重巩固和发展各方面的力量，随时准备应付任何情况。

近几个月来，南方人民连续和广泛的奋起，改变了南部和中部极南区的政治、军事局势。

南方在继续抗战。

在南部，我武装力量发展得很快。从五月至七月，我们增建了许多支队。象北方一样，南部部队大多数是农民。在有許多企业和橡胶园的南部东区，工人参加部队的很多。有的支队，如十三支队，全体指战员都是工人。

各支队的干部，大部分是由各党部派来领导武装力量的政治干部。有些同志在一九四〇年南圻起义就开始活动。

南部山林少、险要地势不多。我党早就指出：地势虽然重要，但最根本的是人心。由于得到人民的拥护，能彻底地依靠群众，所以我武装力量可以活跃在一切地盘，并在组织、装备上日益壮大。贯彻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消灭敌人的方针，许多单位换掉了几乎全部原有武器。

抗战力量在许多省建立了大根据地，如D战区、塔梅草原、乌明森林。各省都有两三个县或者五六个乡连成一片的中、小根据地。许多地方，大小根据地接连在一起。西贡成为供应地，为各战区提供武器、炸药、机器、药品、卫生器材以至技术工人、医护人员。武装力量经常出没在这里。西贡同胞成立了许多支援部队的组织。各个战区、各个团都建有兵工厂。

在中部极南区各省，依靠在七月间从第五、六区调来加强的部队，成立了一些团。

在西原，最初成立的主力团，有一个营全是少数民族，称为莫特兰营。

在中部极南区各省，平原和山区农村建立了许许多多的小游击根据地。

我武装力量普遍促进游击战争。部队配合游击队、自卫队进行袭击、伏击、反“扫荡”，消耗、消灭敌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扩大解放区。我武装力量控制了许多战略交通线，奇袭城市和敌人的军事、政

治、经济中心。

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使敌人穷于应付，在驻地周围日夜巡逻。敌人的机动部队不多，却要东奔西跑，进行无效的“绥靖”。

我武装力量的战法越来越进步。许多单位有了奇袭小据点，以及在陆地上和河上打伏击战的经验。一般地说，我们已能挫败敌人的大“扫荡”，制止他们对自由区的多次进攻。

在南部，九月二十六日，敌人用两千兵力，在飞机、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德和进行“扫荡”。我军和游击队进行阻击，从早到晚击毁了敌军数十辆坦克、运输车，打死大批敌军，缴获大量枪枝，击落一架敌机（这也许是在越南战场上用步兵武器击落的第一架敌人飞机）。在永禄，敌人想围捕十二支队的一部分。我军预先知道，秘密撤出，等敌人来了，便来个反围攻，重创敌军。在中部极南区，军队和人民配合，挫败了敌人对卡岭、安溪和昆嵩的进攻。接着，我们向敌人新建立的据点体系进行了多次进攻，最有意义的是在金波来、万野地区的战斗。在西原，游击战争已开始发展。

可以说，南方的抗战已经进入新阶段。

九月十三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颁布第一八二号法令，决定改组越南南方抗战委员会，以便领导南部和中部南区的抗战。一个多星期后，九月二十二日，越南南方临时抗战委员会宣告成立，它是越南南方唯一的合法政权。它成立后宣布，严格地执行越南民主共和国

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的“九·一四”临时协定。

在“九·一四”临时协定中，法国政府保证将实现停战，在南部实现民主、自由，并在条件具备时立刻举行公民投票。象过去的“三·六”初步协定一样，临时协定又一次使敌人的走狗越奸分子十分恐惧。三月六日以后蓬勃高涨的政治斗争运动，现在有了发展的新条件。报刊向傀儡政府进行猛烈抨击。成百名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许多知名人士，发出打倒阮文听的呼吁。斗争如火如荼，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阮文听不得不上吊自杀。在各城市的政治斗争高潮面前，法国及其走狗无比惊慌，急忙下令禁止一切集会、游行。

在政治斗争的同时，南方武装力量在各地大举进攻。扫除了大片伪政权。更多的维持会和伪军向革命投诚。瓦解法军的工作效果可观。在守德、嘉定，我们成立了欧非籍降兵连。在荷门，一个班的法军投诚。

在金兰湾会见胡主席的时候，达尚礼当然不提及法军疯狂破坏“三·六”协定和“九·一四”临时协定的活动，但他曾说：“临时协定签订后，在南圻，恐怖活动（按指我方的灭伪除奸活动）增加到严重的程度。”这位上将供认了他对南方同胞的新攻势的忧虑。

虽然如此，十月三十日，按照双方关于停战的协议，我国防部命令南方军民停火。南部和中部南区严格执行命令。敌人再次感到意外和惊慌。它认识到目前南方政权是掌握在谁的手里了。它所叫嚣的“河内不能控制南部的任何东西”，如果不是存心骗人就是瞎了眼睛。

二十七

回国后，胡伯伯和常委会回顾了过去期间我国人民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斗争。

在印度支那的法国远征军头目系统地破坏协定，在南方继续进行侵略战争，加紧蚕食北方，显然是得到法国当局的支持和怂恿的。我们与法国的调停闭塞，正是因为法国大资本家还没有放弃维持他们过去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权的贪欲。目前，法国的政治趋势对印度支那的法国反动派扩大战争更加有利。可是，我们依然认为必须尽可能维持缓和。法国财阀正在碰到许多困难。法国各民主力量的斗争还在持续。法国政局还不稳定。现在的法国政府还只是一个看守政府。我们与法国刚签订的临时协定虽然没有作出原则性的决定，可是它使法国不得不再次肯定过去“三·六”协定的“和解与合作”精神，保证在南方实现民主自由，答应将同我方确定在南部举行公民投票的时间和办法。

我们主张坚持斗争，迫使敌人要尊重和实现所商定的条款，同时坚决还击它的蚕食破坏行动。我们教育和动员广大人民积极建设和发展政治、军事、经济力量，严密监视敌人的阴谋，随时准备应付任何情况，包括敌人把战争扩大到全国。

必须尽快举行国会会议。

从三月初的国会会议到现在，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政府的许多活动必须向国会报告。越南民主共和国

第一部民主宪法的起草工作已完成，有待国会通过。三月初抗战联合政府是在特殊环境中成立的。政府的组成适应了当时的要求，但有些政府成员不是民选的。蒋军撤走后，一些越南国民党和越南革命同盟会分子跟着主子逃跑了，政府和国会的一些席位空了下来。七个多月来，国内形势有许多变化。伯伯和常委会认为，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威信高、能力强的政府，以便在新形势下完成领导国民的任务。

十月二十八日早上，国会会议在河内大戏院开幕。

这次会议座位的安排与前次有所不同。会场分为左、右、中三个区。坐在左区头排的是马列主义者，即当时公开活动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员。接着是戴红领带的社会党代表和民主党代表。坐在中间的是参加越盟阵线的无党派人士。坐在右区的是越南国民党和越南革命同盟会的代表。越南国民党代表坐在右边的头排。上次会议留给这些组织的七十个席位，现在将近一半空着。

英、美、中的领事以及莫里哀的代表和记者们一起坐在二楼的包厢里。

大会程序有：

- 一、听取国会常务委员会和政府的报告。
- 二、讨论和通过宪法草案。
- 三、成立新政府。

南部代表孙德胜伯伯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

迪石省代表阮文造同志代表南部向大会致贺词。他提到了今天不能出席大会的南方代表，如蔡文隆律师已

被敌人打死在西贡大监狱中，黄晋发建筑师和其他许多爱国者还被禁锢在昆仑地狱里。阮文造同志走下讲台时，胡主席站起来和他拥抱亲吻。他老人家流下了眼泪。

南部代表建议全体国会代表向曾经英明地使祖国摆脱奴隶枷锁的**第一个公民**胡主席表示信任和拥护。全体代表起立作长时间的鼓掌欢呼。

大会听取政府从成立以来的工作报告，其中有越南政府与法国政府在枫丹白露的谈判和“九·一四”临时协定的签订。

三十一日，代表们向政府提出质询，共提出有关国防、外交、经济、财政、司法、内务等的八十八个问题。这些问题转交给各有关的部研究。胡主席代表政府就政府的外交政策、“九·一四”临时协定的签订，以及阮海臣、阮祥三、武鸿卿擅离职守等问题作答复。

胡伯伯说：

“关于政府的外交政策和‘九·一四’临时协定……在以前各个报告中已提得多了……总的说来，对于各个民主国家，尽量争取它们的同情。这些国家虽然还没有公开承认我国，但对我们很有好感。至于同法国的关系，自从签署‘三·六’协定到大叻会议、枫丹白露会议至签署‘九·一四’协定，政府决心捍卫越南的独立和统一，同时诚挚、亲善地同法国合作。当然法国人也要在平等的原则上同我们合作……”

胡伯伯继续说：

“这个临时协定对未来的协定是否有影响？……在

人类社会，没有不互相影响的东西。当然，今后的调停是不受临时协定的约束的。这个临时协定的执行情况，将有助于今后的调停迅速取得效果……”

其后胡伯伯谈到其它问题：

“关于副主席阮海臣先生、外交部长阮祥三先生和军委副主席武鸿卿先生……他们不来参加会议。……当祖国正面临困难的时候，国民信任谁才把重任交给谁，他们却擅离职守，他们应该自问良心何在？这些擅离职守的人，如果不是不愿承担国事，就是没有能力！今天没有他们，我们照样能够承担。”

一阵掌声爆发。伯伯接着说：

“如果这些弟兄扪心自问，知道这样做对不起良心，对不起同胞和祖国而回过头来，我们还是欢迎的。”

在走下讲台之前，伯伯向代表们说：

“如果政府中还有别的人犯错误的话，这个错误应该由我负责，我要向同胞们道歉。”

下午和晚上，各部答复大会所提出的质询。解答完后，又有许多代表继续质问。等大家提完问题，胡主席再次代表政府作答复。伯伯以朴实、温和的语气说道：

“关于国旗问题，政府从不敢要求改变国旗。政府中有一两人提议，所以政府得向国会常委会报告。从那时到现在，形势有了许多变化，金星红旗染上了不知多少越南南部和中部南区战士的鲜血，从亚洲走到欧洲，又从欧洲走到亚洲，处处受到尊敬。”

伯伯目光炯炯，加重语气，说：

“现在除二千五百万同胞外，没有谁有权要求改变国旗。”

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胡伯伯又说：

“关于政府的廉洁问题，目前政府已经很廉洁了。但政府中，从胡志明到各村行政委员会的人员很多……不管怎样，政府已经努力做出榜样。要是不行的话，就要用法律惩办那些受贿赂的人，我们已经惩办、正在惩办而且将要惩办，把这些分子肃清。”

会场又爆发赞成的掌声。

“还有的代表说‘九·一四’临时协定是不平等的，这点政府不这样认为。在临时协定中，各方都多少有些让步，我们让给法国一些经济、文化利益，法国也要保证在南部实行民主自由和释放被捕的爱国人士。至于说法国是否诚实执行临时协定，那么我们应该看到法国有好人也有坏人。我可以肯定地说，目前法国人民大多数是赞成我国独立和统一领土的……”

胡伯伯以非常朴实而非常明朗严谨的语言，回答了代表们所提出的问题。他老人家说完，没有人再提什么问题了。对政府的质询在半夜结束。

胡主席代表政府宣布辞职，把权力交给国会。国会接受政府的建议，随后一致委任伯伯成立新政府。

胡伯伯又走上讲台感谢国会的信任，并说：

“这是国会第二次责成我成立政府。越南还没有独立、统一，所以不管国会责成我或者是责成谁，都要全

力以赴。我接受。我向国会、国民和世界宣布：胡志明不是贪图地位、贪图升官发财的人。今后的政府将是全民团结、不分党派地集合人才的政府……国会的决议虽然没有提到廉洁二字，我也要向国会、国民和世界宣布：今后的政府必须是一个廉洁的政府。按国会的决议，今后的政府必须是一个真正能办事的、有胆量的政府，决心达到边建设边争取祖国的独立、统一的目的。新政府将依靠国会和国民的力量，不辞任何危险，完成国民和国会所交给的任务。”

会议开到夜里一点钟才结束。

从十一月一日起，大会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草案，争论非常热烈。

十一月二日下午，胡主席向大会报告政府已经成立。

下午五时，胡主席出席大会。他老人家在欢呼声中走上讲台。他说：

“这次政府的组成虽不能百分之百地达到国会的意愿，但也接近国会所提出的方针。新政府有中、南、北部的人才参加。黄老因年老力衰请求退出，但由于我的提议，他乐意再参加一届。”

胡主席宣读政府名单后，国会代表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随后，伯伯继续报告政府的工作计划。

大会投票一致赞成新政府。会后不到七个星期，由于敌人推行侵略政策，战争扩大到了全国。十一月初由胡主席成立的政府，是领导国民进行整整八年的全国抗

战的政府。

国会继续讨论宪法草案。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以二百四十票赞成和两票反对，国会批准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宪法。

在国会会议闭幕式上，胡主席就新宪法作了讲话，他说：

“祖国刚得到十四个月的自由，国会就通过了历史上的第一部民主宪法……这部宪法向世界宣告，越南已经独立。这部宪法向世界宣告，越南民族有了一切自由权。这部宪法向世界宣告，越南妇女和男子平等，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这部宪法体现了越南各民族之间的紧密团结精神……”

二十八

在“九·一四”临时协定中，法国政府同意在南部实施以下主要条款：

- 一、释放越南政治犯和抗战人员；
- 二、在南部的越南人享有民主自由，如结社、集会、新闻、通行自由等；
- 三、双方停止敌对行动。

十月二十六日，我军委会寄给法国远征军总司令一份照会，建议越南军队和法国军队于十月三十日零时同时停火。几天后，瓦吕回答说 he 已下令驻南方法军按我方提出的时间停火。

十一月初，达尚礼向西贡报界宣布，从十月三十日

零时已经停止了一切冲突。他说已经释放了二百多名“政治犯”，其他人的档案正在审查，还说他已派尼奥到河内与越南政府商谈成立越法军事委员会事宜。达尚礼寄给胡主席的一封信也谈到了上述几点。

十一月四日，莫里哀带尼奥到北部府拜会胡主席。与伯伯一起接见的有我和内务部副部长。尼奥被介绍是由高级专员指定的法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双方商定立即成立混合军事委员会，并尽快讨论关于实现和监察南部停火的问题。

可是，在尼奥到北方的同时，有消息说，法军又在南部和中部南区许多地方开火了。我武装力量只好进行自卫反击。

十一月七日，越法混合军事委员会在原商务局举行第一次会议。尼奥率领法国代表团参加。我方谴责法军违反南方停火令的行径，指出他们不仅不停火，反而变本加厉。我方主张派一个混合停战委员会到南部和中部南区，以便稳定局势。尼奥不同意。我们又提出，按临时协定的规定派一名越南政府代表同高级专员共事的问题（胡主席同法国高级专员在金兰湾会谈时也已商定）。尼奥说这个问题超出他的权限。会谈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双方同意下次会议继续讨论。

同一天，我政府接到达尚礼的一封信，抗议我方在越南南方设立临时行政委员会。他认为这是不符合“九·一四”临时协定的精神的，这个行政委员会的活动可能妨碍临时协定的执行。

胡主席复函指出：

“南部临时行政委员会是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成立的，隶属于中央政府，一直继续工作到现在。这个委员会在去年十月间曾经与同盟军和法国当局进行过正式接触。

“‘三·六’初步协定和‘九·一四’临时协定已经承认，在南部既有占领军又有越南的行政和军事机构。根据这些协定，南部的这一现状要保持到公民投票之日。临时行政委员会和越南各军事机关的活动，只是为了彻底执行临时协定第九条关于南部问题的政治和军事条款，这只有利于我们两国政府都希望顺利地实现的亲善合作政策。”

十一月十二日，莫里哀把达尚礼的照会交给我方。在照会中，达尚礼认为南部是法国的土地，南部政体的改变只能由法国议院根据公民投票的结果来决定。南部行政委员会是一个不合法的组织，一九四五年十月间，谢丁要同它接触，为的是要避免流血事件。越南政府要是执行已达成的协议，就必须立即停止或者否认这个委员会的活动。

对于高级专员的狂妄谬论，胡主席在复函中，扼要地指出：

“越南政府向法国高级专员重申：这个行政委员会并不超出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四日签订的临时协定第九条范围，其目的是在南部实现合乎公理的稳固和平，不管要碰到来自何处的多大困难。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认为，要实现两个民族所渴望的和平，诉诸武力是完全无益的，只能导致停止执行临时协定，越南政府完全不负这个责任。”

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当权者对临时协定的态度已经暴露得相当明显了。

按法国史学家记载的资料，达尚礼在十一月初非常忙乱。这位高级专员要准备对付可能对他不利的情况，那就是法国民主进步力量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可能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的政策只能通过存印度支那挑起大规模战争的方法来实现。他曾先后会见在西贡的所有法国行政、军事官员，并肯定地指出：“只有军事行动才能制止形势发生对河内有利的恶化。”

瓦吕充分领会了高级专员的意图，并在其密会中指出：“可敬的妥协意图不再适宜了，需要的是‘严厉的教训’。”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瓦吕通知我方说他已向南部法军下达停火令的同时，他也指示海防法军司令德普要控制这个城市并使我们在那里的抵抗力瘫痪。

二十九

十一月十一日，胡主席向皮杜尔政府提出抗议，强烈谴责法国单方面在海防设立海关局和控制对外贸易。

临时协定签署之前，九月十日，达尚礼就从西贡下令莫里哀，从十月十五日起控制海防地区海关权。

在枫丹白露谈判中，法国曾多次提出海关问题。这个问题莫戴也在巴黎和胡主席交换过意见。关税过去占

全印度支那总收入的很大比例。伯伯向莫戴说，这不是不能协商解决的问题。伯伯与法国政府代表交换的意见成为临时协定中的第六条：

“越南和印度支那联邦其他成员国建立关税同盟……关税和对外贸易协调委员会，将研究必要的措施，并筹备成立印度支那海关……”

当时，这个条款立即被西贡法国当局歪曲。他们说越南已承认联邦海关；协调委员会的任务只是决定对换货实施检查办法和分析各种税收的办法。十月十四日，即签署临时协定后一个月，西贡的法国人出布告，说高级专员九月十日关于海关的决定从十月十五日起生效。他们竟然无视临时协定的条款，擅自规定我方的许多货物，如煤炭、矿石、水泥、金属、木材、五谷、食盐、纸张等，非经他们许可不得出口。这种做法是非常粗暴的。这期间，胡伯伯还没有回国，黄老以代主席的名义向法方提出强烈的抗议。在金兰湾会议时，胡主席曾就海关问题与达尚礼交换意见。伯伯认为这事可以由临时协定所说的协调委员会来解决，并提出该委员会应立即在河内召开会议。达尚礼却要在大叻开，以便把这个问题纳入联邦诸问题的范围。最后，达尚礼不得不同意在河内开。但从那时起，该委员会一次会议也没有开过。

胡主席看透了在西贡的反动派要搞“既成事实”，便于十一月十一日，向皮杜尔政府提出抗议。接到这份照会后，莫里哀把它转寄西贡，被西贡扣压下来，十一月二十六日才寄到法国。这种迟缓不是无意的。在这之前

六天发生了海防冲突事件。

事件是由一次小磨擦开始的。

十一月二十日早上，持有越南海关局执照的一艘中国人的汽艇，把汽油运到海防禁门港。法军上汽艇搜查后予以拘留，並说汽油是漏税的，要没收。这一行动侵犯了我国主权。我公安人员进行干涉。只等这一机会，法军便开枪射击。一位公安同志牺牲。附近的自卫队进行还击。冲突开始了。

中午十一时，一支法军装甲车部队进攻火车站地区。这地区离早上发生冲突的地方很远。法军被我自卫力量猛烈还击。枪声响遍了全市。

法军与海防自卫力量的磨擦不是第一次了。往时，越法混合监察局都能妥善解决。这一回监察局人员来调解的时候，德普大校的态度十分横蛮。他要求我方释放全部被俘法军，拆除所有的公安站和街垒；更粗暴的是，他要求我武装力量撤出华人街。

中午，德普向我方发出最后通牒，限我方在十四时之前执行他的条件。我方答复，同意释放今天早上在冲突中被俘的五名法国兵，但法方也要释放前几天抓去的我方十人。还有其他无理要求我们一概拒绝。

下午二时，法军大量出动。在坦克的掩护下，进攻市中心区的大戏院。守卫大戏院的自卫队战士战斗非常英勇，打退了敌军的多次冲锋。

法国人诬告我方打死了混合监察局法方局长加莫安，拒绝一切调停。加莫安少校向来表现是识时务的。

冲突一发生我们就得到消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我方代表要求法军司令干预，制止冲突扩大。法国人表示惊奇，并说是我们把事件夸大。可是，下午，海防冲突确实扩大了。

为了给调解创造条件，当天下午三时，我国防部一面调兵增援海防，一面下令部队只进行自卫。

下午，莫里哀派拉米大校来见我们。拉米是专搞法军政治工作的。我军事代表团团长与拉米讨论停止海防的冲突。双方最后商定：立即停火；越南部队和法国部队撤回原位；成立以黄友南同志和拉米为首的混合委员会次日早晨前往海防。

莫里哀同意这些决定，并通知德普。

晚上八时，海防报告说，我军已停火。但法军没有停，甚至使用了设在吉比的炮兵阵地的大炮。枪炮声断断续续响了一夜。

二十一日早上，越法混合代表团从河内乘流线型火车去海防。到零号公里碑时，法兵示意停车，并说是路不通，不能走。代表团改乘汽车从上里进入市区。整个城市充满着火药味。许多地方仍在响枪。代表团来到德普的指挥所，认定停火令还没有执行。代表团认为必须马上实现停火，双方部队撤回原位。

我方代表到市委机关，得知我部队和自卫队昨晚就已严格执行停火令。被俘的几名法国兵已交还法方。我方代表便将这些情况打电话告诉拉米。

直到下午二时，市内枪声才算停止。但德普不愿把

军队撤回原位。他说，他不能执行在河内的上级的任何命令，因为河内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法国军队不能放弃他们流血争得的地方。莫里哀的代表说服不了这个大校。德普对上级命令的顽固抗拒态度颇难理解。

在等待政府新指示的时候，我方代表和拉米交换意见，商定了一些具体措施：

- 一、严禁双方因任何理由开枪；
- 二、法军全部装甲车开回驻地；
- 三、限制夜间来往；

四、成立一支混合部队，守卫海防火车站，以保证交通。

德普不接受第四项。他并且要求让法军占领海防大戏院，要求我军撤出原洋人区。我方代表不同意。最后，只商定双方军队原地不动，不得改变位置和采取挑衅行为。

二十一日下午，海防停止了枪声。

二十二日下午，混合代表团返回河内报告情况。途中，拉米向我方代表说法国人是想调解的。

十一月二十日，正当海防发生冲突的时候，胡主席接见西贡派来商谈海关问题的沙里尔。胡主席建议：海关和外贸混合委员会应该立即在河内开会，沙里尔已把这个建议急转西贡。

三十

海防局势正趋缓和。突然，十一月二十三日早上七

时，德普寄给海防市行政委员会一分最后通牒，要越南军队立即撤出华人街、原洋人区，缴除曾给予法军沉重打击的乐园区（第七区）自卫队的武器，并且要我们在九时之前实施，不然法军就发动进攻。我方拒绝。法国人把时间推迟四十五分钟。

九时四十五分，法军开炮。军队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华人街进攻。同时，法国飞机轰炸市区和建安市。我部队和自卫队凭借床柜、桌椅作的街垒抗击敌军。人们在楼上、房顶上用燃烧瓶、手榴弹袭击装甲车。每个街头、每幢房屋都发生激战。

在河内市，二十三日早上九时，我军事代表团团长到法军司令部要求会见莫里哀。莫里哀回避，派河内法军司令大校出来接见。我方要求他解释德普今天早上在海防发出的最后通牒。这名大校说这分通牒是在西贡的上级已经批准的。他还说，如果越方不从，海防法军就动武。这样，法军司令部突然改变了态度。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我们知道事件的经过如下：二十一日下午，在西贡的瓦吕曾指示德普利用目前情况，扩大驻海防法军的占领范围。凭着这个指示，德普坚决不执行莫里哀在河内同我方代表商定的条款。二十二日，瓦吕向莫里哀指示，要求我武装力量全部撤出海防市。莫里哀认为这是一个“最后通牒”，可能导致一场大冲突。他不向我国政府转达这个意见，反而建议瓦吕仔细考虑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的后果。莫里哀不知道在给他发出指示的同时，法国远征军新任总司令还直接命

令德普要用现有的一切条件来完全控制海防。达尚礼已于一星期前回国。瓦吕所干的勾当只是严格执行达尚礼离任前的指示罢了。

二十三日中午，胡主席在越南广播电台直接发出召号：

“我呼吁驻越南法军总司令兼高级专员瓦吕将军以及在越南的法国将领们要立即停止法国人和越南人的流血事件。

“我召号全体同胞要沉着，部队和自卫队要随时做好准备，保卫祖国的主权，保卫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

“政府时刻与全体同胞站在一起，保卫国土。

“独立和统一的越南万岁！”

法军在海防的军事行动是残暴的。士兵受命在所到之处，哪里有抵抗就将那里的房屋烧毁。但在头一天他们就被阻住。德普得向海军要求大炮支援。

下午三时，我军反攻，夺回几天前被法军占领的大戏院。每条街道、每个胡同、每幢房屋都发生激战。各个自卫队，特别是第七区的自卫队战斗无比英勇。

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军向吉比飞机场大举进攻。战士们炸掉弹药库，烧毁汽油库，完全控制了飞机场。

海防市的这次英勇战斗是一次真正的演习，为其后一个月在河内首都延续多日的战斗作了准备。十一月二十八日，我部队和自卫武装撤到市郊的新战线。有些地方，我自卫队撤走好几天，法军巡逻队还不敢进去。

十一月二十七日，莫里哀来找我们。他向我们转达

法军总司令部的要求，要我们拆除各法国兵营之间通道上的障碍物，保证法军在海防—涂山线上的自由来往。莫里哀说法军在印度支那北方的一切行动都是执行上级的指示。我回想起以前瓦吕交给我方那分说是法军开始攻占西原的照会时，他也说自己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来的。现在莫里哀重复了瓦吕的话。那时瓦吕的上级是达尚礼，现在莫里哀的上级却正是瓦吕自己。

二十八日早上，莫里哀照会我国防部，重提他昨天已对我们所说的话：“今天我向你肯定由法军总司令部所提出的那些条件……”，其中，莫里哀提出法军在海防的占领范围包括市区和附近的一些地方。他重提保证法军各个兵营之间通道和海防—涂山线上自由来往的要求。

情况变得严重了。为了争取时间让海防部队和同胞作好准备，我们简单地答复说，法军的建议非常重要，所以双方必须成立一个混合委员会，进行讨论。

这天下午，莫里哀又寄给我方一份照会，这是一天之内的第二份照会：“……我愿意告诉你，我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照会中所提出的条件，是以我所收到的非常明确的指示为依据的，所以不能象你所建议的那样成立混合委员会来研究。我认为成立这个委员会是无益的，除非它的目的是采取措施，执行我所提出的条件。”

为了回答这些照会和法军扩大占领范围的要求，我方下令部队和民兵自卫队把敌军紧紧包围在海防市内，彻底破坏各法国兵营之间的通道，特别是从海防涂山到的公路。

海防一仗是新规模的侵略战争的序幕。敌人把对我们祖国南半部的侵略战争扩大到越南全境，以至整个印度支那半岛了。

三十一

在法国，十月间，围绕着第四共和国宪法草案，民主进步力量和反动财阀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

这个宪法草案同五月间被公民投票否决的比起来，是一个退步。但它还是有许多进步的地方。它主张立法权属于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由乡、郡级议会代表选出的参议院只有谘询权。它保证人民在社会、经济上的新权利和男女在各个领域的平等。它反对发动侵略战争和对殖民地的压迫，保证尊重附属国民族的自决权。如果这个草案得到通过，那么可以说，这是法国建立共和制度以来最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法。

因此，法国资产阶级竭尽全力加以反对。他们想拖长临时执政的现状。这个不稳定的局势将使群众产生不安心理，证明民主制度的无能，给他们开辟建立独裁制度的道路。戴高乐又继续猛烈攻击新宪法。他认为国会权限规定得太大，行政权没有了，法兰西共同体的自由原则将导致法帝国主义的崩溃。甚至，他还说：“如果这部宪法得到通过，马上就会发生叛乱”。戴高乐的恐吓言论在法国的中间阶层产生了影响。

法国共产党主张大力促进维护民主体制的群众斗争运动。

十月二十三日，为通过宪法举行了公民投票。近三分之一的选民不参加投票。虽然如此，宪法仍然得到通过：九百五十万票赞成，八百一十多万票反对。民主力量很费力才取得了胜利。

在殖民地的大多数法国选民投反对票。在印度支那，追随戴高乐反对新宪法的法国选民很多。整个印度支那只有一千七百零一票赞成，却有八千三百一十三票反对。这一点说明了在殖民地，尤其是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的反动政治倾向。

十一月十日，法国举行国会普选。这届国会任期五年。法国共产党又领先，增加了二十四席。社会党失去了二十个席位。共产党的胜利相当大。但反动势力也不落后，许多反动组织，如人民共和党、左翼联盟（右翼）等等，也增加了许多票。法国各政治力量形成了两个对立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支那问题不仅不被忽视，反而成为法国政策中的首要问题。进步力量主张，在共同体各成员国的关系中必须尊重民主和自决原则，必须以“和解、合作”政策代替暴力、镇压政策。反动势力则认为法国想恢复自己的力量和国际威望，就要保持住殖民地；因此，必须实施强硬路线，以便维持法国在殖民地的统治权。

值得注意的是，掌握法国大权的大资本家和政客们，对几年来印度支那所起的巨大和深刻的变化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还在做着帝制的黄粱美梦哩！印度支那在土地

面积方面，虽只占法国各殖民地面积总和的十六分之一，但人口却占法国各殖民地人口总和的五分之二，每年给法国垄断集团提供十多亿法郎的利润。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四五年，东方汇理银行的利润增加了三十二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支那是垄断资本投资最多的地方：五十二亿多法郎。

财阀们盲目地相信，在各帝国主义同盟国的金钱和武器的援助下，恢复印度支那的旧秩序将不会碰到多大困难。美、英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对法国是有利的。英国把法国踢出叙利亚和黎巴嫩后，又与法国缓和，帮助法军重返印度支那。美国方面，罗斯福逝世，杜鲁门上台后想法笼络法国：邀请戴高乐访问华盛顿，允许法国政府派代表参加日本的投降仪式，还给法国借款。实际上，这时美国阴谋通过马歇尔经济援助计划来奴役法国，把法国变为欧洲的反共基地。对于印度支那这块东南亚土地，美国早就觊觎。它曾多次攻击法国的印度支那政策，时而要法国扩大印支各国的权限，时而要把这个半岛国际化五十年。这些要求遭到法国的反对，英国也不支持。美国想利用蒋介石来赶走法国，但蒋介石无能为力。现在，美国打算帮助法国镇压印度支那的革命运动，以便谋划一个长远的阴谋。

法国大资本家走上了依附美国的道路。

普选后，皮杜尔把内阁的权力移交给国会。已获通过的宪法到一九四七年一月中旬才生效。在成立正式政府之前，国会要选举看守政府进行工作。于是，各政治党

派又准备投入十二月上旬的看守政府总理宝座的争夺。

十一月中旬，达尚礼回国。“九·一四”临时协定得到法国政府批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于在印度支那的殖民主义反动派的政策是一个沉重打击。法国政府重申尊重“三·六”初步协定的精神和一些条款。这使西贡走狗们又一次惊惶失措。最近在法国接连发生的事件：通过新宪法，法国共产党在普选中获得票数最多等等，使达尚礼和在印度支那的反动派不安。达尚礼在离开西贡之前，同瓦吕仔细作了安排。

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已经辞职的皮杜尔政府，仍然处理日常事务。达尚礼还是找到了依托。他早就觉察当权派对法国虚弱的国际地位的忧虑。他与法国反动势力一唱一和，极力使人们相信：越盟正在想方设法把法国人赶出印度支那；只有强硬政策才能维持法帝国主义；对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胡志明主席的任何让步，将威胁到整个法兰西共同体。

海防冲突事件给达尚礼带来了好机会。瓦吕的侵略行径，被达尚礼描绘成越南人正在用武力赶走法国人的证据。法国右翼报纸立刻大做文章，叫嚷道：法国远征军又一次是越盟阴谋的受难者！必须以强硬政策代替妥协政策、退却政策……

十一月二十三日，由瓦兰操纵的印度支那问题联席会议开会。听取高级专员达尚礼的报告后，会议决定必要时可以用武力对付违反协定的行径。达尚礼马上打电通知瓦吕，说在印度支那实行强硬政治路线已经得到政

府和所有党派的赞成。……

三十二

在海防市的战斗中，我们缴获了敌人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的一份重要通令。通令指示法军各部队指挥官一到某地驻扎后，要立即制定安全计划，包括驻军营地的警卫，特别是部队在城市的转移；随后必须迅速研究一系列措施，把单纯的军事进攻安排成“一场政变的形式”。通令还指示他们要搜集市内有关各种组织机构的资料，调查并严密掌握我方领导人的履历、生活习惯和住地，成立便衣别动队，以便命令一下即可突然逮捕或暗杀，等等。这个密令暴露了法国反动派的野心，也使他们历来不可告人的作为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

瓦吕出兵进犯北方的第二大城市海防，标志着法国的侵略进入了新时期。天边出现了预兆一场大规模战争的乌云。在随后的日子里，各种事件频繁发生，有如一种链锁反应。

将来，史学家们将深入研究各种事件，充分地分析敌人的企图和行动，阐明我党的英明路线和具体的、及时的指示，描述我国人民和军队的高度爱国热忱以及规模庞大的抗战准备工作。我不打算代替史学家的工作，而只回顾我们多数人已经知道的主要事变，并以此为背景，突出胡伯伯在这个重大历史阶段的最后一个月——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的活动。

十一月二十八日莫里哀交给我方的照会，显然带着

最后通牒的性质。在这份照会中，法国远征军司令部所提出的军事条件，是我方不能接受的。莫里哀拒绝了一切调解。

十二月初，圣德尼到达河内后，到北部府拜会胡主席。自从圣德尼回国，法国驻越南北方高级专员之职一直由武官担任。达尚礼不愿任用同签订“三·六”协定直接有关的官员。圣德尼重至印度支那，是根据莫戴十一月的决定。他到河内之前，在西贡逗留了一段时间。

胡主席对圣德尼说，我方已经严格履行“九·一四”临时协定的条款，并要求驻海防、谅山的法军撤回到冲突前的位置。圣德尼答应向国内紧急报告，并及早把法国政府的新决定通知我方。

驻河内法军开始加紧挑衅活动。红帽外籍兵在场钱街上成群结队地走着，闯进商店抢劫，冲进文化室撕毁书报图片，有一次竟然拽掉挂在墙上的越南国旗。法国巡逻兵驾着摩托车在闹街上横冲直撞，蓄意制造事故并向交通警察挑衅。有时，一辆法军吉普车突然刹住，车上跳下几个戴黑色贝雷帽的法国兵，把行人抓上车，开进城[㊟]里。随着蒋军的撤退而结束的绑架现象，再由法军重演了。有的法国兵站在楼上，向电车开枪。法军装甲车的履带日夜辗着马路。冲突颇有一触即发之势。

十二月七日，驻海防法军举行新攻势，企图打开通往涂山的路，遭到我军激烈截击而败退。

㊟ 河内古城，是法军驻地。——译者注

八日，驻海阳市法军非法增兵。

九日，八百名法国外籍兵非法登陆岷港。胡主席向达尚礼和法国政府发出抗议照会。

十二日，法军向我驻先安、亭立部队发动进攻。战火蔓延到了东北。

十三日，法国一艘巨型巡洋舰开进岷港。

十四日，法国向海防增派四百名外籍兵。

十五日，法新社报道：驻阿尔及利亚的大批法国兵被紧急调到马赛港，准备开往印度支那……

我党认定，从当前局势的发展趋向来看，一场大规模战争是难以避免的。在尽可能争取缓和的同时，我们也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一场全民、全面和长期的抗战。

十二月七日，《巴黎—西贡报》记者访问胡主席。胡主席在回答中说：“我的同胞和我希望和平，真诚地希望和平。我们不要战争，我知道法国人民也不要战争。但是，如果人家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就要抵抗……战斗将是残酷的，但越南人民愿意忍受一切，而不愿丧失自由。”

从北至南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法国反动派在山罗、谅山、海防、建安等地进行挑衅的运动。越盟总部代表九百万会员，给胡主席和政府写公开信，要求政府坚决保卫主权；还发表声明，宣布随时准备抛头颅洒热血，来保卫祖先留下的每寸土地。妇女、青年、教师等团体也发表号召书，号召会员们同全国人民一道，为粉碎法军的侵略阴谋作出积极贡献。

“全民抗战”、“长期抗战”、“积极准备抗战”“抗战则存，不抗战则亡”等等口号，天天出现在《救国报》上。各区、省、市成立了由军、民、政代表组成的“保卫委员会”（后来改为抗战委员会）。各地人民的电报纷纷飞向首都，向胡主席和政府表示绝对信任，並愿为保卫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战斗到底。

老人和小孩开始离开河内和有法军驻扎的其他城市，防备敌人突然袭击。

这时，我军已经相当壮大。卫国团得到巩固、整顿，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家军队。第一支炮兵部队宣告成立。

十月中旬，我党召开全国军事会议。会议估计了全国的军事形势，作出了许多重要决议，以提高武装力量的素质，加强其战斗力。

军队党组织系统得到健全。中央军委之下，成立各军区委。同时，成立各战区。党向军队增派了大批党员和干部。

全军实行队长和政治指导员共同负责制。区一级设有政治委员，团至排均设政治指导员。从上至下的政治工作机关系统也得到健全。文进勇同志受命负责军队的政治工作。

我党保持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並实行直接领导。地方各级党委负责领导地方武装力量。

民兵游击队组织得到巩固，人数增至近百万名。战斗村的建设得到促进。

部队和民兵游击队日夜练兵，努力提高战斗水平，随时准备应付可能爆发的战争。

我们及时总结了南部各次战斗的经验，特别是海防、谅山等新近战斗的经验，制定总的抗战计划，并指导各地的抗战准备工作。我们还制定了破坏公路桥梁，实行“坚壁清野”的计划，以便战争爆发时，不让任何东西落到敌人的手里。

原属法国殖民者的许多工厂现在变成了军械厂。工人们和多数从法国的技术学校毕业的技术干部一起，以新主人的姿态，鼓足干劲修理各种坏枪炮；同时，开始制造一些必要的步兵武器，如子弹、手榴弹、地雷、三脚弹等。

根据胡伯伯的指示，越北根据地继续得到巩固。城市的许多工厂、仓库逐渐转移到根据地。胡伯伯责成红星同志①重至越北，为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必要时的转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一天，政府会议结束后，等代表们都离开了，胡伯伯向我问道：

“如果敌人在北方扩大战争，河内可以坚持多久？”

我答：“可以坚持一个月。”

他又问：“其他城市呢？”

“其他城市困难比较少些。”

“农村怎么样？”

① 即阮良朋同志。

“农村一定能守住！”

胡伯伯思索片刻，说道：“我们再到新潮去吧。”

三十三

还在十一月间，当海防局势紧张时，首都保卫战的问题就迫切地提出来了。中央决定成立河内战场党委，由阮文珍同志任党委书记，委员有黎光道同志、进同志等。陈国环同志被指定为特派指导员，直接参加党委。第十一区即河内区宣告成立。王承武同志任司令员，陈度同志任政治委员。

驻河内法军，有“三·六”协定签订后从法国调来的外籍兵部队，以及被日本俘虏而得到同盟军解放的原驻外籍兵。他们装备着大批美国新式自动武器，还有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

法军大部分驻在城里。还驻在屯水医院、原总督府、柚学校（现为朱文安学校）和嘉林机场。据调查，有些法国兵乔装平民驻在北部府斜对面的母国旅馆（现为统一旅馆）。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还有小股法军部队，以接防军的名义，同我军一起守卫许多冲要地点，如龙编桥、火车站、发电厂、自来水厂、东方汇理银行等。住在原洋人街和其他街道的八千名法国侨民全部得到法军提供武器。

法军的部署不象蒋军那样密密层层。但是，若不严密防备，他们一旦翻脸，就可能突然袭击我方首脑机关，重创我军。依恃坦克、装甲车的机动性，他们可能很快

堵住首都各处出入口，把城市分割为多片，逐渐歼灭抵抗力量。

当时，在河内我方力量有正规部队、战斗自卫队、城市自卫队以及各街区新建立的保卫队。

我军一部份驻在市内。一部份驻在市外。市内的数量不多，但都是经过选择的，并有曾参加过根据地抗日战斗的单位作为骨干。各营指挥员都是久经战斗考验的干部。战士则多数是入伍不久的青年。

我军主要驻在北部府、中央卫国团营房和其他一些重点地方。还有一些单位分散守卫国家机关、工厂或同法军混合站岗。

这个时期，我们已经努力增强军队的装备。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武器是缺乏的。我们利用缴自法军和日军的火炮，成立了一批炮兵连队，把一些七五毫米口径高炮改成地面炮。战争爆发前，军械厂给部队供应了八十颗用于反坦克的三脚弹。

河内的自卫队力量相当强，有战斗自卫队、市自卫队共约八千五百名。他们遍布各处，熟悉大街小巷。这些出身于各个不同阶层的城市青年具有高度的爱国热忱，斗志旺盛，纪律性强，日夜苦练过硬功夫，努力钻研有效的杀敌本领。武器多由他们自己购买或制造。这些“方形帽徽⊖战士”早就成为敌人的可怕对手了。

河内各阵地的构筑主要由自卫队和人民担任。

⊖ 自衛隊的帽徽是方形的。——譯者注

河内军民的任务是，在敌人发动战争时，消耗大量敌军，实行分割包围，千方百计地把敌人牵制一定时间，使后方有条件完成准备工作，转入战时状态。为此目的，必须逐部分地歼灭敌军，利用城市地形，阻止其前进；同时，保存和壮大我方力量，坚守一些关键性区域和地点，严格实行市内外协同作战，造成内外夹攻之势，使敌军穷于应付，从而延长以牵制敌人为目的的战斗。

河内保卫战计划订得相当周密。

越盟市部号召会员和全体同胞加强团结，加紧准备，以便一声令下即可奋起战斗。市内各街区、市郊各村庄纷纷举行集会，通过决议，要求法军撤回到十一月二十日前的位置，要求政府坚决对付法国反动派的侵略，并向政府和胡主席汇报说河内人民已经做好准备，以保卫首都的每条街道、每幢房屋。

对于《救国报》刊登的越盟总部关于准备抗战的号召，首都全体同胞表示热烈响应。家家户户的墙上和门上都写着“宁死不做奴隶”、“光荣地死胜于屈辱地生”等口号。有了枪的人想法多弄子弹，没有枪的则想法弄到手榴弹，打大刀长矛。每天，群众络绎不绝地来到街道办事处，要求参加保卫队、救护队、炊事队等。妇女们脱下飘拂的长袍，剪短头发，穿起军装，背枪佩剑，参加巡逻放哨。市疏散委员会命令老人小孩离开首都，但许多老人要求留下。他们成立父老小组，串街走巷，动员子孙准备战斗。大婶大嫂们募捐棉花布匹、毛纱，缝制被服，送给严阵以待的战士。人们有的运粮、有的送

药，源源不断地来到各办事处，把各种物资献给抗战基金。

第一联区——法军驻地接壤区的战备工作特别沸腾。铁锤声、打钎声日夜铿锵价响。各家各户凿通墙壁，造成新的通道。屋顶、阳台、窗户也都成为火力点。墙壁开出了枪眼。地基挖开了战斗坑和掩体。人们事先看准家里的东西，以便必要时扔到路上作街垒。这个联区居民贮存三个月的粮食，武器则分到河内总数的一半。

十二月初，各个敢死队举行誓师大会，接受武器，准备执行任务：抱着三脚炸弹，去炸敌人的坦克、装甲车。

国家机关、仓库、企业，如邮局、钞票印刷厂、中央制药院、兵工厂等等，相继秘密撤到市外。医院和军医院也迁到市郊。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主张不给敌人以制造事端的借口。构筑街垒只是在局势相当严重的时候才进行，而且也只堵住法军无需来往的路口。可是，眼看着市内多处垒起了插满木桩、铁条的土墩，法军司令部反应很大，不止一次地照会我方表示抗议。一次，莫里哀会见河内行政委员会主席，话里有话地问道：

“市长先生，你是不是正在加紧修理首都的街道呀？”

主席同志答道：“是的，因为你们的履带车到处乱窜！”

街道两旁的大树都钻开了窟窿，准备安地雷。火车

和电车工人准备了车皮，必要时弄翻，最后堵住给法军留下的道路。

三十四

面对着在印度支那法国反动派所制造的极其危险的局势，胡伯伯不遗余力地想法制止他们的罪恶魔掌。

十二月六日，越南之声电台播发胡主席对法国国会的呼吁书。胡主席重申越南人民要同法国人民合作的诚意。他揭发在印度支那的某些法国人正在违背“九·一四”临时协定的精神，推行黩武政策。他呼吁法国国会和政府命令在越南的法国当局，把军队撤回到十一月二十日前的位置，务期实施看守协定各条款，防止无益的流血。

一个星期过去了，胡主席的恳切呼吁没有回音。

在法国，各党派正在为争夺看守政府总理的席位而激烈争斗。

十二月四日第一轮投票，法国共产党候选人多列士同志获得票数最多，但未超过半数，没有当选。第二轮投票也没有任何候选人获得必要的票数。法国共产党不再推举候选人，但宣布将不参加以人民共和党为首的政府。

社会党推举里昂·勃朗姆参加竞选。投票前夕，他就印度支那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如下：“要维护在印度支那的法国文明，唯一的途径就是在尊重独立的立场上，同印度支那人民真诚地妥协，……越南问题的决定

权不是操在法国驻越军人和侨民的手里，而应该掌握在巴黎政府的手里。”他要求立即成立法国政府，以解决越南问题。共产党发表声明，指出：“我们将给勃朗姆先生投票，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来我们一定赞同他。”

十二月十三日，法国国会举行第三轮投票。勃朗姆当选，但只比垄断资本集团的代理人、人民共和党候选人舒曼多七票。

十五日，胡主席照会法国政府新总理，重申我方的基本立场，并提出打破当前僵局的一些具体措施：

——越南方面：让疏散居民重返城市，停止自卫性的防备措施，恢复河内—海防、河内—谅山交通干线的正常状态。

——法国方面：驻海防、谅山的法军撤回到十一月二十日前的位置，撤走在岷港非法登陆的援兵，停止在南部和中部南区的“扫荡”和恐怖行动。

——双方：立即成立拟议中的各个委员会，以便履行临时协定，停止在电台、报刊上互相攻击。

可是，这份电报以及胡主席给法国政府的其他电报，都被法国远征军司令部扣压在西贡，直至战争扩大十一天后才转到巴黎。

里昂·勃朗姆将怎样实践自己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声明呢？

还在勃朗姆当选之初，法国一家右翼报纸就写道：“实际胜于理论，里昂·勃朗姆当权后，将不敢放弃印度支那，就象克雷蒙梭新上台时不敢放弃摩洛哥一样，

尽管这是违背他原来的理想的。”我们对勃朗姆並不抱什么希望。他的社会党正在与法国劳动者的利益背道而驰。关于殖民地政策，他有时虽也说些比较进步的话，但却露骨地反对共产党。半年前，正是他被垄断资本集团派到美国去谈判借款问题。

勃朗姆在成立新政府的问题上遭到多方面的反对。共产党要求修正他的施政纲领的一些项目。各右翼党派要求他在法兰西共同体的问题上实行强硬的政治路线。他的各部的分配计划受到人民共和党的反对。

十七日上午，勃朗姆提交国会通过清一色的社会党人组成的政府成员名单。莫戴仍任海外领地部部长。这是戴高乐上台以来，政府第一次没有共产党人参加，尽管在议会选举中，她获得的席位比其他政党多。看来，三月间，关于勃朗姆和美国讨价还价的舆论不是没有根据的。

有消息说达尚礼已离开巴黎去西贡，继续担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之职。莫戴宣称：“对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奉行的一贯政策，我觉得达尚礼海军上将从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和我有什么分歧。……”

莫戴所说的那个政策，达尚礼曾向广大记者一再肯定：“必须让印度支那民众知道法国要在印度支那呆下去。如果法国犹豫不决，就会使这种信心丧失。我们必须在那里维持我们的力量，作为我们的意图的标志。”这位高级专员竟然提到了在侵略摩洛哥战争中以残暴著称的法国殖民主义将领里奥戴的“显示实力”的主张。

这就是说，人员依旧，政策未变。

三十五

从十二月中旬起，驻河内法军的挑衅活动进入了新阶段。

十五日，他们在河内的许多地方开枪，制造事端。在行豆花园，他们向第八郡的公安战士开枪射击；在咸龙街，用手榴弹炸伤两个卫国军；在陈国瓚街，向自卫队进行挑衅，抢走一辆人力车带去屯水医院。

十七日上午，法国侦察机不断地在河内上空盘旋。

十时，法军装甲车第一次开到炉督街破坏我方构筑的街垒。他们把木桩搬走。联络和监察局的成员来干预，法国兵说他们是执行上级的命令。

同时，一辆法国军车开到粉丝街口，一批外籍兵下车，跳到街垒上向居民开枪。我自卫队予以还击。大批法国兵开来，闯进平民家里，屠杀妇女小孩。打死打伤数十人。有的人被法国兵用匕首割脖子，倒在血泊里奄奄待毙。最后他们还把一些妇女抓走。不一会儿，法国外籍兵开到邻近的安宁街，闯进居民家里，又打死打伤一批居民。

这天中午，法军在从古城北门到龙编桥的路上陈兵，还包围了第二郡公安派出所。

在安阜发电厂，前几天才设置一个混合警卫组，法国兵突然开枪打死一起站岗的我方战士。发电厂的全体工人立即举行示威游行，谴责法军的行径。

下午，法军向粉丝街发射多发迫击炮。一批批外籍

兵在街上行走，还砸破许多民房的玻璃窗。

我部队和自卫队严格执行命令，暂未开枪。只是构筑更多的掩体，沉着地监视敌人的行动。

后来我们得知，十七日这天，瓦吕突然从西贡到海防会见德普。莫里哀和圣德尼也被召到海防接受新指示。

十八日，整个上午，河内情况貌似平静。监察局的我方人员不象昨天那样被来自各处的紧急电话经常打扰了。直到临下班前，监察局的法方局长沙迪翁大尉交给我方一封信，内容如下：“这里的法军司令部为保障军队、法国平民和外国侨民的安全，将要采取各种措施。因此，本部将派兵进驻巴杰尔街[⊖]的财政厅和交通厅长官邸。凡是可能妨碍法军来往的东西一律要拆除，否则将由我军予以拆除。”

这是驻河内法军的第一分最后通牒。

两小时后，正午时分，满载士兵的法国军车，在许多坦克和装甲车的护送下，开到古城附近的许多街道，包围红河区、东门街、行席街，用装甲车破坏行笔街的街垒和掩体。

下午，下班前，监察局的法方人员又把法军司令部的第二分最后通牒交给我方。内容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河内市公安当局没有完成任务。如果这种情况延长下去，法军将亲自负起维护河内治安的责任，

⊖ 现在的奠邊府路。

最迟不超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早晨”。

监察局的我方人员立即回答：“说越南公安当局没有完成任务，纯属捏造。法军不得以此为借口，侵犯我们的治安权，这是自由越南的最高主权。”

这些天，当敌人的侦察机开始在河内上空盘旋时，在河内省一条小河旁的村庄里，党中央举行重要会议，分析形势，提出新主张。开会前，伯伯向我们问道：

“今年庄稼怎么样？群众要挨饿吗？”

我们答道：“今年风调雨顺，不少地方大丰收，群众比去年吃得饱。”

胡伯伯表示高兴，又问道：“如果战争爆发，军队够米吃吗？”

“河内邻近各县和各省都盖了军粮库。各村都成立了供应委员会。”

“破坏交通搞得怎么样了？”

“河内周围的大公路都破坏了，敌人的军车不能通行。堤面路我们不破坏，只垒土墩，所以还需要一些时间。”

胡主席分析形势后指出：“法国扩大战争的阴谋进入了新阶段。缓和时期已经过去。我们曾经让步，可是我们越让步，敌人就越进逼。我国人民决不能再次当奴隶。我国人民的抗战将是长期和艰苦的，但一定胜利。”

十九日清早，我方又接到法方一份最后通牒。这是两天内的第三份最后通牒。对方提出的要求是：缴除河内自卫队的武器，停止一切抗战准备工作，把维持城市

治安的工作交给法军。

同昨天下午所提出的要求比较，法军又逼进了一步：要我自卫军缴械。

十一月下旬在海防所发生的一切，现在又在河内重演。在海防，法军举行强占本市的进攻之前，德普也向我方提出了明知我方不能接受的条件。

胡主席给法国驻印度支那北方专员写了一封短信：“近日来，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了。这实在很遗憾。在巴黎作出决定之前，希望你同黄铭鉴先生寻求一项解决办法，以改善当前的气氛。”

胡主席把信交给黄铭鉴同志。混合监察委员会的我方人员通知法方说黄铭鉴要求当天下午会见法国专员。圣德尼推辞说要等到明天。

明天，十二月二十日，也就是莫里哀扬言如果我方不把治安权交给他们，法军就要“采取行动”的日子。难道法方要拒绝任何调解？这之前几天，圣德尼在答《巴黎—西贡报》记者问时，曾经宣称法国要从实力地位出发并以强者的姿态，沉着地等待我方的态度。半月来，法国士兵除开被派到街上捣乱、挑衅之外，全部处于戒备状态。时间过得很快。敌人将在何时动手？——明天或者更早？

十九日下午，我同陈国环、王承武两同志去视察军队和群众的战备工作。

在椰市街，许多房屋门户紧闭。电车照常来往。从河东开来的电车空落落的。一些老人和小孩坐人力车离

开河内，车上堆满了铺盖行李。这些疏散的人们，大概没有几个料到要好多年后才能重返可爱的街道。几个自卫队员，有的肩挎猎枪，有的腰插手榴弹，正在检查树身上准备安地雷的窟窿。

到椰市口，我们爬过一个相当高的土墩，才能进入钦天街。跟冷清清的椰市街不同，钦天街熙熙攘攘，一派热闹景象。自卫队员三三两两地同两个头戴金星军徽船形帽的卫国军一起，边走边谈话。运土的牛车不断地从各个胡同走出来。推车的男女青年愉快地吆喝行人让路。一些饮食店照常营业。

火车站方向的钦天街头一片沸腾景象。高高的土墩上一截截铁轨向前伸。掩体里两个自卫队员在站岗。他们面前几十米，就是法军驻扎的壳牌石油公司。离这不远的火车站，也驻有法军。自卫队员打着木桩和给掩体添土，妇女们挑土、搬轨枕。一个慰劳组正在唱歌，鼓舞他们。火车站方向间或传来装甲车的吼叫声。

我们看过火力点之后，同自卫队员们谈话。他们饶有风趣地复述这样一个故事：中午，一辆法军装甲车开来，司机一见街垒上扣着一个个泥锅，便调头开走了。

正在紧张地准备同敌人激烈战斗的这年轻一代对于战争是很陌生的。但是，通过谈话，我看到他们是满怀信心地乐观地迎接战争的。他们还不知道明天自己将会怎么样，然而，从脸部表情来看，他们肯定能经受住任何考验。

黄昏降临。整个城市寂静异常。天气干冷。幢幢房

屋仿佛缩小身子，站在淡黄的电灯光下取暖。表面上，这个城市似乎怕冷而早睡，实际上，却正在掀起阵阵暗浪。战士们个个严阵以待。据报告，街道上，饮食店里没有一名法国兵；敌人的装甲车开到了一些路口……

三十六

一个冬天的晚上，“越南之声”广播电台在迁往根据地的路上，在距河内不远的的一个临时地点，播发了胡主席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全国抗战号召书：

“全国同胞们！

“我们要和平，我们已让步。但我们越让步，法国殖民者越进逼，因为它们决心要再一次侵占我国。

“不！我们宁可牺牲一切，决不肯亡国，决不肯做奴隶。

“同胞们！我们必须站起来！

“不论男女，不论老幼，不分宗教、党派、民族，只要是越南人就要起来打法国殖民者，拯救祖国。谁有枪用枪，谁有刀用刀，没有刀就用锄镐棍棒，人人都要出力打殖民者救国。

“士兵、自卫队员、民兵弟兄们！

“救国的时刻已来临！我们要牺牲到最后一滴血以捍卫国土。

“抗战尽管艰苦，但只要一心坚决牺牲，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民族的。

“独立和统一的越南万岁！”

“抗战胜利万岁！”

从头天晚上，即十二月十九日这个历史性日子的晚上，战争已经蔓延到全国。继南部抗战一年多之后，继山罗、谅山、港城海防军民奋起战斗之后，河内军民也向侵略者开火还击了。南定、海阳、北宁、北江、顺化、岷港等地，也都起来，杀敌救国。

全国抗战爆发了。

今天，在越南革命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胡主席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五日写的题为《当前的紧急工作》手稿。这份珍贵的材料告诉我们，胡主席刚从法国回来，就已看到我国人民很难避免一场由法帝国主义挑起的大规模战争。他亲手制定了应付事变的基本措施，以及边抗战边建国的计划。

关于长期抗战，胡主席写道：

“我们要懂得，而且使人民群众懂得：抗战将是很激烈艰苦的。

“敌人就是输到百分之九十九，还要尽可能反咬一口。因为在越南失败了，他们的全部帝国主义事业就会破产。

“……从前，凭着赤手空拳，一些同志在山林里秘密活动，我们尚且建立了抗日、抗法根据地，何况现在，我们有了军队，有了人民。南部虽然地势不利，准备不足，但是抗战也能坚持一年多了。（从全国来看），地

勢好，力量较大，抗战一定能坚持数年至胜利。”

“我们要和平，我们已让步。但我们越让步，法国殖民者越进逼。”胡主席直到最后一分钟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並未能制止敌人的罪恶魔掌。侵略的战火已经蔓延到我国各地。

“不！我们宁可牺牲一切，决不肯亡国，不肯做奴隶。同胞们，我们必须站起来！”

那年冬天，五十六岁的胡主席拄着竹杖，脚穿抗战鞋，踏上了第一次神圣抗战的征途。

“努力越过寒冷的冬天，我们就可进入春天。”[⊖]

全民族以坚强的决心、磅礴的气势、英勇卓绝的杀敌救国精神，响应主席的号召，站了起来，在全国抗战的第一个寒冷的冬天立下了巨大的战功。

从此，在胡主席和党的旗帜下，我们民族在三千个日夜的战斗中经受了千辛万苦，越战越强，越强越胜，在通向民族的春天的道路上步步前进，达到奠边府的历史性胜利。

三十七

这个回忆录是在胡伯伯逝世不久的一九七〇年春开始写的。我没有条件更早地完成它。

⊖ 《当前的紧急工作》。

通过已经搜集到的资料和许多同志的努力，我同读者们一起，重温了胡主席在我国革命短促而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的活动。

二十世纪初叶，越南民族的优秀儿子阮爱国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漫漫黑夜里，寻找拯救祖国和民族的道路。他看到了东方地平线的曙光。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作为一个殖民地居民，阮爱国及早找到了新时代的救国道路——无产阶级道路，列宁主义道路。

我党四十多年的革命斗争，证明了胡主席为民族选定的“革命之路”，是争取真正的独立、自由、幸福的唯一正确道路。这也是正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枷锁下受尽折磨的许许多多民族的解放道路。

胡伯伯是**伟大的爱国者**。他的爱国爱民之心是这样的深厚浩瀚，无可比拟。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救国救民的事业。

胡伯伯是**第一个越南共产党人**。他对同胞的爱是同对劳动者、对劳苦人的爱联系在一起的。他争取民族解放的事业，是同争取正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社会制度下呻吟的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事业分不开的。

胡伯伯是**我党和我国人民的领袖**。他的六十年革命活动，证明他是极其英明的战略家，是伟大转捩点的创造者。胡伯伯和党所作出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和军事决定，使越南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更辉煌的胜利。

*

苏联红军在把德国法西斯追击到老巢的路上所发动的凌厉攻势，给许多东欧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创造了起义夺取政权的条件。面对着地盘辽阔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形式，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潮流的发展，帝国主义发起狂来。它们曾经策划复活战败的法西斯军队，准备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以消灭共产主义。于是，西方对东方的冷战开始了。

当时，我党才十五岁，只有五千党员，却能领导全民胜利地进行八月革命，从日本法西斯及其走狗的手里夺取政权，成立东南亚第一个人民民主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

民族解放的红旗在解放了的越南的土地上迎风飘扬，昂然出现在此前无人能够侵犯的帝国主义的广阔禁区。越南革命向五洲预示了殖民地体系的崩溃和民族解放革命潮流的新发展。这对帝国主义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威胁。

作为我们民族的独立、自由的敌人，各种肤色的军队同时汹涌而来，遍布我国的每个角落。十八万最卑劣的反共走卒蒋匪军密密麻麻地驻满了我国首都和北方各大小城市。他们准备了一伙危险的走狗，蓄意要推翻年轻的革命政权。由美帝装备并由英帝给开路的法国远征军卷土重来，妄图以闪电攻势重占南方。曾在一夜之间就把印度支那半岛的法国殖民政权推翻的穷凶极恶的六万日本法西斯军队，也还散布在我国从南至北各地。

列宁关于“夺取政权固然困难，维护政权更为困

难”的教导，对于我国这个时期是最合适不过了。

祖国的命运每时每刻受到威胁，有时竟象千钧一发。只要稍微不够清醒，稍微犹豫，革命就会受到挫折，难以度过险关。这正是需要非常英明、非常敏锐的领导时刻：

進攻退守應神速，

高才疾足先得之。⊖

当时，有党，有胡伯伯，是我国人民、我国革命的洪福。

党和胡伯伯的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的政治路线，已被历史实践证明是非常正确的。诚如黎笋同志曾经指出的：“时而同蒋帮暂时缓和，腾出手来对付法国殖民者，时而同法国暂时缓和，以赶走蒋军並肃清蒋帮走狗反动派，争取时间巩固力量，准备抗击法国殖民主义侵略者的全国性战争——我党断定不可避免战争。这些极其英明的措施，作为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和有原则的让步的列宁主义策略的光辉典范载入我国的革命史册。”⊖

如果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有时“把他们从同盟者变成

⊖ 胡志明：《學奕旗》，《獄中日記》詩抄。

⊖ 黎笋：《爲了獨立、自由，爲了社會主義，在黨的光輝旗幟下前進，爭取新勝利》。

野兽。”^①那么，共产党人胡志明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以高尚的道德作风，使一群群穷凶极恶的野兽变成可以与人相处的动物，而且能够使唤它们于革命有利的事情。借此，胡伯伯保卫住了处于恶狼包围的新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使她渡过了幼弱时期。

由于党和胡伯伯的领导，越南革命经受住了初期的严峻考验，岿然屹立，不断前进，完成历史交给我国人民的重大使命。

帝国主义及其在本国和殖民地的代理人，不愿意也不可能看到印度支那半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根本变化。

戴高乐认为，通过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的宣言，他赐给了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很多恩泽”。法国资产阶级政客和将领，多数认为可以用军事力量在印度支那复辟；他们主张竭力维持殖民地，以挽救法国虚弱的国际地位。尽管法国广大人民群众谴责殖民主义，支持我国人民争取独立、统一的正义斗争，但是，殖民主义者中间能多少看到印度支那的新局势，主张用另一种方式来维护他们的利益的人，例如黎格勒，那在当时是屈指可数的。只是在法国远征军已经彻底战败的时候，戴高乐才肯承认他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打错了算盘。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第四〇九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六〇年版。

贪婪、残暴和盲目的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人类需要洗刷干净的一个污渍。我们越南全体民族，万众一心，决不让敌人再次侵占我国。那年冬天，胡伯伯阐明了全民族的深切愿望和意志：

“我们宁可牺牲一切，决不肯亡国，决不肯做奴隶。同胞们，我们必须站起来！”

敌人逼迫我们进行的战斗，正是给他们挖掘坟墓的战斗。八年后，法帝国主义在奠边府得到了应有的教训。我们已经证明了新时代的一个新真理：“一个哪怕是弱小的民族，只要有正确的路线，决心拿起武器抗击侵略者，就完全有可能打败强大的帝国主义。”

一九四六年秋，在巴黎同法国当局谈判的人，已经成为“击沉法国殖民主义”的人。

奠边府的历史性胜利，给我国人民带来了半壁河山。解放了的北方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成为全国革命事业的坚不可摧的堡垒。

衰老的法帝国主义一败涂地。老殖民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可是，我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长期、艰苦的搏斗尚未结束。帝国主义的魁首美国死乞白赖地要抓住我国南方。这个拥有庞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的、更加狡猾也更加残暴的美帝国主义还没有得出必要的教训。由那些被英国军队从西贡的日本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法国兵打响的这个半岛上的战争，并未以法国远征军的可耻失败而告终，至今还在我们的半壁河山继续着，而且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激烈性最高的一场战争。

美帝国主义为了实行其全球战略，在侵略我国南方的战争中，动用了美军、帮凶军和仆从军共一百五十多万名。它妄图扑灭这个地区日益蓬勃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个运动正在把强劲之风吹进各地熊熊燃烧的反殖斗争烈火之中，威胁着要冲垮帝国主义集团的全部家业。美帝在这个地区使用了西方世界最现代化的杀人武器，倾泻了大量弹药，其总量甚至超过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战场上所使用的弹药总和。本世纪的这个匈奴在我国土地上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战争。

于是，胡主席的抗美檄文又响彻河山：“他们可以出动五十万、一百万或者更多的军队来强化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他们可以使用成千架飞机来加紧对北方的轰炸……战争可以延长五年、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河内、海防和其它一些城市、企业可能被摧毁，但是越南人民是吓不倒的！**没有什么比独立、自由更可贵。**”

响应胡伯伯和党的号召，我全国军民不辞艰苦，不怕牺牲，发扬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决心落实胡伯伯的教导：“只要我国土地上还有一名侵略者，我们就要继续战斗，把他肃清。”

无愧于“祖国铜墙”称号的先去后归[⊖]、坚定顽强的南方越战越强，越强越胜，使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越来越深地陷入罪恶战争的泥潭。从持久而激烈的战斗烈火中，产生了南方革命政权——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

⊖ 意爲“战斗在前，胜利在後”。——譯者注

政府，它正在肩负着领导南方军民驱逐美帝、解放南方、进而和平统一祖国的历史任务。

北方在炸弹的烈风火雨下岿然屹立，把前来制造罪恶的空中强盗打得落花流水，全心全力支援南方，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继续稳步前进。

我们接连挫败了敌人侵略战争的各种战略。武器充裕的美国侵略军必将遭到其它侵略军曾在这块土地上遭到的悲惨下场。

*

我国人民自党成立时起的四十多年革命斗争，将以光辉灿烂的金字载入我们民族数千年建国和卫国的英勇斗争史册。我党和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个国家反侵略战争的范围，因为它证明了新时代的新真理。

在这个伟大事业中，突出了胡主席宏伟而朴素、神圣而平易、光辉而纯洁如朝阳的形象。

从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成功日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全国抗战爆发日这个不长的时期，是我党、我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仅在这难忘的岁月中，我们即可看到胡伯伯相当完整的形象。

胡主席是越南祖国最优秀的儿子。

胡主席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战士。

胡主席是引导越南革命航船越过重重惊涛骇浪、驶向胜利彼岸的伟大战略家。

胡主席是越南的新人，是领袖、导师，是同志。胡

伯 伯身上集中了开始形成的新社会的新人之道德品质。

胡主席是新时代的新人。

是党和胡主席使新的一代——胡志明一代产生了。

这一代人负起了为祖国和人类的新纪元——独立、自由、社会主义的纪元而战的突击队的任务。

这一代人以伟大的胡伯伯为榜样，经受了锤炼，正在为实现胡伯伯和党的理想——“建立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越南，为世界革命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而前进不息。

这一代人正在遵照胡伯伯的召唤：“稳操全胜勇向前”，继续前进。

一九七二年春